

飞虎战

驼峰险

乱世情

钟陈可慰

钟端玲

伍黄奕冰

飞虎战
驼峰险
乱世情

钟陈可慰 口述
钟端玲 整理
伍黄奕冰 笔录
陈香梅 序

自传

从战争到和平的
天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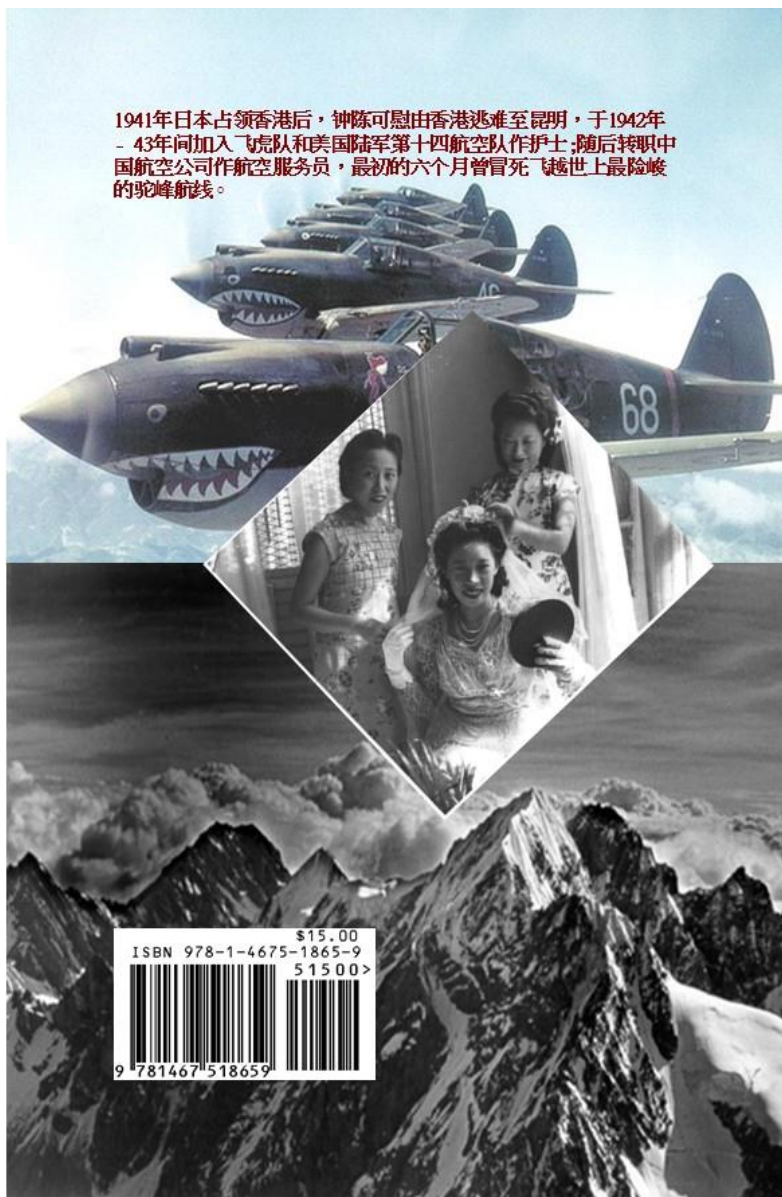
纪念钟陈可慰 100 周年 (1920-2020)

免费

不可出售

2 飞虎战. 驼峰险. 乱世情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钟陈可慰由香港逃难至昆明，于1942年-43年间加入飞虎队和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作护士，随后转职中国航空公司作航空服务员，最初的六个月曾冒死飞越世上最险峻的驼峰航线。



免费

不可出售

飞虎战 驼峰险 乱世情

钟陈可慰从战争到和平的天路历程
简体中文增强版

钟陈可慰(左), Rebecca Chan Chung 口述
钟端玲(中), Deborah D.L. Chung 整理
伍黄奕冰(右), Cecilia Ng Wong 笔录



三位作者摄于 2009 年

鸣谢

陈香梅 Anna Chennault (前言一)

张紫明 Lydia Cheung (前言二)

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 (前言三)

钟敏玲 Maureen Chung (后记一, 二)

罗邓卿意 (后记三)

钟敏玲、钟端玲、伍黄奕冰 (后记四)

关键词: 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虎队, 美军, 十四航空队, 义勇军, 皇家香港军团, 中国航空公司, 驼峰航线, 公谊救护团, 中国, 昆明, 香港, 护理, 教育, 东华三院, 养和医院, 玛丽医院, 拔萃女书院, 婚姻, 家庭, 人生。

简体中文增强版 (2020) (246 页, ISBN 9781-4675-1865-9)

内容已从繁体中文版本(2011)和英文版本(2012)增强。

其他版本: 英文版 (240 页, ISBN 978-1-4675-1864-2),
 繁体中文版 (240 页, ISBN 978-1-61658-914-1)

代理人: 钟端玲

出版人: 钟端玲

所有版权持有人: 钟端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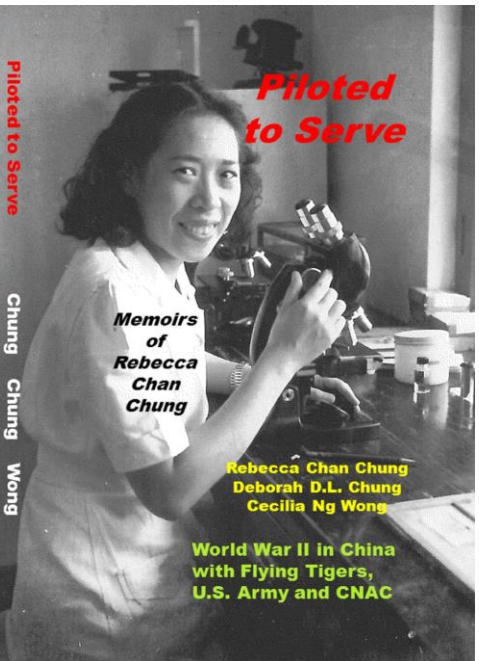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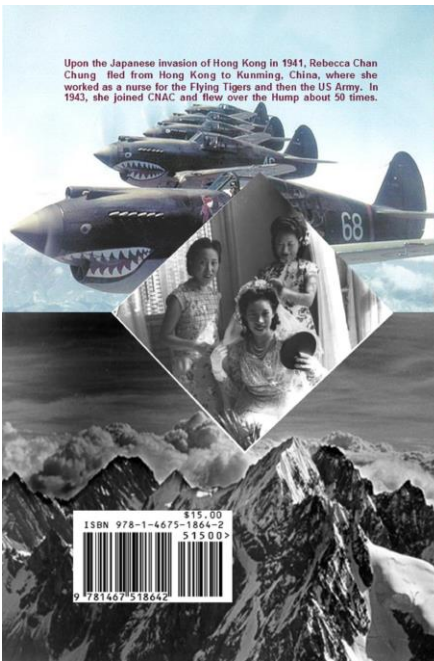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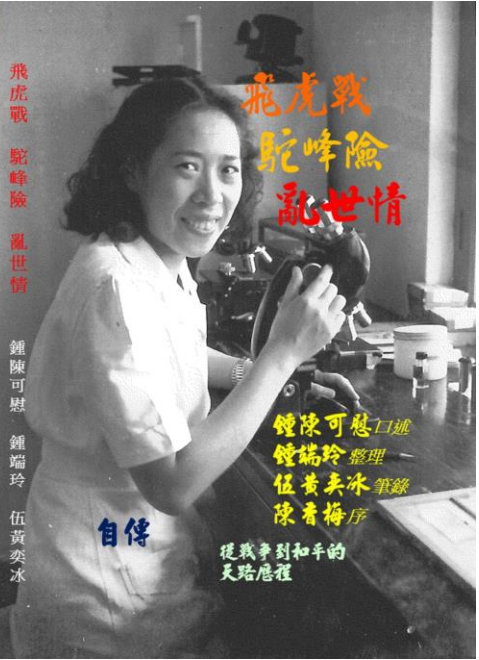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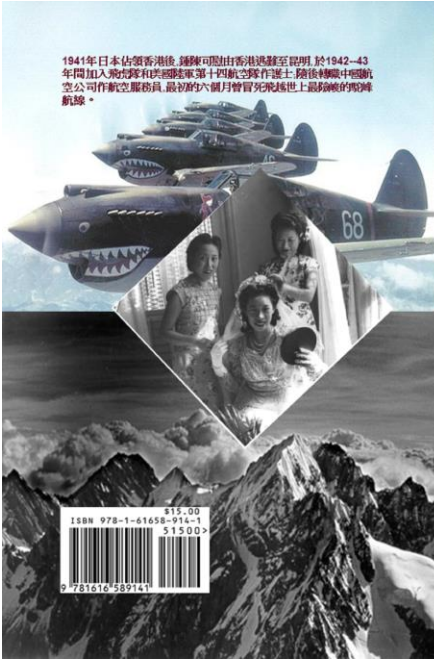
联系: ddlchung@163.com

Published by Deborah D.L. Chung
Copyright © 2020 by Deborah D.L. Chung

出版者保留所有权利。未经出版者的书面许可,这本书(或这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或以任何方式(电子或机械),包括影印、录音、任何信息存储或检索系统(现在已知或未来的发明)。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or parts thereof,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now known or to be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国际图书编号: ISBN 9781-4675-1865-9



目录

鸣谢	4
目录	6
香港抗日战 80 周年	9
纪念爱夫钟华亮先生于 1941 年为保卫香港与日军英勇作战	10
钟陈可慰简介	11
序	12
自序一 (钟陈可慰)	12
自序二 (钟端玲 - 钟陈可慰的次女)	14
自序三 (伍黄奕冰)	16
客序一 (陈香梅 - 飞虎队领导陈纳德的妻子)	17
客序二 (张紫明 - 第一位华人的香港政府总护士长)	18
客序三 (司昆仑博士 Stapleton-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19
钟陈可慰女士被追念为美国退役军人	20
第一章: 与护士工作的情义结	22
1.1 在日军攻占下沦陷的香港	23
1.2 先人的典范	23
1.3 自小聪明的母亲	28
1.4 献身革命的父亲	29
1.5 超时代行习西医的母亲	33
1.6 军伐时代出生于广州	35
1.7 住在护士宿舍的人生头三年	37
1.8 三岁初尝寄宿生涯	39
1.9 住在外祖父家的幼年	40
1.10 重返护士宿舍与母亲同住	42
1.11 学习钢琴、中国武术及普通话	43
1.12 认识上帝	45
1.13 香港拔萃女校攻读英文中学	49
1.14 护士学院受训	53
第二章: 从香港至重庆的战火余生	59
2.1 香港十八天的抗日战事	59
2.2 日军统治下的香港	64
2.3 日军轰炸香港医院	68

2.4	及时的护士毕业证书	69
2.5	从香港逃难到广州	72
2.6	从广州逃难至曲江 (260 公哩)	74
2.7	从曲江逃难至贵阳 (1200 公哩)	77
2.8	从贵阳逃难至重庆 (500 公哩)	79
第三章: 与飞虎队的情义结		86
3.1	领导飞虎队的陈纳德	87
3.2	飞虎队的背景及策略	89
3.3	进入飞虎队的经过	92
3.4	在飞虎队的工作	93
3.5	中国人的朋友 - 孟杰医生	97
3.6	飞虎队的食用	100
3.7	飞虎队的生活点滴	101
3.8	对家人的照应	103
3.9	飞虎英雄著作被搬上银幕	105
3.10	飞虎队归入美国陆军后的工作	106
3.11	日军空袭昆明机场	110
3.12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生活点滴	112
第四章: 与驼峰航线的情义结		117
4.1	险要的驼峰航线	117
4.2	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	122
4.3	转职中国航空公司	124
4.4	初抵印度	125
4.5	飞越驼峰的工作	126
4.6	最惊险的飞行经历	132
4.7	停止飞行	133
第五章: 千里姻缘驼峰牵		135
5.1	印度之乱世情	135
5.2	钟华亮的抗日工作	136
5.3	驼峰姻缘	143
5.4	在印度的音乐友谊	147
5.5	印度订情	148
5.6	缔结良缘	148
5.7	婚后即分离	158
5.8	婚后大幅度加薪	160
5.9	放弃离职中国航空公司	160

5.10	在印度教会的义务工作	161
第六章: 和平后		163
6.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164
6.2	重返祖国 - 上海	166
6.3	上海中国航空公司的组织	167
6.4	上海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	169
6.5	郊游	172
6.6	成立歌咏团	176
6.7	因政局而离职中国航空公司回返香港	176
6.8	在香港为弟弟一身兼三职	178
6.9	为父母借款在香港买地	181
6.10	父亲隐居及病逝于香港	183
6.11	家庭与事业的发展	184
6.12	回顾事业与家庭	212
第七章: 退休移民加拿大		217
7.1	移民加拿大	217
7.2	母亲病逝	219
7.3	退休生活	219
7.4	旅游	223
7.5	弟弟霭东病逝	227
7.6	阔别近五十年的逃难知己柯德富	228
7.7	结婚纪念	229
7.8	华亮病逝	233
7.9	九十岁生日	235
7.10	后思	236
后记 (钟敏玲 - 钟陈可慰的长女)		238
(王兰枢 - 女婿的八兄)		241
(罗邓卿意 - 广华医院前一级护士长)		242
(钟敏玲、钟端玲、伍黄奕冰)		243

香港抗日战 80 周年

1941 年十二月八日是一个令香港人永志难忘，又是令世人握腕叹息的日子；日本于当日凌晨十二时偷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八小时后，于同日早上八时，一支为数约 52,000 名，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日本军队兵分三路进袭香港；这个历史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部分。当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英方以一队为数只有 14,000 名没有经过特别军事训练，且拥有不同国籍的军人迎战；队中有来自英国、香港（包括自愿献身抗日的“义勇军”）、印度及加拿大的。据统计，英方军队在战事中阵亡的战士有 2,113 名，受伤的 2,300 名；在日本方面，阵亡的军人共有 1,996 而受伤的约有 6,000 名；在战争中被杀害的香港居民约 4,000 人，而受重伤的则超过 3,000 人。

1941 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早上，来自加拿大温尼柏省的手榴弹炮兵 John Robert Osborn VC 眼见一枚手榴弹即将引爆，即奋不顾身以自己的身体覆盖其上，挽救了战友却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他那舍己救人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久，日军成功地占据了新界及九龙半岛，并且企图攻占香港岛，英方军队仍然死守力战，只是双方军队实力悬殊，香港终于失守。1941 年十二月廿五日的早上，日军于赤柱圣士提反湾登陆；同日下午，香港总督杨慕琦于半岛酒店（当时日本的总部），向日本签署了投降书，十八天的港日之战虽然结束了，却为香港带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辛岁月。



香港于 1925 年在金文泰总督就职¹

¹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Queen%27s_Pier_in_1925.jpg (公共领域)

纪念爱夫钟华亮先生于 1941 年
为保卫香港与日军英勇作战



钟华亮 (1917-2009) 于 1941 年十二月日军炮轰香港鲤鱼门港口之役受重伤，
引致左边面部神经腺瘫痪

钟陈可慰简介

钟陈可慰女士于 1920 年(军伐时代)出生于广州, 在香港的拔萃女书院毕业(1938 年), 并从香港政府获取护士执业资格(1941 年)。1941 年日本占领香港, 钟女士逃难到中国重庆, 机缘巧合(乃是上帝的安排)地受聘于在昆明驻守的飞虎队作护士。1943 年钟女士转职中国航空公司(CNAC)任航空服务员, 飞越当代最险峻的 [驼峰航线]。1944 年停止飞行并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中航总部任职护士。战争结束后, 她与中航一同从印度搬到上海, 并成为中航的护士长。

1943 年在加尔各答钟女士邂逅在重庆工作的夫婿钟华亮, 之后二人由于钟女士飞越驼峰而在重庆多次见面; 于 1945 年他们在印度结合, 一个多月后钟先生从印度远笈美国攻读大学。分离三年后, 夫妇分别回返香港定居, 生下女儿钟敏玲和钟端玲。1974 年他们移民加拿大, 共享 64 年甜蜜的婚姻生活。

1957 年钟女士在香港政府卫生署任职, 被分派往东华三院护士学校执教鞭。1963 年被东华三院补送至澳洲墨尔本的护士学院修毕护士教育文凭课程后被提升为该院护士学校的总教师。1961 年被港督柏立基爵士委任作为期三年一任的 [香港护士局] 委员之一, 钟女士一直连任直到退休; 1966 年她又被港督戴麟趾爵士委任作为期三年一任的 [助产士管理局] 的委员之一。

事母至孝, 家庭事业兼顾的钟女士在这本书以第一身的体验分享她于 1942-1943 年跟驻守在昆明的飞虎队共事, 以及在 1943-1948 年间于中国航空公司(CNAC)工作时在开始的六个月参与飞越世上最高最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驼峰航线)的宝贵经历。1942 年五月, 日本占领了缅甸, 切断了同盟国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 - 滇缅公路; 因此 [驼峰航线]便成为中国接触外界的唯一通道。航线处于喜马拉雅山高达 3,500 米以上的山脉上; 由于山峰太高, 飞机要在山峰之间起伏飞行, 就像在骆驼背上飞行一般。

钟女士的先夫钟华亮先生是香港抗日时期的[义勇军]成员之一, 隶属第四团队, 驻守鲤鱼门炮台; 钟先生在战役中英勇作战而受了重伤。钟女士的先父陈步贤先生曾献身于国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 积极地参与革命活动。

钟陈可慰女士曾言道: “战乱时期在香港、中国及印度任职护士的那段日子, 我确知神与我同行, 祂保守及带领我跨越重重困难, 即使在参与面对死亡挑战的

[飞越驼峰]时,我也绝不害怕,心内充满喜乐和平安,因知我的主与我同在。”享年 91 岁的钟女士希望用这本书见证神在她生命中赐下丰盛的恩典。

自序一 (钟陈可慰)

我本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女性,在世上没有作过甚么丰功伟绩的大事,原是没有甚么值得夸耀的地方,然而过往九十年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实在使我感到天恩处处,倘若我能够将自己蒙福的生命与世人分享,使别人得以藉此蒙福,亦是一件美事;特别是我能够有机会加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勇抗日的飞虎队(后被美国陆军第十四队航空队所取代),在队中扮演一个角色,亲自见证他们舍身抗日的勇敢事迹而倍感荣幸。在二名挚爱的女儿钟敏玲(Maureen Chung)和钟端玲(Deborah Chung)的支持和鼓励及我的好朋友伍黄奕冰(Cecilia Ng Wong)的协助底下,此书得以顺利完成,为此我感到雀跃万分。

我有幸能够与飞虎队有分源自 1941 年十二月日本占领香港(一个我长大及受教育的地方)后,我由香港逃难至昆明,于 1942 年至 1943 年间受聘于飞虎队和美国陆军第十四队航空队作护士;随后转职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CNAC)作航空服务员,最初的六个月,我须要每周随着航机飞越驼峰(航线处于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二次。

飞越驼峰是极艰巨及危险性极高的工作,驼峰航线不但地处于世界最高山峰及最险要的喜马拉雅山脉,而且恶劣的天气和残旧的飞机使飞行倍加困难;假若在飞行中须要躲避日军的追击时,更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珍惜这段与英勇的美军及充满爱心的医生共事的宝贵人生经历,这宝贵的经历不但使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供养我的家庭,更赐给我一段六十四年的幸福婚姻。丈夫钟华亮确是一名爱家庭的好丈夫,又是一名爱人的勇敢军人;1941 年十二月他以义勇军人的名义驻守香港鲤鱼门,在日军轰炸鲤鱼门港口一役中受重伤,后来逃难至中国重庆,再往印度接受治疗时与我彼此结识并且结合。

我自小在医院宿舍与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母亲共处,在耳濡目染下,我爱上了护士的工作;而我爱祖国的情怀则可能源自我那曾经与孙中山先生推行革命工作的父亲。在此我要感谢我挚爱的母亲周理信,她为我预备了最好的教育,她供给我入读香港有名的拔萃女子中学及让我学习弹奏钢琴;我又要感谢带领我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护士同学余秀芬。

此书搜集了很多从未被发表过,又甚具历史性的珍贵图片,当中包括 192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香港护士发展历史、飞虎队及其邻近地域的图片、由飞虎队及中国航空公司所签署的信件、1941 年由驻中国桂林的英国领事馆发给丈夫钟华亮的退役军人证明文件、父亲在国民党时期的工作报告、父母亲于 1911 年的结婚证书、曾外祖父周学牧师 (第一位被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华南教区按立的华人牧师) 的图片等;深信这些图片可以为日后有志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提供帮助。

我甚愿这本书不单只是为历史作见证,并且盼望可以激发读者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及活出爱家庭及爱群体的信仰生活作反思。

钟陈可慰

写于 2011 年二月廿六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士嘉堡市



钟陈可慰女士 (摄于 2010 年)

自序二 (钟端玲)



钟端玲博士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博士, 1977 年
联合国发展计划援华特邀专家, 1986 年
美国国家材料咨询, 1987 年
汽车工程师协会 Teetor 教育奖, 1987 年
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材料科学首席教授, 1991 年
“陶-贝塔-派”Tau Beta Pi 工程学会年度教师奖, 1992 年
美国材料信息学会 (原美国金属学会) 院士, 1998 年
美国碳学会院士, 2001 年
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学术和创造卓越成就奖, 2002 年
美国碳学会 Pettinos 国际卓越成就奖, 2004 年
爱思唯尔(Elsevier) 出版公司国际学术刊物《碳》年度评审奖, 2008 年
西班牙阿利坎特(Alicante) 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1 年

我是钟陈可慰的次女端玲，三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及大学教育工作。虽然我工作的地方是在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但是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从水牛城驾车返回多伦多与父母共渡，因此我与母亲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我在异地工作而减退过，反之我们同时渴望着周末的到来，大家可以相聚。

甚么促使我为母亲制作一本回忆录呢？那就要追溯至二年前父亲离世返回天家之后。虽然我早已知道她在二次大战时飞虎队的工作，但是我大约在一、二年前与她闲话家常时才知道她曾经不惜付上生命代价去飞越驼峰。虽然我知道她是一名护士总教师，但我约在一年前才知道她所负责的护士学校在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虽然她为自己弟弟的医科学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吃尽了不少苦头，直到舅父离世后她也一直绝口不提，以免舅父不安。虽然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所参与的绝对不下于父亲，但是她只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在闲话家常中对我与姊姊提及当时的点滴，以免父亲的战绩被忽视。虽然她在香港最有名望的拔萃女校中学毕业，并且名列前茅，同学中多是达官贵人的女儿，非富则贵，但是她亦少有提及。虽然以她的聪明智慧，她可以像其他同学一般升读香港大学，因为我的外婆绝对愿意为她提供最佳的教育；她选择进修护士，目的在于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虽然她的一点财富来自为孝顺父母而在香港买地，并非为投资，对此她一直保持缄默，只字不提，以免使读经济学的父亲在投资方面的成就被忽视。虽然她可以得到她应得的美国退伍军人名分，但她一直都没有想过为此去争取，直到今年我为她向美国陆军部申请。妈妈特别之处真是不能尽述。

妈妈一生的经历，实在是发人深省，因此我决意为她制作一本回忆录。我虽是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对历史亦很感兴趣，热衷于数据及图片的搜集。今天我可以记录母亲及其他长辈具有价值及历史性的事迹，是我的福气，但是我最大的福气莫过于天父赐给我一位具有丰富爱心、恒久忍耐、到底忠心、舍己为人、广泛知识、非凡智能、活力过人、时常喜乐、无伪谦卑、属天平安及敬畏上帝的母亲。

我希望母亲的经历可以鼓励读者们在追求人生的意义上得着方向，能力，平安与喜乐；我以此书纪念中美在抗日工作上的合作，更以此书纪念为抗战而丧生的军人及 CNAC 机师。

钟端玲 Deborah D.L. Chung

写于 2011 年五月七日 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布法罗)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orah_Chung

<http://alum.mit.edu/www/ddlchung>

自序三 (伍黄奕冰)

钟陈可慰女士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她独特之处在于对上帝的忠心、信靠、交托和顺服。诚然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并且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的、最美善的计划；活得精彩与否则在乎你是否能够活出上帝的计划来。

我深信人生在世，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困难，经历苦难，而这些经历又是信徒们属灵成长的必经之路；钟陈可慰女士也未能例外，然而她却从没有为经历苦难而抱怨，反倒时时刻刻在感谢上帝，因为她明白上帝在透过苦难来塑造她。举凡认识她及其丈夫的人都知道他们相爱之深，令人艳羡。2009年六月当她深爱的丈夫离世后，爱她的人都为她担忧，惟恐她感到孤单、失落。我实在是蒙福的，在那段日子我有机会与她独处了一个星期，目的是与她作伴，以免她为了丈夫的离世而感到忧伤；这七天与她的相处有如参加了一个属灵的退修会一般，使我获益良多；我看到了圣经的真理透过她彰显出来；我看到了甚么是真正的温柔、忍让、宽恕、怜悯及谦卑。

透过笔录这本书，我伴着她重走她的人生路，路途中，我像是亲历其境般经历了上帝的真实，实在使我赞叹不已；我赞叹上帝的伟大、信实与慈爱，禁不住数度为上帝的爱而感动落泪。是的，上帝的道路是最美善的，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只要像钟陈可慰女士一般，交托顺服地紧随上帝的脚步就必得蒙福。在她丈夫钟华亮先生离世二年多的日子里面，她以积极进取而又充满喜乐的人生态度去过活，这岂不正是[有盼望的人生]的写照么？我甚愿此书不但为未信主的读者提供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更为已信主的弟兄姊妹作为跟随上帝的榜样及借镜。

伍黄奕冰 Cecilia Ng Wong

写于 2011 年六月廿七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多伦多麦恒市

whitelily770@gmail.com

客序一 (陈香梅² - 飞虎队领导陈纳德的妻子)

很高兴读到鍾陳可慰的
大作“飛虎戰駝峰險和世情”
真是一本天路歷程,希望讀
者們都能領略第二次大戰
時的情景,這是一本好書,
感謝作者為歷史留下
印証。
陳香梅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很高兴读到钟陈可慰的大作“飞虎战,驼峰险,乱世情”,真是一本天路历程,希望读者们都能领略第二次大战时的情景,这是一本好书,感谢作者为历史留下印证。

陈香梅 Anna C. Chennault (1925-2018)
美国华盛顿

²国际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主席,美国军人家庭协会的咨询委员会主席及创办人,上海工业和商业协会顾问,云南大学名誉校长,美国华裔团体创办人,美国共和党年度奖,1974年美国人选择奖,1987年林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华盛顿特区,1970年,作者,陈香梅回忆录, Future Book City Publishing, 2002年。

客序二 (张紫明³ - 第一位华人在香港政府任职总护士长)

可慰女士的回忆录, 不仅是属于她自己个人在那战火纷乱年代作随军护士, 投入抗战出生入死的经历, 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战争精神。

我和可慰在香港医务卫生署全事多年, 她任劳任怨、尽忠职守的工作态度, 深受同业们的认同。在东华三院任职护士学校校长期间培育不少护理人材, 桃李满门, 是护士学生所爱戴的好老师。

可慰为人谦虚、和蔼可亲、脸上永远挂着诚恳的笑容; 和她相处有如沐春风之感; 她敬业乐业的精神是护理界的典范。

可慰姒耄耋之年, 仍孜孜不倦有系统的整理她的回忆录, 见证着神的恩典和她美丽丰盛的人生, 实在令人敬佩!

张紫明 Lydia Cheung
前香港医务卫生署护理署长
写于 2011 年三八妇女节



大英帝国勋章; 上面写着:“为上帝和帝国”。

³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客序三 (司昆仑博士, 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对钟陈可慰女士非凡人生的最初了解是从她的女儿，我在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的同事钟端铃那里得到的。尽管未曾有机会与陈女士见过面，但在读了她的回忆录后仿佛感觉我与她早已相识。我希望很多读者也会通过这本回忆录认识、并了解她，同时也会像我一样，敬佩她的勇敢与胆识，并为她赋予冒险的精神所折服。

读者对于陈女士的回忆录的关注可能最先缘于她作为护士，为著名的“飞虎队”服务的那一段经历。那是一段发生在珍珠港事件，即美国卷入第二次大战之前，由美国飞行员组成的“飞虎队”在中国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历史。然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上看，这本书更加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讲述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其他话题。更主要的是，书中明确记载了在中国历史中，女性在西医领域的重要角色。早在 20 世纪初期，陈女士的母亲就曾作为医生在广州大力传播西医理论。后来到了香港，从事护士职业继续她的职业追求。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辗转各地，追随着支持中国革命的事业。书中记录的另一位女性——常姐，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由于陈女士的母亲每天在医院工作的时间很长，常姐则承担起照顾陈女士和她弟弟的责任。

回忆录中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其他话题还包括陈女士关于在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后，不得不前往中国西部城市的艰难旅程的记载，以及基督教对于陈女士和她周围的朋友们的影响的描述。所有的这些不仅是宝贵的历史文献，更是一段精彩人生的鲜活记录。

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写于 2011 年九月五日
美国纽约州水牛城 (布法罗)

钟陈可慰女士被迫念为美国退役军人

2012年一月十七日，美国国会议员何超 (Hochul) 女士在美国纽约州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庄严的追念仪式，将一份美国光荣退役军人文件颁赠予前飞虎队及美国十四航空队护士钟陈可慰女士。这份退役文件及美国国旗在国会的要求下，于2011年九月廿八日悬挂在首府上；因为于钟女士已离世，她的次女钟端玲代表出席。端玲从何超 (Hochul) 女士手上接过文件后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道：[我的母亲确是奉献了她的一生作无条件的服侍；尽管这个退役军人的认可是迟来了一点，但我仍是感谢美国国会议员何超 (Hochul) 女士及其他议员努力争取，令母亲可以得到她当得的荣誉。



DD FORM NO. 256A 1 MAY 50



女儿钟端玲代表钟陈可慰从美国众议员 Hochul 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奖牌。2012年



钟陈可慰和爱夫钟华亮的联合军事葬礼, 2012 年 4 月 7 日,
于多伦多 Mount Pleasant Cemetery.

FOR IMMEDIATE RELEASE
January 17, 2012

Contact: Fabien Levy
(202) 225-5265

CONGRESSWOMAN HOCHUL TO PRESENT POSTHUMOUS HONORABLE DISCHARGE TO DAUGHTER OF WORLD WAR II VETERAN

WILLIAMSVILLE, N.Y. – Today, Congresswoman Kathy Hochul presented the daughter of United States Army nurse and World War II veteran Rebecca Chung with honorable discharge papers for her mother's service to our country.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onor the brave men and women who served our nation and risked their lives for our country," said Congresswoman Hochul. "Rebecca Chung and her family waited nearly 70 years for the honor and recognition she earned, and I am pleased I could finally present Mrs. Chung's family with their mother's honorable discharge papers."

Mrs. Chung was recruited into the 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This group consisted of American Aviators commonly known as the Flying Tigers who fought against Japan. Once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the war, the group was organized into the US Army Air Corps in 1942. Mrs. Chung ser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until July 1943 when she joined th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CNAC). In 1993, CNAC air crew members were awarded veteran status; however, this recognition was not extended to Mrs. Chung.

After years of attempting to receive her discharge papers, Mrs. Chung passed away last month, days before Congresswoman Hochul's office was able to obtain the papers. Congresswoman Hochul presented the discharge papers to Chung's daughter, Deborah Chung, a resident of Amherst.

"My mother dedicated her life to nursing and unconditional service," said Deborah Chung. "Though her veteran status is nearly seven decades overdue, I want to thank Congresswoman Hochul and her staff for finally giving my mother the honor that she rightfully deserves."

After the war, Mrs. Chung moved to Canada and wrote a memoir entitled "Piloted to Serve." Rebecca Chung passed away on December 7th, 2011.

第一章：与护士工作的情义结

我能够有幸亲历飞虎战及驼峰险是基于我是一名护士的缘故；我以护士的身份参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合作的抗日行动，经历乱世中的人间祸福，目睹抗日英雄的英勇作战精神。我与护士工作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我的童年是以护士宿舍为家的。我那超时代行习西医的母亲、献身反清革命的父亲、道德教育严谨的外祖父、提供非凡教育的拔萃英文女子中学、军训一般的护士训练及认识上帝的真理对我性格的塑造有莫大的裨益、影响及栽培。

- 1.1 在日军攻占下沦陷的香港
- 1.2 先人的典范
- 1.3 自小聪明的母亲
- 1.4 献身革命的父亲
- 1.5 超时代行习西医的母亲
- 1.6 军伐时代出生于广州
- 1.7 住在护士宿舍的人生头三年
- 1.8 三岁初尝寄宿生涯
- 1.9 住在外祖父家的幼年
- 1.10 重返护士宿舍与母亲同住
- 1.11 学习钢琴、中国武术及普通话
- 1.12 认识上帝
- 1.13 香港拔萃女校攻读英文中学
- 1.14 护士学院受训

1.1 在日军攻占下沦陷的香港

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日本帝国一直为了能扩张其版图而努力不懈,特别对地大物博的中国更是垂涎三尺。自十九世纪中叶明治维新至廿世纪初,执政者不断地鼓吹军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作好准备。

廿世纪时期正当世界经济大衰退,日本一方面为了摆脱国内的经济困扰,另一方面为满足其征服世界的野心,遂于 1937 年爆发中日之战,并且将其军事侵略扩展至太平洋地区。

1941 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于翌日(十二月八日)空袭香港启德机场;当时驻守香港的军人约有二万多名,主要来自香港,英国,印度及加拿大。意想不到其中一位来自香港的军人日后竟然成为我的丈夫呢!盟军虽仍顽强地作战,可惜在势均力敌底下,日军成功地登陆,并且向新界和九龙半岛推进,在短短的六天时间就占据了整个九龙半岛;日军继续向香港岛推进,香港终于失守,总督杨慕琦于 1941 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半岛酒店签署了投降书,结束了为期十八天的战事,香港居民在日本的欺压底下渡过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辛岁月。

香港抗日期间,我是一名护士学生;其实从三个月大开始,我便以护士宿舍为家了,至于选择护士作为我终身职业的原因,则要追溯回童年的生活体验和经历了。

1.2 先人的典范

我来自一个可算得上是书香世代的家庭;外曾祖父周学舒[字励堂] 牧师 (1826-1916; 妻子姓张 1826-1859) (图 1.1 及 1.2) 是基督教循道卫理教会⁴之华南教区的第一位被正式按立的华人牧师(在任期由 1877 至 1916 年)。1839 年英国伦敦宣教组织差派了何逊医疗宣教士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到中国来,在广州建立了一所极受市民欢迎的惠爱医馆,外曾祖父周学舒牧师也在这事工上奉献金钱资助医馆的建立及运作。

⁴英国循道总会 (The Methodist Church of Great Britain) 是韦斯利牧师 (John Wesley 1703 - 1791) 于 18 世纪在英国所创立。

那时梁发牧师⁵ (Rev Fat Leung, 1789-1855) 也在医院里协助。当年的满清政府对宗教没有兴趣, 更仇视那些由外地把福音带进中国的宣教士, 因此对他们施行不同程度的迫害; 梁发牧师就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他曾被判重刑三十大板。1852 年外曾祖父周学牧师蒙恩得救, 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 于是年 63 岁的梁发牧师为我的外曾祖父周学牧师施行浸礼, 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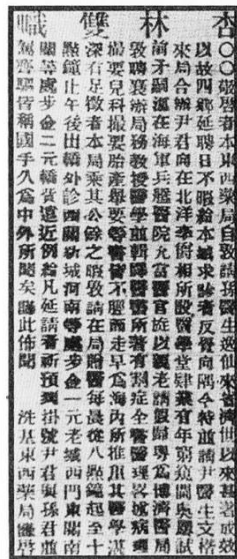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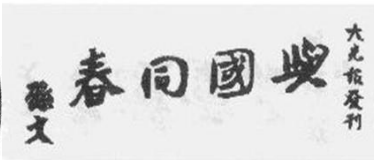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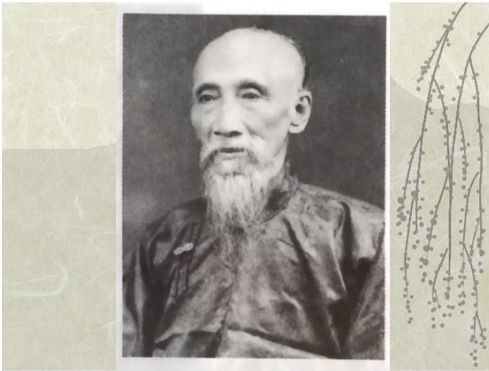


图 1.1: (上) 梁发 (站) 和传教士马礼逊 (坐) 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中文; (中) 外曾祖父周学 (字励堂) 牧师。(下) 我的舅公尹文阶; 孙中山 1912 年 5 月为由尹文阶创立的大光报题词; 孙中山和尹文阶联合西医诊所的广告。

⁵梁发又名阿发, 1810 年在广州的印刷厂工作, 因而认识了第一位由英国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 (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当时马礼逊牧师正在埋首将圣经翻译成中文, 须要梁发协助印刷, 随后于 1813 年另一位由英国来华的苗威廉牧师 (Rev William Milne, 1785-1822) 与马礼逊牧师合作翻译圣经, 故此他认识了梁发; 1816 年苗威廉牧师为梁发施行浸礼, 又于 1821 年, 梁发被马礼逊牧师按立为牧师, 自此梁发便成为当年英国伦敦差会的第一位华人宣教士。

1851年一月，英国循道会义务教士俾士 (George Piercy, 1829-1913, 于1851-1883年在广州传教) 为了回应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异象，自费来到香港；未几，俾士被英国循道会差派到中国来；为了适应陌生的环境，他先在广州的一所贸易公司工作，二年后，于1853年俾士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建立教会，为循道会在华南地区的工作奠下良好的基础。我的外曾祖父周学舒牧师正是被基督教循道会按立为牧师，牧养教会足有三十九年之久(图 1.2)。据母亲说，外曾祖父的英语水平在当年的华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我想是因为他与外国宣教士经常有着频密的接触有关罢。外祖父周清泉在耳濡目染底下，其英文程度与其父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那羣外国宣教士的中文老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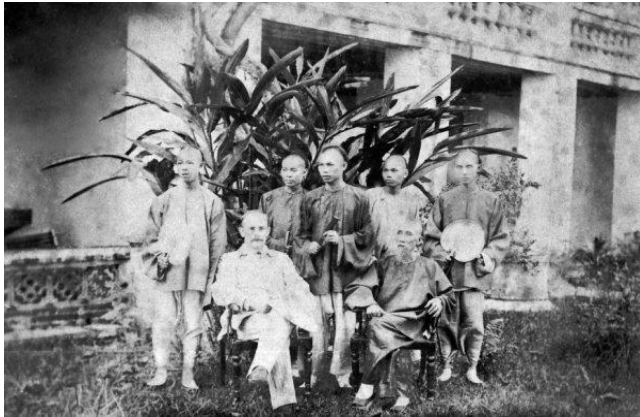


图 1.2: 外曾祖父周学舒牧师(左图前排右一, 右图中排右三, 白色长胡子者); 上图坐在他左面的是外籍宣教士(可能是英国循道会的俾士 George Piercy, 1829-1913); 此照片摄于广州循道会的草地上。上图摄于夏天, 下图摄于冬天。



图 1.3: 母亲周理信 (1890-1979) (左),
外祖母尹月娇 (1854-1924) (中) 和五姨妈周理真 (1888-1927) (右)

我的外祖母尹月娇 (1854-1924)(图 1.3) 的父亲尹维清牧师 (我的外曾祖父) 是被英国伦敦传道会所按立的华人牧师, 在广东省博罗县的基督教传教站工作。外祖母的弟弟 (母亲的舅父, 亦即我的舅公) 是尹文阶医生 (1867-1927), 他是首批香港华人学习西方医术其中之一人, 他更是当年香港中华医学会 (Hong Kong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20-22; 香港医学会的前身) 的首届主席; 他与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 (1866-1925) 毕业于中央书院, 即现在的皇仁书院 (Queen's College); 尹文阶医生又是当年在香港及中国广泛流传的一份基督教报章 [大光报] 的主编。孙中山先生是一名基督徒 (由美国的宣教士在香港为他施行浸礼), 因此他也曾执笔为 [大光报] 题词 (图 1.1 的下方)。孙中山和尹文阶两位西医联合开设西医诊所, 他们的广告在图 1.1 的下方。在辛亥革命中尹文阶暗暗地庇护了孙中山很多。他们的友谊很深!

尹文阶医生的外父是区凤墀先生 (Mr. Fung-Chi Au, 1847-1914), 是孙中山先生中学时的语文老师, 区凤墀先生曾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总书记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ffairs), 1911 年广华医院 (其后我任职的医院) 开幕典礼时, 区凤墀先生还是该庆典的主礼嘉宾呢! 区凤墀先生是英国宣教士于 1888 年在香港岛半山区荷里活道七十五号所建立的 [基督教道济会堂] 的长老。 [道济会堂] 邻近当年孙中山先生习医的 [香港华人西医学院], 因此孙中山先生也在此教会聚集敬拜上帝。由于小小的 [道济会堂] 容纳不下迅速增长的信徒, 因此一座宏伟的大教堂于 1926 年在原址被建立了, 并且命名为

[合一堂]。[合一堂] 就是我与华亮组织家庭后一家人往敬拜及侍奉上帝的教会；据悉华亮的父亲钟挺超不但在此聚会，更在经济上支持[道济会堂] 呢！我的外祖母尹月娇可称得上是一名女中豪杰；人家千金小姐，大家闺秀都踏着那双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走路，而她却拖着一双大脚来去如风；年轻时的外祖母，不但饱读诗书，且魄力惊人。当年她有见于妇女的地位低微，又看见她们不单止好好的一双纤足要被迫缠上，更没有机会接触这个多采多姿的社会；于是她排除万难，独力创立了一所书斋，仿佛名叫[爱羣女子学校]，竭尽全力，为的是要建立那些可怜的女性，使她们不至成为文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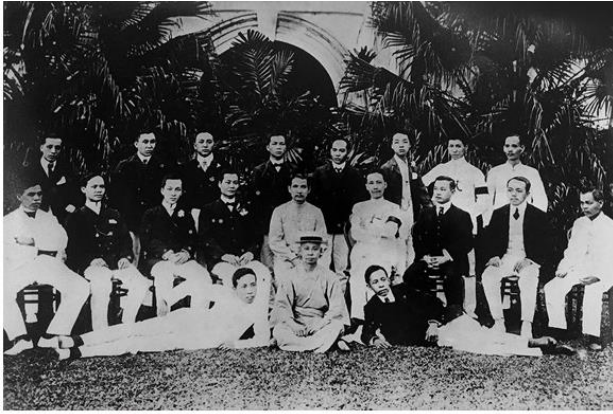


图 1.4: (上) 孙中山先生 (第二排左五) 在 1907 年三月在新加坡与大姨丈黄康衢医生 (第二排左二), 陈楚楠 (第二排左三) 和张永福 (第一排右一)。陈楚楠(1884-1971)和张永福曾与父亲在 1907 年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所有出席了都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下左) 黄康衢和他的儿子在 1929 年。(下右) 大姨妈和他的孙子黄子奇在 1930 年。 <http://davidtkwong.net/>

住在新加坡的大姨丈黄康衢医生(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先后同学，他们都是基督徒)积极地参与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工作，他是中国同盟会南洋分会的主要成员(图 1.4)。在 1900 年孙中山的日本好友宫崎寅藏(1871-1922，一

位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来新加坡探访寄居在邱菽园(1873~1941, 华侨巨商)家的康有为(1858-1927, 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 不料康有为怀疑他想行刺自己, 便向英殖民地政府告发, 于是宫崎寅藏被捕。孙中山接着从西贡赶来新加坡营救, 不料自己也被扣留。黄康衢和其他几个在新加坡的同志向当局说明宫崎寅藏无意暗杀康有为, 结果宫崎寅藏被判驱逐出境, 永久不得进入新加坡, 而孙中山则被判五年内不得进入新加坡。

大姨丈黄康衢和他的妻子(我的大姨妈周瑞莲, 1881-?) 和儿子(我的表兄秋)经常来香港探望我的外祖父周清泉; 外祖父称呼他的大女婿为康衢。

1.3 自小聪明的母亲



图 1.5 母亲周理信和香港荷李活道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学校,在 1902 年间。

母亲周理信 (1890-1979) 亦颇具其母之风范,小小年纪便在书斋里面协助母亲打点一切。当时她的年纪虽小,,然而她却能把 [四书五经] 背得滚瓜烂熟。外祖母觉得十分奇怪,细问其原由,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聪颖过人,她只是在书斋中听到学生们高声诵读,就能够把课文牢牢地记在心里;此外,母亲的学习能力亦奇高,后来当她有机会正式念书时,才发现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这个得天独厚的先天本领,加上她后天的努力,日后终成为一名西医,但那则是后话。

外祖母所创办的书斋是一所正式向香港政府注册的学校,在运作上与一般学校无异,故此每年教育局都会派出一名查学师,实地考察及监管学校的运作情况;查学师更会在课堂上坐席,以便了解教学的质素是否合乎标准。某年,查学师如常到访,冰雪聪明的母亲在课堂中对答如流,查学师在赏识之余,更把她举荐至当年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 (Belilios Public School, 图 1.5) 就读; 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成立于 1890 年,是香港第一所由官方设立采用中英双语授课的学校; 在她的同学中, 有后来成为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 YWCA) 第一任秘书长之单德馨女士。

1.4 献身革命的父亲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是当时的社会文化, 母亲也没有例外。在父母的安排下, 她于 1911 年一月七日与比她年长七岁的父亲陈步贤 (1883-1965) 结婚 (父亲是商人陈瑞汉的儿子); 主礼的牧师是在香港圣公会圣士提反堂的霍静山牧师 (图 1.6); 当年她廿岁, 比起同年龄的女孩子, 她是属于迟婚的, 相信与她醉心于学业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的工作是监管机械技术员的运作,他同时又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父亲得到陈少白 (1869-1934 年, 孙中山的医学院同学和四大寇之一, 图 1.7) 和谢英伯 (1882-1939 年, 一个突出的报纸工作者) 的推荐, 于 1905 年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 (成立于 1905 年) (会员号码是香字 22349), 献身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 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在国内他曾任广东支部宣传员及韶关忠党党员, 于 1950 年间获得蒋介石总统 (1887-1975) 颁赠奖书; 与爸爸特别要好的国民党员是韩文惠先生;在一次国民党员的宴会中, 所有参加的宾客都要穿上长衫及马褂, 而父亲只有长衫没有马褂, 韩先生立即把自己的马褂借给父亲。韩文惠先生后来在香港成为一名太平绅士 (Justice of Peace) 及获英女皇颁赠 MBE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名衔。



CERTIFICATE OF MARRIAGE.
婚姻執照

(Hongkong Ordinance No. 7 of 1875, Section 20.)
香港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第七條則例第二十款

1901. Marriage solemnized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at Victoria
一千九百零一年 行合婚禮在香港 聖士提反堂

No. 數號	When Married. 合婚日子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Age. 年歲	Condition. 本身	Rank or Profession. 職業	Residence at the time of Marriage. 當婚期住址	Father's Name and Surname. 父親姓名
54	Jan: 7 th 1911. 1901年2月23日 一千九百零一年	陳步覽 Chan Po In	27	初婚 Bachelor	機卷 Engineer	波共頓街五號 5 Possession St.	陳瑞漢 Chan Sui Hon
		周鳳華 Chau Fung Wa	20	初婚 Spinster	讀書 Student	砵典街四十一號 41 B. Canton St.	周清泉 Chau Seng Chien

Married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according to the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by Rev. J. H. ...
行合婚禮在 聖士提反 禮拜堂照依英皇廿 教會婚禮 由 官憲批准 主禮此

This Marriage was solemnized between us { Chan Po In } in the Presence of us { Chau Seng Chien } 霍靜山
合婚本人簽名 周鳳華 證人簽名 Chau Seng Chien

图 1.6: 父母亲在香港举行婚礼,这是由香港政府所签署的结婚证明文件,文件中母亲的名字是周凤华,那是她的别名。证书上有外祖父周清泉及主礼牧师霍静山的签名。

因为父亲忙于革命和革命后的活动,而且他的意念是“先国而后家”,父亲留在家里的日子普遍不多。以陈少白(1869-1934)的推荐,父亲于1906年赴新加坡,在那里他帮助陈楚楠(1884-1971年,原本是橡胶制造商)和张永福(1872-

1957年, 原本是橡胶鞋制造商) 开办与革命相关的中兴日报, 首次出版的报纸是在1907年八月二十日, 每天分布1000份(图1.8)。他在新加坡还创办开明书报社, 积极鼓吹推倒满清政府。父亲在新加坡筹得军费三万余元以购买军械及资助革命同志回国参予革命活动, 又把购得的军械运回国内。

1916年父亲在广州的电船厂任职, 并且在1920年参与建成粤汉及广九两铁路, 又运载粤军由福建省的漳州市至六百五十公哩以外的广州市。

1922年父亲参加了晚上在广州总统官邸的入侵; 官邸总统是孙中山(非常大总统)。这次袭击是因为拥有广东军事实力的陈炯明(1878-1933年) 反对孙中山, 在政变中陈炯明得到洪兆麟(1876-1925年, 二师指挥官) 的协助。由于政变, 孙中山逃走。入侵两天后, 父亲逃到香港(图1.9)。



图 1.7: 四大寇约在 1888 年, 四个中国学生在香港西医学院 (香港华人西医学院)。他们立志要推翻中国清代。坐在左起: 杨鹤龄, 孙中山, 陈少白和尤列。



图 1.8 : 1907 年 8 月发行的中兴日报 (我的父亲帮助在新加坡开始)。

⁶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ur_Bandits (公共领域)



图 1.9: 父亲陈步贤回香港后亲手书写的一份中国国民党党员抚恤调查表, 献交台北市的中央党部。

父亲在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后返回香港, 隐居于由母亲所兴建位于香港新界青衣岛咸田村一号的房子, 并且于 1950 年十月十日[双十节] 时写下二则革命纪念诗(图 1.10)。在父亲的遗物中, 发现有一名片纪录了另一首革命诗, 诗句如下:

笔口醒黄魂
身心谋利群
年金蒙国给
矢志重三民

其一
鐵血戰殘清
言文新里隣
事成換故業
敵屣視功名

其二
不避歷艱辛
推行大合群
終身無建樹
愧對古今人

图 1.10: 1950 年父亲陈步贤隐居香港青衣岛时亲笔写下的革命纪念诗。

1.5 超时代行习西医的母亲

母亲于 1911 年诞下一名女儿,取名陈润田,不幸在数月后瘟疫中便夭折了,她的心如刀割,正因为自己曾经历过丧女之痛,明白到眼巴巴看着自己挚爱的亲人病逝而爱莫能助的苦况,再加上丈夫又经常不在身边,于是决志习医,冀望将来可以造福人群,帮助有需要的人。



图 1.11: 母亲周理信在夏葛女子医学院的毕业照。

她考进了一所在广州知名度颇高的夏葛女子医学院⁷(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即其后的岭南大学), 这所医学院只培育女西医, 而且入学及毕业的要求相当严格, 更由夏葛医生 (Dr. Hackett) 亲自执教鞭; 据母亲说当年她花了不少心力才把医科念毕。结业后, 由于她的表现出类拔萃, 立时得到医学院的青睐, 随即被取录在柔济医院⁸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en & Children, 即现时的孙逸仙纪念医院) 当实习医生, 成为当时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取录在医学院里面当医生的结业生(图 1.11); 跟母亲特别要好的医科同学黄婉卿女士 (图 1.12) 后来更成为我的契娘呢!

父亲看到母亲的努力所得的成果也深表佩服, 不但在行动上支持她, 并且鼓励她全力以赴, 济世行医。母亲对父亲的支持和谅解深受感动, 心想既然自己在知识和经验上已经装备妥当, 就应该是时候实现当初立志造福人群的理想了, 故此她进入了广州有名的柔济医院(图 1.13) 旗下之多宝医局, 成为一名住院医师, 不久更被提升为医院的内外科主任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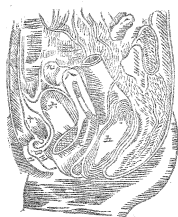
⁷ 由美国的美以美基督教会之传教士所创立的一所学院。

⁸ 柔济医院当年与夏葛女子医学院合作, 亦即是现在的孙逸仙纪念医院。



图 1.12: 母亲周理信(右)与夏葛女子医学院 (Hackett Women Medical University) 同学黄婉卿(左)于1910年代摄于广州; 1920年我在广东省柔济医院的多宝医局出生, 在石岐医院当医生的黄婉卿医生替我接生, 当时母亲是柔济医院的医生。

圖之器殖生子女



<http://mt.sohu.com/20161207/n475199829.shtml>



图 1.13: 顶部两张照片: 母亲的一本医学教科的 (线装) 的头版和内页, 这本书由美国医生编写, 翻译成为中文。中部三张照片⁹: 在广州柔济医院化学实验室工作的妇女。底部两张照片: 母亲周理信医生 (中排右二) 与柔济医院全体员工在医院的草地上合照。

1.6 军伐时代出生于广州

廿世纪的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内战频频,大大小小的暴乱,各城各乡随处可见,我就是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出生的。1920 年父亲从星架坡返回广州后不久,我在母亲任职的多宝医局出生,是父母亲的第二个孩子;替母亲接生的正是我的契娘黄婉卿,她是广东省石岐医院的注院医生。当时正是 [陈济堂军伐时代], 广州经常发生可怕的暴乱,那时父亲不在广州,母亲孤身一人,一方面要同时兼顾工作及养育刚出生的我,实在有点为难; 另一方面亦为了我的安全,只好无奈地带着

⁹ <http://news.qq.com/a/20100411/001143.htm> (公共领域)

当时只有三个月大的我(图 1.14) 离开广州返回香港。然而, 父亲留在广州, 在那里他活跃在政治工作。



图 1.14: (左) 1920 年母亲周理信抱着刚出生的我与父亲陈步贤合照; (右) 替母亲接生的黄婉卿。

作为一个在广州市政府的议员, 父亲不怕发言。1923 年六月四日的中国报纸记录一个案件(图 1.15), 这案件涉及 50,000 元及孙科(1891-1973 年)。孙科是孙中山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卢慕贞(1867-1952 年; 婚姻 1885-1915 年) 所生的儿子; 在 1915 年孙中山与宋庆龄(1893-1981 年) 结婚。

香港本是她出生, 长大及受教育的地方, 然而她的医学训练则源自中国, 在中英两国制度不同底下, 一名在国内备受尊崇的医生亦未能在港获得执业资格; 当时母亲的八弟, 即我的八舅父周怀璋医生, 于香港大学(时称香港大学堂)医学院毕业(1916, 第一届医学士, 八人之一) 后任养和医院¹⁰院长; 借着他的引荐, 母亲只好退而求其次, 在养和医院当起护士长来(图 1.16)。当时香港还没有护士资格的要求, 以她的资历, 当一名护士长实在是绰绰有余的。与此同时, 她还兼职上门替孕妇接生, 她在家中排行第六, 故此被称为周六姑; 由于她的接生技术高明, 周六姑这个名字亦曾名噪一时, 不少香港的知名人士都是由她接生的, 其中有胡恒锦律师的儿女们。在 1924 年她接胡世昌(1924-2006 年) 出生, 后来胡世昌成为香港著名的儿科医生和我表妹周妙坤(我八舅父的第三女儿) 的丈夫。母亲是在香港政府于 1937 年注册的 615 名接生(助产士) 之一。

¹⁰ 养和医院 (Hong Kong Sanatorium Hospital) 是成立于 1922 年的一所私家医院, 位于港岛跑马地山村道二号。



图 1.15: 1923 年中国报纸的评论, 有关父亲作为广州市议员的工作 (公共领域)

1.7 住在护士宿舍的人生头三年

小时候我与母亲同住在养和医院(图 1.16)的护士宿舍里,虽然没有同年纪的孩子与我作伴,我却陶醉于静坐一隅看着护士姊妹们忙进忙出地工作,她们也不时逗着我玩,她们对病人那和蔼可亲,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信这亦是我日后选择护士成为我终身职业的原因之一。

在我二岁半的时候,小弟陈霏东(1923-1994)出生了(图 1.17),一家人挤在护士宿舍里,原本已是非常忙碌的母亲,如今更是百上加斤了,可幸母亲聘请了常姐(吴桂常)照顾弟弟,好使她在忙碌中仍能兼顾工作。想不到日后常姐更照顾我的两名女儿,成为我家中宝贵的一员呢!



图 1.16: 1932 年港督贝翎爵士(Sir William Peel, 1875-1945, 前排右七; 任期 1930-1935) 参观养和医院留影; 母亲周理信(周六姑) 护士长(中排右五); 院长李树芬医生(前排右六); 八舅父周怀璋医生(前排左二); 周寿臣爵士(前排左六 1861-1959; 香港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 任期 1922-36); 罗旭龢爵士(前排右四; Sir Robert Kotewell, 1880-1949; 香港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 任期 1931-41); 周煥年爵士(前排左三; 1893-1971; 香港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 任期 1937-39, 1946-59); 李树培医生(前排右一; 1903-2005); 王子传医生(前排右二); 温植庆医生(前排左一); 四舅父周怀新妻子的弟弟; 欧五姑(中排右四; 她是母亲所教的第一届护士毕业生之一); 陈国光男护士(中排左七; 于广州毕业, 其女陈焕灵是母亲的契女儿); 图中左面二楼(称为东二楼)为病房; 右面二楼为割症房。 <http://www.hksh.com/chi/> (公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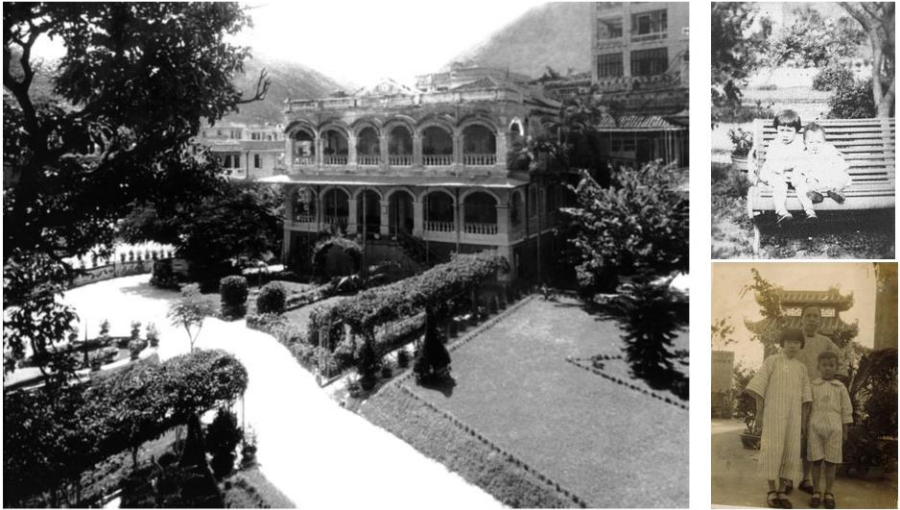


图 1.17: (左)¹¹ 养和医院门前美轮美奂的花圃树木, 是常姐那任职花王的兄长的精心杰作。图左有一圆形的小水池, 池中有常常发出“唧唧”声响的小青蛙。护士宿舍在后山旁边(图右上方看不见的地方)。(右) 我, 我的弟弟和母亲。

1.8 三岁初尝寄宿生涯

三岁是我适龄入学的时候, 母亲开始为我的入学筹算, 因为工作的关系, 她实在腾不出时间接送我往返学校; 可她素常对下属的爱护赢得了她们的尊重, 纷纷提供不同的方法予以协助, 其中的一位护士卢八姑的侄女儿所就读的飞利小学及幼儿园¹²可以提供寄宿服务, 母亲虽然因为我的年纪太小把我送往寄宿而心有不忍, 无奈处于当时的环境, 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然而学校方面认为我年纪太小, 以未能照顾我为理由拒绝给予取录, 后得卢八姑那只有十岁的侄女儿认真地答应照顾我日常的起居生活, 学校才破例接受我的入学申请。现在回想起来, 一个只有十岁的女孩每天都尽忠职守地替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洗澡, 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实在感受到天父从小便保守眷顾的深恩厚爱。

¹¹<http://www.hksh.com/chi/> (公共领域)

¹² 飞利小学暨幼儿园 (Primary School & Kindergarten Boarding School) 是圣公会圣士提反女子中学 (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 所附属的小学和幼儿园, 位于港岛的列提顿道。

从未离开过母亲的我,一下子要独自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一个星期里面只有周末才可以跟她有二天相处的时间,我心里极为难过;我的年纪虽小,不明白母亲的处境,但我深知母亲爱我,若非逼不得已,她绝对不会把我送往寄宿学校去。我不敢告诉母亲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多么地渴望能留在她身边,那管只是多留一刻也好;可是周末过后,我还是乖乖地让她把我送返学校。每天晚上独自睡在床上就是我最孤单寂寞的时刻,思念母亲之情尤甚,经常都是流着泪入睡,泪水湿透了枕头;后来卢八姑的侄女儿把这情况告诉母亲,她为此感到十分难过,相信其难过的程度亦绝不在我之下,逼于无奈,她唯有另想办法去处理这问题。

经友人的介绍,母亲认识了郇光小学的吕陶英校长;位于跑马地黄泥涌道大石鼓对面的郇光小学与母亲任职的养和医院相近,步行只须廿分钟左右;她跟吕校长只认识不久,可是为了使我不再离她太远,只好恳求吕校长收留我在校寄宿;吕校长知道母亲的处境困难,几经考虑后,终于答应破例取录我成为一年级的寄宿学生;她先把我接到学校去,然后在她的房间里开放一张帆布床,好让我与她同睡在一起,免得我感到孤单;与我们同住一房间的还有副校长林婉芬(她们都没有结婚),二人十分疼爱我,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又教导我女红如缝纫,编织和绣十字布等等。母亲差派常姐每天都给我送来午饭,每次常姐都耐心地花上一小时的时间来等待我把午饭吃完;而晚餐则与校长及副校长同用。尽管如此,我心底里还是十分想念我的母亲,每星期都期待周末早点到来,好使我能与她相见。如此我在郇光小学渡过了差不多二年的寄宿生涯。可是好景不常,学校要搬迁了,位于跑马地礼顿道的新校址离母亲工作的养和医院比前稍远,却是与外祖父的家相近。

1.9 住在外祖父家的幼年

外祖父对母亲说:[孩子年纪小,不要让她寄宿了!把她带来与我同住罢,这里有表弟妹跟她作伴,而且有佣人可以照顾她,也不要留在郇光小学了,就让她跟表妹上同一所学校好了]我的八舅父母(周怀璋, 1894-1965, 妻郭綺卿 1897-1953)和他们的儿女都与外祖父周清泉(1853-1942, 周牧师的长子)同住在租来位于跑马地礼顿道三十三号二楼的一幢一大厅一大房的寓所内(图 1.18),外祖父住在大房里而所有的子孙及佣人都在大厅中睡觉,惟有我得天独厚,可以与外祖父同睡一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名专用的佣人去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而我的佣人名叫勤姐。寓所的楼下是八舅父的医务所;寓所的对面是[兰亭餐厅],那里的红豆冰实在美味可口,我省吃俭用的把零用钱储起来,当兴致来到的时候,我会到那里去购买那五仙港币一杯的红豆冰;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乐趣无穷呢!

我跟表妹周妙儿(1921-1970)特别要好,她比我少一岁,在圣保罗女子学校¹³小学部就读,因此我也由邨光小学转至圣保罗女子学校,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每天都有司机(亚寿)接送我们往返学校。圣保罗女子学校从小学一年级便开始教授英语,对一个从未接触过英语的我来说,在学习上是极为困难的。为了使我在学业上能够追赶得上,母亲每天下班后,大概在晚上六至七时左右,风雨不改地花上半个小时由养和医院经黄泥涌道(图 1.19)步行至外祖父家替我补习英文和教导功课;为此我心里很是满足快乐,因为知道我所盼望见到的母亲必定会每天按时与我相聚;所以我总是匆匆吃过晚饭后就坐在大门前等待,直等到她在门前出现了,便立即扑入她怀中,让她抱着我走进屋子里;那一天当中我最快乐的时刻。然而当她要离去时,心里面依依不舍之情又不禁犹然而生;我暗自在心底下立志要作一个好孩子以答谢她这份恩情。

人人都称赞我是一个乖孩子,我也确信自己真的是一个乖孩子;我并不是为博取人的欢心,我只知道并且明白这是我的本份。还记得勤姐跟母亲述说的一则往事,一天晚饭后,外祖父分给每小孩一个橘子,表妹妙儿不但手里拿着自己的橘子,还把我的也抢去了;勤姐跟她理论,但我对勤姐说:[由她拿去吧,一个橘子算不了甚么,她年纪小不懂事,况且我住在别人家里,不要生事了。]母亲听后还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良久也不放呢!



图 1.18: (左) 外祖父周清泉摄于香港跑马地礼顿道的寓所前。(右) 八舅父周怀璋医生。

¹³ 圣保罗女子学校位于港岛坚尼地道,于 1915 年由圣公会创办,附设小学部,后来易名为圣保罗男女中学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图 1.19¹⁴: 跑马地赛马轨道, 在 1931 年。黄泥涌道在轨道的周围。

我的八舅母周郭绮卿也很疼爱我, 每年的圣诞节她必定送我一一份圣诞礼物, 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只人造宝石的别针, 我一直都把它好好地保存着。星期天我和表弟妹都随着八舅父到位于铜锣湾的圣公会圣玛利亚堂崇拜, 并且参加主日学习圣经真理, 透过圣经, 我开始认识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外祖父是一名不苟言笑及外表严肃的人, 家中各人都忌他三分, 其实他的性格却是内柔外刚; 他十分爱惜我, 每天清晨佣人替他炖的 [五更鸡], 他总是留下一些给我喝。晚上, 我被安排与他同住一个房间, 勤姐是我的佣人, 也得与我们同住; 每天晚上他都会起来替我盖被子, 我还常常看到他也替勤姐盖被子呢! 外祖父非常看重孙儿的生日, 他规定每一个孙儿都要由其父母为他们在家中摆设二至三桌子的筵席庆祝; 价值数元一桌子的酒席相对于当年母亲在养和医院每月只赚取六十元的工资来说, 是颇感吃力的; 外祖父因为知道她的经济情况而愿意花钱为我设宴, 但母亲婉拒其好意, 坚持自掏腰包。如此我在外祖父家里住了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

1.10 重返护士宿舍与母亲同住

到了九岁的时候, 我突然患上了急性盲肠炎, 养和医院的院长李树芬医生¹⁵ (1887-1966, 院长任期由 1926 年至 1966 年; 图 1.16) 亲自来到我的住处为我诊治; 因为情况危急, 我立即被送进养和医院, 由李树芬医生替我动手术; 可是手

¹⁴<http://www.flickr.com/photos/53652797@N06/5350928725> (许可)

¹⁵ 李树芬医生在 1908 年毕业于香港华人西医学院, 曾任孙中山先生政府的公共卫生局长。

术后,我的伤口发炎,当时盘尼西林抗生素 (Penicillin) 尚未被发明, 因此我在医院里卧病足有五个月之久。出院的时候, 李医生向母亲提议把我带返养和医院龙潜台护士宿舍与她同住; 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母亲抱着我爬上通往宿舍足有三层楼高的户外木梯级时, 我依偎在她的怀中轻声地问道: [妈妈, 我是否很重要呢?] 她当时没有回答, 只是把我搂得更紧。

李院长知道我大病初愈需要母亲悉心照料, 因此特别为我们分配了一个特大的宿舍单位, 好使我能留在母亲身边而不用再返回外祖父家; 我们一家人对李院长这份情意一直都心存感激。

自此以后, 我和弟弟, 母亲及常姐一起住在医院宿舍里, 常姐照顾我们一切起居饮食, 使母亲可以专心工作; 我最喜欢吃常姐所烹调的鲑鱼, 而弟弟霸东则喜爱梅菜蒸猪肉(图 1.20)。司机亚寿仍旧如常接送我往返圣保罗女子学校, 直到我小学毕业为止。



图 1.20: 我和我的弟弟

1.11 学习钢琴、中国武术及普通话

当我开始读小学的时候, 母亲发现我在音乐方面有点天份, 于是开始让我学习弹奏钢琴, 她不惜付上昂贵的学费聘请当时极负盛名的钢琴老师兼作曲家 Harry Ore¹⁶到我的住处, 就是外祖父的家教授我及表弟妹们; 后来当我返回养和医院护士宿舍与母亲同住时, 她更为我购买一部钢琴放在宿舍里,好使我不会因为迁离外祖父而停止学习。

¹⁶ Harry Ore 的钢琴作品包括:Five South Chinese Folk Songs; Three Latrian Folk Songs Op.27, 1958 年及 Two Lyric Pieces for Pianoforte Op.9, 1926 年。

一向注重身体健康的父亲认为锻炼体格亦是十分重要，他安排弟弟和我，连同表弟耀孙及表妹妙儿一同到香港坚道附近的精武体育馆学习北少林中国武术之十二路[潭腿]功(图 1.21)，我们每星期最少练习一次，有些时候是二次，而每次的练习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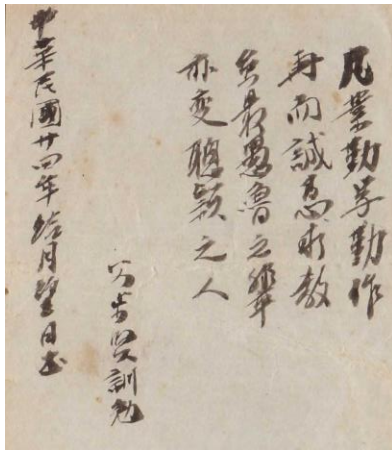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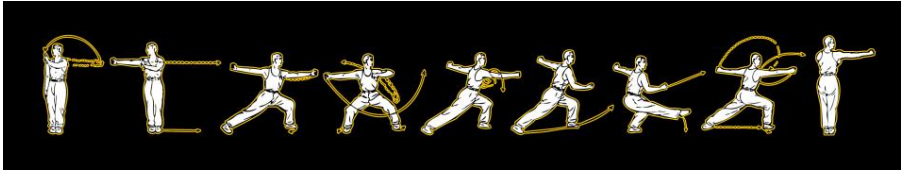


图 1.21: (上)潭腿之首招起首式; (下) 1935 年父亲的诗，这首诗强调勤奋的重要性。

十三岁那一年的暑期，母亲突然安排我到港岛湾仔的一所学校(学校名字已忘记了)跟徐宗科老师学习普通话;当时我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当年普通话是不通用的，但我仍是顺从她的旨意，每天随着常姐往返学校，并且用心地学习。我十分佩服母亲那份有远见的智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在中国当军人护士的时候，当年所学到的普通话便大派用场了。

父亲经常写诗教有关如何正确生活(图 1.21);他十分支持我们作多元化的学习，但他却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把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忘掉了。犹记得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那时是 1946 年，他曾经从广州来信指出我用词不当的地方，并且予以更正;例如 [恳蒙晒纳] 是不对的，[恳请愿晒纳] 才是正确的; [母亲寓于敝公司宿舍] 应改为 [母亲暂寓敝公司宿舍]; [但未知能以实行否] 应为 [但未知能实行

否]; [尊此顺候] 应改为 [肃此敬候] 等 (图 1.22)…。父母亲为了培育我成才, 所花的心血可真不少啊!

可慰爱女覽六月廿日回玉巴閱五萬元亦已于六月十日收到以後有信付差
 当寄交廣州市有党都鄧蕙芳委員務支不可將信付交郵政匯票局因不
 合該局定規之每萬元匯費若干此改用匯費若干用郵匯最單未知是
 否屬是此後匯款當擇最少匯費之法行之以免多耗匯資汝今回信對我
 極尽孝思并甚感銘汝之國文今仍幼稚大有貽笑大方之可能[思慕西約
 当寄]思請西約因我未會操及汝之五萬元所以汝不宜用這票子又請核
 算步[当寄]請核[算步]又母親暫寓於港啟公司宿舍[当寄]母
 親暫寓啟公司宿舍不必多寄港多致使又理不佳且續費不甚收之版
 有沙石又但未知能以意行否[当寄]但未知能意行否不必用多一個以
 又回港而余等過面[当寄]回港而[女等]會面不宜用過字代會字又尊此順
 候[当寄]葉此敬候我三筆曹作一册一本名友一人中要銀兩寄嘉嘉之稿
 異知甚詳矣汝不宜隨母信隨一副若至之貨再則多耗往返使用我包已失業將
 有兩月忠孝常再期後恐甚憂之汝若按月付銀兩
 又步[當寄]廿五年七月十六日
 以後有信付來寄付交 廣州市廣東省都鄧蕙芳委員務支 (款項亦可照办)

图 1.22: 1946 年我在上海工作时, 父亲从广州来信指出我在信中用词不当的地方。

1.12 认识上帝

孙中山先生常常与家人一起在家里敬拜上帝, 我们一家也没有例外。每个星期日的晚饭后, 家里的女佣人便会摇着铃召集所有的家人, 包括外祖父、四舅父周怀

新、八舅父周怀璋、九舅父周怀佑、母亲、我的表弟妹和我等十多人，由八舅父主领崇拜；我们聚在一起唱诗歌、祈祷、读圣经及听道；负责讲道的主要是八舅父，间中是九舅父（八舅母与九舅母是姊妹，所以她们儿女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有些时候年长的后辈如我和弟弟霏东等也被安排讲道呢！后来我在玛丽医院接受护士训练时，即使是如何地忙碌，我仍是尽量抽空参与这个有意义的家庭崇拜活动呢！

每星期日的早上，我都会与母亲、弟弟、常姐和外祖父一同由司机亚寿开车往位于香港坚道的循道公会（后称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崇拜和上主日学，当年的牧师名叫黄仲凯。正如上文 1.2 所说，此教会乃是我的外曾祖父周学牧师曾牧养过的，又于 1936 年从坚道迁往湾仔新建矗立宏伟的堂址，由外祖父施行动土礼（图 1.23 及 1.24）。事实上教会对我日后的生命影响极其深远，在圣经的教导下我渐渐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对祂爱慕之情与日俱增；1939 年我经历了神的带领，[重生] 得救。



图 1.23: 约 1935 年香港湾仔循道公会由外祖父同清泉（右起第 5）动土。



图 1.24: 香港湾仔的循道卫理基督教会于 1936 年完成 (上); 这座教堂 (下) 是我敬拜上帝的地方; 1937 年牧师黄仲凯亲笔书写[灵粮]二字作了一个匾额送给我,提醒我紧记圣经是我属灵的食物。

当年我十九岁,正在玛丽医院接受第二年的护士训练。在一个当值下午更的晚上,我忙于穿插在病房之间,准备在换班之前的半小时内(下午班于晚上九时半结束)把所有病房的灯光放暗;当我来到五楼外科病房的时候,看到十九号病床的一名年约廿多岁的年轻女病人正在阅读。职责上,我必须让她知道在晚上九时后,医院病房的灯光将要被放暗,好使病人能早点憩息;于是我趋前与她搭讪,闲聊间知道她正在伯特利神学院修读神学,如今她正在阅读圣经。突然她十分严肃地问道: [你信了耶稣没有?]

我答道：[我信，并且我自小到教会敬拜上帝。]

她继续追问：[如今你是否已得救呢？]

我毫不考虑便答道：[假若我现在要离世的话，我相信我是得救的，因为我向来就是一个好孩子；况且如今我那么年轻，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十分遥远呢……!]

[依你所说，你还未得救；设若如今你在水中挣扎求存，就会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得救，因为在水中是浮是沉，只有自己最清楚。] 说罢，她打开圣经，读出以下出自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的一段经文：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她叮嘱我用心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意义，并且解释人的得救并非在乎有好行为，乃是靠着神的恩典。

经过约十天的思考，我终于明白过来；我立即跪下向神祷告认罪，并且得着祂的赦免；像如释重负般，我心里顿觉轻省，因为我深知自己得到了救恩，我的灵魂得与神的灵连系，从此神成为我的至爱，又是我最好的朋友。

教会是我属灵的家，在这里我亲身经历到主耶稣基督那无穷无尽的爱，与弟兄姊妹相交的甜蜜，其中的姊妹如屈浩梅与我一生为友，我们的感情从未因为环境的变迁而间断过，因为大家都确知我们得享永生的福乐。后来我又参加与我在玛丽医院一同学习的护士余秀芬 (Irene Yu) 在护士宿舍里，有时在玛丽医院对面地方比较宽阔的薄扶林基督教坟场内查考圣经，学习圣经真理，对我的属灵成长很有帮助。

虔诚爱主的母亲在循道教会忠心地侍奉，而我也开始学习侍奉；从十三岁开始到八十岁，无论我在世界的那一个角落，都一直在教会的诗班主唱女高音，用上帝赐给我的歌声来赞美那又真又活的全能者；我唱过无数的诗歌，其中包括由名作曲家韩德尔 (G.F. Handel) 所写的著名神曲 [弥赛亚] (Messiah)。

1.13 在香港拔萃女校攻读英文中学

母亲对培育我的重视, 由她四出搜集资料, 使我有机会接受最好的教育即可见一斑。她知道拔萃女书院 (Diocesan Girls' School)¹⁷ 是一所众望所归教学严谨的中学。待我小学毕业后, 便请求她那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四兄周怀新 (我的四舅父, 1886-?) (图 1.25) 带我往投考, 顺利的考进了这所全香港最有名望的贵族女子中学; 这所书院最特别的地方是以全英语授课及以英语交谈 (包括课余的谈话), 老师们全都是外籍人士; 同学们非富则贵, 大部份来自英国, 而且多是英国派注香港政府任职高级官员的女儿。这里的学费十分昂贵 (每月港币十元)。为了使我能获取最佳的教育, 母亲不惜胼手胝足地替我支付昂贵的学费。另一方面, 因为学校以法文代替中文作为第二学习语言, 她只好聘请一名中文老师替我补习中文, 免得我把自己的祖国语文都荒废了。



图 1.25: 我的四舅父周怀新

¹⁷ 拔萃女书院 (Diocesan Girls' School) 位于九龙佐敦道; 于 1860 年由基督教圣公会创立, 是香港最早期由圣公会所创办的女书院之一。一直以来, 这所学校在香港被排名为顶级中学。



图 1.26: 我在拔萃女书院的同届同学: 后排由左至右: June Hall、我; 前排由左至右: 邓慧根(Hannah Tang)、Leona 和 Ellen Hunt。

最初的时候, 我 (洋名 Rebecca Chan; Rebecca 这名字是圣保罗堂的牧师在我婴孩受洗时送给我的, 她是圣经人物以撒之妻子,) 未能实时适应学校的全英语制度, 所以感到有点落寞。每天早晨开始上课之前, 我们的学生长 (Head Prefect) Joyce Anderson Symons (她后来成为拔萃女书院的校长) 就会摇铃来召集所有中学同学齐集在最大的班房接受校长 Miss Sawyer 逐一点名, 当校长点到自己的名字时, 学生必须立刻回答: [Present, Miss Sawyer]; 最初的时候, 我实在不习惯响应快速的英语对话, 及至校长呼叫了我的名字还是懵然不知, 幸得旁边的同学推我一把, 我才懂得响应呢! 有见及此, 母亲又为我聘请一位老师替我补习英文, 以加强我与同学及老师之间的沟通能力; 其后表妹周妙儿也由圣保罗女子学校转校在此供读。我渐渐地融入学校的生活, 与同学们和谐地相处, 在班中我的成绩经常都名列前茅, 主要是因为数学科目上我比别的同学优胜之故。跟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是胡恒锦律师之女儿胡紫瑛 (Jean Woo) 和邓肇坚爵士之女儿邓慧根 (Hannah Tang), 我们一同于 1938 年中学毕业, Miss Frances Steel 是我们毕业班的班主任; 我还记得她曾与我们全班同学往沙田旅行呢 (图 1.26)! 虽然毕业后我们各自建立自己的事业及家庭, 然而这数十年间我们一直都保持紧密的连系, 友情从未间断过。




图 1.27¹⁸: 拔萃女书院; 我每天上学的旅程使用巴士和渡轮; 烟雾从渡轮顶部升起。

这段中学的日子把原本个性独立的我操练得更为成熟; 我所居住的护士宿舍位于港岛跑马地, 与位于九龙半岛的学校有着一水之隔, 当年我只有十三岁, 每天早上六时多起床, 吃过早点后便得赶搭公共汽车, 到中环的天星码头乘坐渡海小轮至九龙半岛, 再换乘另一程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学校, 所需用的时间足有一个小时; 连回程的时间计算在内, 我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超过二个小时 (图 1.27)。

拔萃女书院的校训是 [天天服侍] (Daily Giving Service), 当年全校的学生总数约二百人, 校长是 Miss H.D. Sawyer (任职期 1925-1939 年)。同学中年纪比我

¹⁸ <http://www.millionwebs.ws/heritage> (公共领域)

长的有日后成为拔萃女书院校长的 Dr. Joyce Anderson Symons (任职期 1953-1985 年) 及后来成为圣保罗男女子中学校长的罗怡基博士 (Dr Bobby Kotewall, 她是 Sir Robert Kotewall 罗旭龢爵士的女儿)。

G.  R.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LOCAL EXAMINATION SYNDICATE
Hong Kong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Admit Candidate Number .. 87 ..

Name .. REBECCA CHAN ..


School .. DIOCESAN GIRLS' SCHOOL ..

Signature .. Rebecca Chan .. Date .. Feb. 23rd 1938 ..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attached photograph is a true likeness of

Rebecca Chan

Signature (across the photograph) of the Head of the School or College presenting the candidate.



(P.T.O.)

图 1.28: 1938 年香港英文中学会考准考证 (Hong Kong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相片上面是拔萃女书院校长 Miss Sawyer 的亲笔签名。

拔萃女校是一所全日制的的女子中学, 学生必须要在校内或校外午膳; 我的家离学校甚远, 因此母亲每天都会给我港币十五仙作为午膳的费用。 每天中午我与同学们如胡紫英 (Jean Woo)、Christina Wong、Lily Kong 及表妹周妙儿一同往学校附近的溢昌饭店午饭; 很多时候我会花上十仙来购买叉烧面, 把余下的

五仙储存起来，但是间中我也会花上五仙去购买零食的；若肚子实在饿了，我会忍痛地花上全部十五仙去购买一客扬州炒饭。溢昌饭店是拔萃女校学生经常在午饭时光顾的地方，其实很多拔萃男校的学生也慕名而至，他们不惜乘坐巴士到此午饭；我想他们另有目的，就是希望能结识拔萃女校的学生；后来事实证明不少拔萃女校的学生与拔萃男校的学生结合呢！

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在拔萃女书院完成了四年的中学课程。图 1.28 是我于 1938 年参加香港英文中学会考的考试证，Sawyer 校长在我的相片上亲笔签名。

1.14 在护士学院受训

中学毕业后，母亲本属意我供读大学预科，然后继续升读大学；那时弟弟霭东正在拔萃男子中学就读，而且他生性聪颖，也是一名读书的好料子。我非常认识我的母亲，她绝对会不辞劳苦地拼命工作，为的是要同时供给我们姊弟二人最佳的学习机会。她为我已付出很多了，我实在不忍心见她日以继夜地工作；我愿意将进修大学的机会让给霭东，经过详细的考虑及在神面前多方的祷告，我决定放弃读大学的梦想，转而投身护士行列。(当时香港的护士训练在医院而不在大学，所以毕业生没有得到学位。)

初期的香港没有护士制度，直到 1931 年，香港政府制订了认可注册护士条例，所有护士必须具备政府的认可资格才能执业，因此母亲便失去了当护士长的资格；于是她唯有在养和医院转职为手术室主任，又为李树芬院长作蒙药师；可是当年的药物没有今天的先进，若长期当蒙药师会引致身体的白血球降低，如此即等如慢性自杀，为安全起见，李院长把她调派至医院的行政部门工作。

母亲的辛劳更加强了我决心选择护士作为终身职业的决定。1938 年十一月我考进香港政府设立之护士学校(图 1.29)，被派到玛丽医院¹⁹接受训练(图 1.30)。因为医院工作正在扩大，每个月都有新的护士生加入；我入学该年的学员超过八十人。整个基本课程为期三年，完成这课程后，第四年须往医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实习训练，学员非但不用缴付学费，每月还可支取薪酬港币四十元；我从薪酬中每月腾出十八元给医院作为我的食宿费(若是一个月里有三十一天的话，费用则

¹⁹ 玛丽医院位于港岛薄扶林道，命名于英王佐治五世(1865 - 1936)之妻子玛丽皇后；于 1937 年开办时，原本七层楼的医院病房，因为护士人手不足而只开用两层。当我在 1938 年进入该医院接训时，医院已经有足够的人手去使用所有七层。

是十八元六角, 换句话说, 每天的费用是六角), 又从薪酬中支付五元给父亲作生活费用, 如此母亲的经济担子顿时减轻了。至此我正式展开了护士生涯, 写下了人生重要的一页。



图 1.29: 在玛丽医院当护士学生; 白色小帽子是学生的记号, 帽子以白色的通花布捆上波浪型的花边, 制服是粉红色, 所以被称为“Pinky”。



图 1.30: 玛丽医院的主楼。

这个为期三年密集式的训练过程是十分艰苦的; 我们每天工作八小时, 每星期最少有两次于下午二至三时在课堂上上课, 课程全部采用英语。担任教授的老师包括两名高级英籍护士及多位外籍和中国籍的医生; 在课堂中, 老师讲解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留心去听, 更要用最快的速度笔录下来, 作为自己温习之用 (当年的影印术还未盛行, 老师没有为我们准备笔记)。虽然老师没有要求我们做作业, 除

了毕业考试之外, 平常也没有举行考试, 然而我们亦不敢掉以轻心, 课余及工余后也勤加温习, 因为所学的数据实在太多太广了。每四至六个月我须要轮值当一次非常辛苦的夜更。

训练期间, 护士学员必须每六个月轮流在每层楼去实习。楼高七层的医院大楼, 地层是门诊部、急症室、消毒室和商店; 二楼是配药房、X-光检验室及医生及医院员工的办公室; 三至七楼才是医院病房, 每层楼都有六个院翼, 其中的五个院翼是可以安放廿张病床的大房, 只有一个院翼是一至四人的私人病房。



图 1.31: 我(左一) 和香港政府医院的总护士长 Miss Everett (右一)摄于 1950 年代护产联会护士节庆祝日;中立者是护士汪赖基(她是汪彼得牧师之妹)。

还记得我是在三楼进行第一年为期六个月的实习课程, 三楼是内科病房, 并且划分学习院翼(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使用)及非学习院翼二部份。而第二年的部分实习则在六楼(外科病房)进行;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来自英国的 Miss Everett 作该层楼的护士主任, 在训练期间, 她曾经亲自向我示范如何为病人床作上浴; 她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我接近毕业的时候, 在割症房实习, 无独有偶她又是割症房的主任护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Miss Everett 与其他来自英国的医护人员被日军囚禁在香港的集中营里面, 战争过后, 她返回英国, 但是她于 1950 年代再临香港, 受聘于香港政府旗下作所有医院的总护士长(这是当时香港护士行业最高荣誉的职位)。我与 Miss Everett 很有缘份, 当她就任香港政府医院总护士长的期间, 在每年的护士节, 我们都会在香港护士产科士联会

(Hong Kong Nurses and Midwives Association; 我是该组织的委员) 中碰头, 并且彼此问好 (图 1.31)。样貌娟好的 Miss Everett 一直都保持独身不嫁。话说我们护士学员的工作包括替病人打针、派药、放药、放尿、料理伤口、给病人床上浴、喂食、按摩、定时替他们在床上转换位置以防止褥疮、把病人运送至割症房、在手术室作手术前之准备工作 (如准备手术抬, 将所有应用的手术用具消毒备用)、协助医生进行手术、手术后数点棉花及纱布, 以免留在伤口内。最艰难的工作却是我们称之为 [最后服务] (the last office) 的 [包尸], 因为要清理尸体, 并要独自一人去处理清洁及包裹, 实在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训练的初期, 每当我看见血的时候便感到不安, 但渐渐地也适应下来了。还记得第一次我目睹一名十号床的女病人断气身亡后, 足有一个星期这情景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久久不散, 使我的情绪十分低落, 然而我也慢慢地适应了。

寄宿生涯是严谨的、有纪律性的。宿舍里面有一名舍监负责监管宿舍的纪律, 她每天都会饭餐前点名, 又在每天晚上在宿舍巡视数点人数, 若是未经批准而不在宿舍留宿的话, 将会受到严重的处分; 学员必须预先向舍监申请不在宿舍吃晚饭 (dinner out) 及不会在宿舍留宿 (sleep o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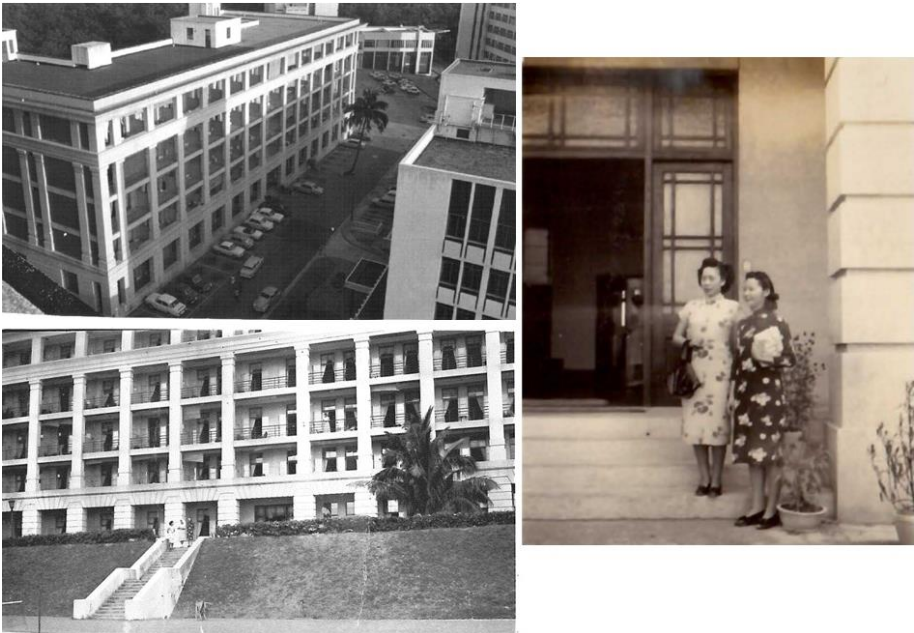


图 1.32: 位于玛丽医院旁边楼高四层之护士宿舍 (上), 我与陈培英在三楼共住一房, 崔少娴与许慧馨则同住在四楼。宿舍的大门入口(下)前门, 于 1949 年左右我与许慧馨访问护理学院。

每天清晨在上班的时候, 学员要在宿舍里按着医院层数由该层最高级的护士生 (Floor Nurse) 领队, 从宿舍步行到医院, 向医院高级护士 (Sister) 报到; 下班时同样由 Floor Nurse 带领到医院高级护士那里登记下班后, 才一起步行回返宿舍, 其情况有点儿像军训一般。在宿舍里使用电梯也有一定的规矩, 出入电梯要按入行的先后次序 (Seniority); 先入行的要先出而后入者后出; 虽然这样做是有点儿不方便, 但这是医院的条例, 是规定性的, 人人都得遵守。

医院宿舍楼高四层, 面向西面海湾, 环境优美 (图 1.32); 前面海景单位是高级护士的单人房, 我与培英共住在三楼向后山的双人房, 另外二位与我相好的同学崔少娴与许慧馨则住在同一方向的四楼。宿舍的环境实在优美, 特别在黄昏日落之时, 看着太阳慢慢地落到水平线以下之海面上, 天空中一片金黄, 真是美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不由得赞叹天父创造的伟大。晚饭后我喜欢独个儿到医院对面的基督教坟场 (图 1.33) 去唱歌和练声, 每星期一次, 每次约一个小时。



图 1.33: 位于医院对面海天一色, 风景如画的基督教坟场 (图中左下角一片白色的地方)。

与我最要好的同届护士同学是陈培英 (Daisy Chan)、崔少娴 (Hilda Tsui) 和许慧馨 (Gertrude Hui)。少娴和慧馨也毕业于拔萃女书院, 但他们比我高班。香

港沦陷之后，我们便要各散东西，三年的同窗共事使我们的友谊根深蒂固，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于是我们四人不理战乱，跑到香港湾仔的照相店，拍下了一张极具纪念性的照片（图 1.34）。后来培英与我一起逃难到中国，在飞虎队当护士；少娴和慧馨则仍留在香港。

许慧馨之父亲许立三，在香港开设 [中华帽厂]，制作西式男仕帽子；他于走难时乘船（[三丸]号）由香港逃往澳门途中，因为沉船而丧生，与他同船的数百名乘客亦全部罹难；当年此事在香港十分轰动，报章上均以头条新闻记载之。因此慧馨没有跟我和培英逃难，她留在香港作父亲的遗产承办人，处理其业务。和平后，我与丈夫华亮返回香港定居，慧馨更成为我长女敏玲的契娘呢！



图 1.34: (上) 与我最要好的同届护士同学: 由左至右: 陈培英、崔少娴、我和许慧馨 (后立者)。(下) 由左至右: 陈培英、我和许慧馨。

第二章：在战火中逃亡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华后攻占香港, 1941年十二月的香港沦陷期正是我任职护士的开始。为了逃避日军的欺压, 我从香港逃难往自由中国, 历尽几许陆路及水路上的艰辛, 逃过多少从日军、交通、恶劣的天气、盗贼及骗子而来的危难才经广州、曲江、桂林及贵阳而到达战时的首都重庆; 每一站都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在前路茫茫, 一步一惊心的情况下渡过每一天。如今回想起来, 实在深深体验到神奇妙的看顾, 使我在体力上、心灵上及经济上都得到充足, 更可以向与我一起逃难的亲友拔刀相助。

- 2.1 香港十八天的抗日战事
- 2.2 日军统治下的香港
- 2.3 日军轰炸香港医院
- 2.4 及时的护士毕业证书
- 2.5 从香港逃难到广州
- 2.6 从广州逃难至曲江 (260 公哩)
- 2.7 从曲江逃难至贵阳 (1200 公哩)
- 2.8 从贵阳逃难至重庆 (500 公哩)

2.1 香港十八天的抗日战事

香港虽然是英国殖民地, 然而英国政府似乎不愿意为保卫香港而负上多大的责任。事实上英国政府深知道香港军事实力薄弱; 1941年驻守在远东的英军指挥官曾要求英国政府增加香港驻军, 然而首相丘吉尔却认香港压根儿就没有得胜

当时负责防守香港的军人主要来自英国、加拿大、印度、香港的义勇军、皇家炮兵团、港星炮兵团及皇家海军等约一万四千人；然而这支军队全部来自不同的国家，又没有受过特殊的军事训练；相比之下，有约五万二千人的日军在数量上已占尽优势，加上军队士气高昂并且在军事上有充分的训练，双方的军事势力优劣立见。

战事开始时，日军出动空军轰炸启德机场，击落了五架英军战机和八架民航机，轻易取得航空控制权；十二月九日，228 团队突击城门碉堡，金山失守，醉酒湾防线被日军攻破。十二月十二日日军占领青衣岛，留守在九龙半岛的港军虽仍尽最后努力（图 2.2），最后仍是乘坐驱逐舰退到香港岛；此时日军派代表向英军劝降，但为总督杨慕琦所拒绝。



图 2.2²⁰: 在 1941 年十二月日军挺进于香港九龙尖沙咀火车站。

十二月十四日，日军空袭北角油库，229 联队炮轰鲤鱼门港口（丈夫华亮就是在此战役中受重伤）；日军占领鲤鱼门要塞，再攻入香港义勇军第五防空兵团驻守的西湾炮台后，即展开大屠杀。三大联队继续由九龙半岛向南推进，联队横过维多利亚海港迅速在香港岛登陆（图 2.3）。

²⁰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attle_of_HK_03.jpg (公共领域)



图 2.3: 1941 年十二月日本军队登陆香港岛。

十二月廿一日，日军围攻浅水湾及赤柱，加拿大军团队仍奋勇抵抗，廿二日至廿四日日军突破加拿大军团，香港岛马己仙峡防线失守。十二月廿五日，港督杨慕琦爵士 (Mark Aitchison Young; 任期 1941-1947) 于下午五时向日军司令部投降；当天晚上七时，一群英国殖民地官员在杨慕琦爵士的带领下到香港半岛酒店三楼三三六室签署投降书 (图 2.4)，结束了十八天的抗日战争。当天是圣诞节，香港人称之为 [黑色圣诞]，香港从那天开始沦陷了，三年零八个月被日军统治的辛酸岁月展开了。



图 2.4²¹ : 1941 年十二月廿五日港督杨慕琪在香港半岛酒店向日本投降。

²¹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attle_of_HK_05.jpg (公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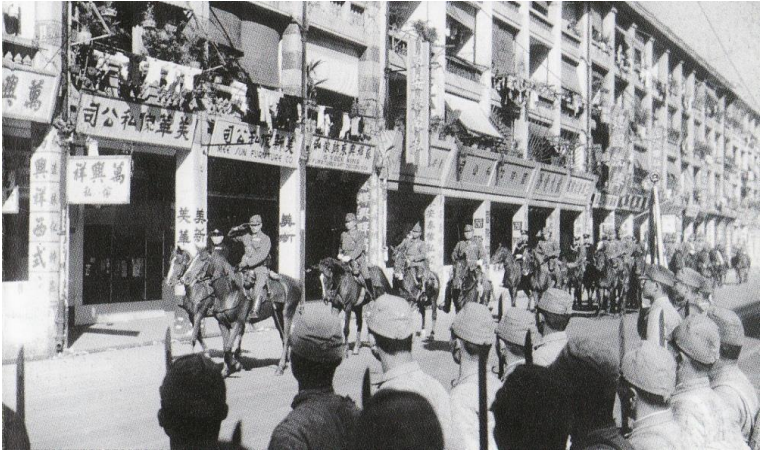


图 2.5²²: 日军登陆香港后, 军队在街上游行。



图 2.6: 1941 年十二月廿八日, 一批被日军俘掳的战俘被押解至集中营。



图 2.7: 1942-1945 带着包裹往探望战俘的亲友在香港深水埔集中营门前轮候, 接受日军检查。

²²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attle_of_HK_06.jpg (公共领域)



图 2.8: 在香港的英国平民被关押在另一个集中营 - 赤柱监狱。



图 2.9 (左): 在集中营的英国平民。

图 2.10²³ (右): 驻港的西方银行家被逮捕, 手携随身行李步行到酒店被软禁。

八舅父周怀璋医生是圣约翰救护队的医务人员, 他在香港马己仙峡的战斗中受伤; 当他坐在汽车内子弹通过他的肺, 而坐在他旁边的人被子弹打死。他的一生都有在他的肺部的血块。

2.2 日军统治下的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在日本帝国陆军担任中将的酒井隆 (1887-1946) 被委任为香港总督。日本军队不但大肆在街上游行 (图 2.5), 以展示其军事势力, 更把捉拿

²³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k_japo_westerner.jpg (公共领域)

到的战俘带到街上游行(图 2.6)至集中营(图 2.7-2.9);甚至西方的银行家亦遭逮捕,被押解到酒店去被软禁(图 2.10)。

丈夫华亮的三兄华驹、四兄华超及八弟华璋同是义勇军人,在抗日战事中有分,又同时被日军捉拿了,是战俘游行中的一份子;游行刚开始不久(游行队伍还在开始点笏箕湾),他们机智地混入旁观的人群中,再悄悄地进入路旁的住宅,爬上天台把军衣脱下,内里穿着民衣而得以逃走脱险。

被捕的战俘及在香港的英国籍居民被关押在位于赤柱监狱的集中营内(图 2.9);该营地位于环境优美的赤柱半岛,面积宽敞,四周的高墙围上铁丝网,并且雇用印度籍警卫看守,以防止被囚禁者越狱逃走;营地除了监房外,更有负责看守监狱的员工宿舍和圣士提反男校。营地的设备齐全,有自来水、电力等供应,且有当时最先进的冲水厕设备;尽管如此,宽敞的营地也未能容纳数以千计的战俘;宿舍过于挤迫、缺乏隐私,再加上粮食严重短缺,使被囚者情绪低落,彼此产生磨擦和争执亦是常见的事。已婚侨居在此的外国人被关进营里面较佳较大的房间,这些房间较大的可容纳多至九人;较小的房间则只可容纳五、六人左右。其他囚禁者及家人都普遍被监禁在一些住满三十至四十人的单位内;他们既没有

床也没有床垫,只好和衣睡在地板上。因为粮食短缺且缺乏营养之故 他们的身体变得瘦弱,体重大幅度下降,有人的体重在短短的时日间骤降七十多磅。

集中营的卫生情况十分恶劣,营内的医院住满了患痢疾和腹泻的病人,也有患脚气病及营养不良的。一些有能力花得起钱,又或是在香港有朋友或亲友接济的战俘,则可以在营里面的食堂购买食品以补其不足,但是大多数人在香港既无金钱,也没有朋友,只好完全依赖每天所配给的粮食,实在是苦不堪言。

虽然被拘禁的战俘身体虚弱,但是他们仍要担当营地的工作,其中包括道路的维修和建设、移动商店、烹饪、烘烤、锯木及除草等。营内几乎所有用品包括、衣服、鞋、厕所的需用品、扫帚和其他清洁材料、盘子、杯子、餐具、锅、刀、叉等都严重缺乏,战俘进入营地时只携带简便的个人物品,日子久了,衣物也渐渐破损了,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有些只好用包装面粉的袋子制成短裤穿在身上,很多人因为鞋子破损了而被逼赤足走路呢!营内生活枯燥乏味,香港大学当局有见及此,于是尝试在集中营为高中和初中班的孩子们安排一些娱乐活动;可是却缺乏玩具、游戏和儿童读物。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器材、半打旧网球拍和几十个旧皮球肯定会使儿童和成年人得到帮助,只可惜资源短缺,他们未能提供有效的帮助。

最令被拘禁者泄气的莫过于损失了与外界沟通的权利。他们只可以在六个月内发送一个简短的电报和寄出两封书信，而信件却绝少被传递到收件人的手中。在集中营的人无法与战俘营或香港的医院沟通，因此，在营地的妻子不能发送邮件给他们在战争中受伤或被监禁的丈夫，也无法收到他们的丈夫的音讯，这实在是人间的一大悲剧。



图 2.11: 香港沦陷, 粮食严重短缺, 饿死的香港人不计其数, 三年零八个月被日军统治下的香港居民都是活在水深火热中。

正如前文 (1.1) 所说, 港督杨慕琦于 1941 年十二月廿五日与日军签下了投降书后, 日军便正式占领香港, 往日灯火辉煌的 “不夜城” 立时变得死寂, 居民陷入极度恐惧中; 在这三年零八个月日军统治下的香港, 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图 2.11)。



图 2.12: 日治时期面额十元之日本军用手票。

日本政府首先对香港实施新货币政策, 以军用手票 (军票: 图 2.12) 替代港元。起初军票对港币的兑换律是一比二, 即是以二港元换取一元军票, 到了 1942 年十月改为一比四, 日军把换来的港币全都运到日本去。由于日本在 1944 年的战争中节节失利, 几乎陷于绝望, 因此日政府在香港发出更多的军票, 导致恶性通

货膨胀。战后香港的市面上还有大量的军票，而手持军票的市民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却是不得要领，这些军票亦顿成废纸，港人损失十分严重。

日治期间，香港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原因是日军从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中抢走了八十万担充作军粮，余下来的食米，日本政府施行配给制度，居民每人每天只可买得六两四钱的配给米。至 1943 年，粮食短缺的情况更严重，米价飞涨，白米由数元一斤涨至二百多元；不少居民因饥饿过度而吃草根和花生髒等充饥，饿死的居民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我的四舅父周怀新在内，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日军另一个令人发指的行径就是设立慰安所，他们任意捉拿年轻的妇女充当慰安妇，作为日军的泄欲工具，因此很多妇女都把自己打扮成丑妇，或扮作疯妇，以逃避日军的魔掌。

香港居民在日军的暴政底下民不聊生，纷纷北上返回中国去寻找安居之所；同时日本政府在香港居民身上已再无利可图，更不愿意负上治理的责任，于是强迫将市民遣返中国，以减少人口数目，那时香港的人口由日战前的一百六十万(1941 年)锐减至六十万 (1945 年)。



图 2.13²⁴: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 1942-1944 的总督矶谷廉介。

矶谷 廉介(1886 – 1967) (图 2.13) 是一日本皇军的将军；于 1942 年二月廿日至 1944 年十二月廿四日期间，他被日政府委派担任香港总督。他的恶行令香港人对他恨之入骨；然而他在任职期间，引进了至今依然令香港人着迷的周末赛马。矶谷 廉介于 1944 年退休后返回日本；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因为他在日军占领香港时草菅人命，犯下滔天大罪而被同盟国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逮捕，

²⁴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Isogai_Rensuke.jpg (公共领域);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Rensuke_Isogai.jpg (公共领域)

并且被引渡至南京受审，结果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不知为何他竟在 1952 年被释放，且获准返回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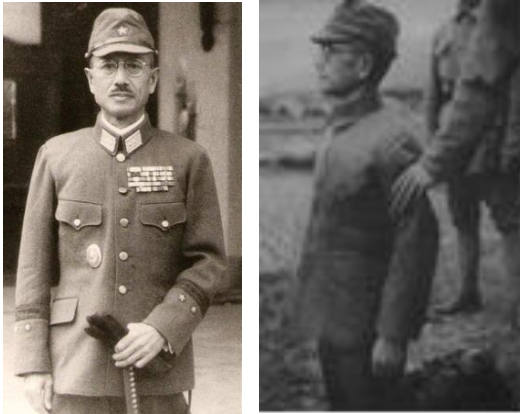


图 2.14²⁵: 日本占领香港后, 田中久一被委任为香港总督 (1944 - 1945)。右边的照片是拍摄于 1947 他被枪毙之前。

田中久一(1889 - 1947 年)(图 2.14) 也是一名日本皇军的将军；他是继矶谷 廉介接任为香港总督，任期由 1944 - 1945 年。战争结束后，他同样被美国逮捕，于 1946 年被押解至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并因盟军战俘被法外处决而受审；他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绞刑。只是在军事战争中他残害中国人，滥杀无辜，故此他被移交至南京的国民党军事法庭再度受审，亦被裁定罪名成立，于 1947 年伏法被枪毙。

2.3 日军轰炸香港医院

1941 年十二月的时候，日本为了攻占香港，不断地施行军事袭击，除了空袭启德机场，炮轰鲤鱼门港口之外，更轰炸香港的民居，致使很多香港居民受害，并且丧失了生命；其中一次严重的空袭发生在 1941 年十二月初，那天日军的轰炸对象是位于香港岛铜锣湾区的圣保禄医院，当时医院内很多医护人员及病人都受了伤，纷纷被送到我所实习的玛丽医院进行治理，伤者当中包括二名在玛丽医院毕业后被派往圣保禄医院工作的护士，她们的名字是石季生 (Lily Shek) 和 Sylvia Chung。石季生的一条腿受了严重的伤害，失血过多，医生为了保存她的性命，决定把她的整条腿在膝盖以上都给切掉了；当时我还是一名实习护士生，正在割症房协助手术的进行，手术后我还亲手把切除了的腿从割症房捧至一个专门放

²⁵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isakazu.jpg> (公共领域);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anaka_Hisakazu.jpg (公共领域)

置手术后残骸的房间。后来我得知石季生因为失去了一条腿而不能再当护士，然而她却受聘于香港政府护士局任秘书，造福人群。另外一名伤者 Sylvia Chung 则被炮弹击中眼睛，在另一割症房接受除掉一只眼睛的手术；至于她康复后的景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2.4 及时的护士毕业证书

1941 年十二月我通过考试，顺利完成了三年的护士训练课程，以解剖学 (Anatomy) 及生理学 (Physiology) 二学科获取优良成绩。刚要开始在玛丽医院进行实习之际，日军于同年的十二月八日空袭香港；当时我正身处于玛丽医院的学生宿舍，母亲为我的安危而牵肠挂肚。其时日军已登陆，占据了整个香港及九龙半岛，街道上一片死寂，没有交通工具，市民大都躲在家中不敢外出。

翌日，母亲打发常姐 (图 2.15)，由她在养和医院任职花王的哥哥陪同下，自养和医院步行至玛丽医院，替我送来了一套黑色的中式女佣衣服，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佣一般，头上包上黑色的围巾，陪着我花上差不多四个小时步行返回养和医院，这四个多小时惊心动魄的经历实在令我毕生难忘；沿途上我们经过多个日本哨兵的站岗，我们要随时准备被盘问；每当经过一个站岗时都要向里面的士兵鞠躬，然后等待他们的批准才可以通过；我心里对忠心地伴随在我身旁的常姐肃然起敬，她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带出险境，免除母亲的挂虑。我深深地感受到天父的保守，常姐是祂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终于平安抵达养和医院，当我看见母亲的时候，就好像仿如隔世一般，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图 2.15: 忠心耿耿地照顾我及弟弟的常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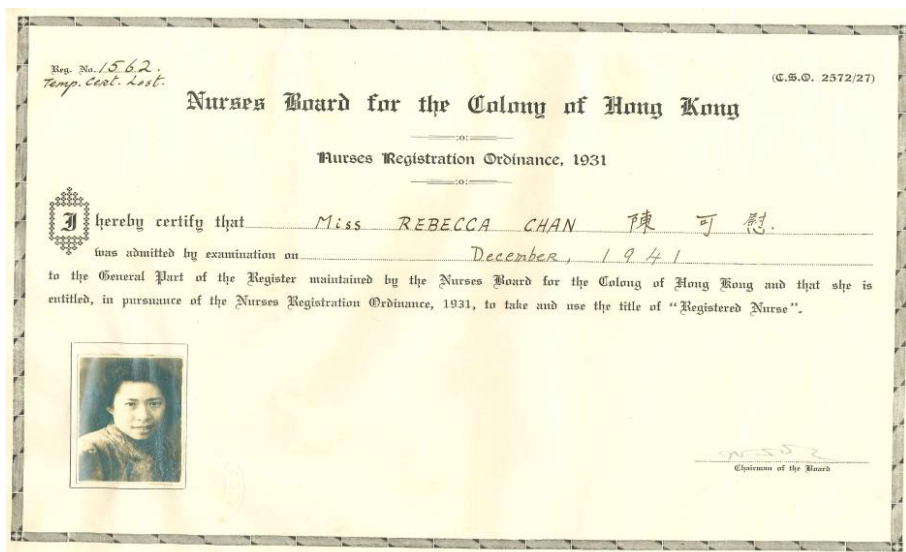


图 2.16: 1941 年十二月香港护士局正式颁发的护士毕业证书。

回家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接获许慧馨的电话（慧馨因为家住九龙而被迫滞留在医院里），她告诉我玛丽医院因为战争之故，日军强自把它征用作为日本军医院，因此护士学校决定为所有通过笔试合格，而尚未考取口试及参与实习考试的学员颁发护士毕业证书；她更嘱咐我尽快返回医院领取我应得的毕业证书。因此我又得再冒险返回玛丽医院领取我的护士毕业证书（图 2.16 及 2.17），万料不到这证书竟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凭着它我可以在战乱中以护士为职业养生，并且还可以供养父母及供应日后成为医生的弟弟完成学业；更意想不到的的是我的护士资历使我有机会在飞虎队作护士呢！在此我要感谢赞美我那信实的上帝，祂的道路是最美最善的，倘若当初我不顺从上帝的旨意，坚持选读大学预科而放弃进修护士的话，我便失去了这个能在战争中执业的机会。

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又说：[当孝敬父母]；我实实在在地经历到遵从上帝的教导及顺服上帝的好处！

G.



R.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Medical Department

CERTIFICATE OF TRAINING.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Nurse Rebecca Chan
 was received as a Probationer on the 1st day of November
1938 and has completed her full term of 3
 years' training in the Medical and Surgical Wards of the Government Hospitals, both
 on day and night duty. During this time her work has been
Very good and her conduct has been Very good

She has attended Lectures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 (a) Elementary Anatomy.
- (b) Elementary Physiology.
- (c) Practical Nursing, Bandaging.
- (d) Elementary Medicine in relation to Nursing.
- (e) Elementary Surgery in relation to Nursing.
- (f) Special Subjects, Malarial Fever, Plague, Enteric Fever, &c., &c.,

and passed her examinations.

Dated the 10th day of December 1941.

Lecturers.

.....

M. Davis
 Principal Matron.

Percy Selwyn Selwyn-Clarke
 Director of Medical & ~~Sanitary~~ Services.

图 2.17: 1941 年十二月十日由香港政府医药卫生署所颁发的护士毕业证书, 上面有总护士长 (Principal Matron) Davis 女士及当时香港医务总监(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Percy Selwyn Selwyn-Clarke (司徒永觉, 1893-1976) 的签名。

2.5 从香港逃难到广州

由于玛丽医院被日本军征用作军用医院，他们因为敌对的关系，不敢录用华人护士，因此护士学院把毕业学生解散了，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医院服务，而我则被派往位于般舍道的拿打素医院服务。

当时香港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日军的暴政统治底下，年老的居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坐以待毙；然而对生命充满着憧憬和盼望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失去工作及上学的机会而心有不甘，于是纷纷寻求出路。1942年三月，一名隶属广州基督教循道会的牧师远道从广州而来，为香港循道会的青年会友及其亲友提供一个返往中国的机会；当时的我因为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只知道离开香港是顺理成章的事，对前途没有任何计划；然而我却深信我所倚靠的上帝必定保守带领，因为祂在圣经中曾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凭着上帝这应许，带着一颗单纯依靠的心，经过祷告后，我决定返回我的祖国（即日军所提倡的[回乡]运动）。临行前，母亲给我一千元国币（大洋）作为我与弟弟的旅费和生活费用，她又恐怕我在途中把钱失掉了，因此特别为我缝制了一条连着一个布袋子的腰带，袋子上面有拉链，钱放在袋子里面，扣上拉链即可确保安全了。在走难的时候，这条腰带子总不离我身。当他弟弟挥手告别母亲时，他哭了。

我的责任非常重大，不但要照顾弟弟，也要照顾好友培英；她的父亲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转投共产党而遭国民党追捕；他逃亡至美国，其妻子则留在香港。培英的母亲没有能力付出金钱让她在逃难时作费用，她与我逃难时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支付的。因此母亲给我的一千元国币，我确是珍而重之的小心地保存着。



图 2.18: 我的好友兼护士同学陈培英 (Daisy Chan)。

如此我们一行八人，包括我的弟弟霭东、表妹周妙儿（八舅父的第一个孩子）、周妙英（九舅父的长女，1922-?）、表弟周耀孙（八舅父的二子，1924-）、我的好

友兼护士同学陈培英 (Daisy Chan, 图 2.18) 和亲戚之朋友郭英祺 (他是香港〔杰志〕足球队后中卫队员) 及柯德富, 随着牧师所带领的百多位青年人一起坐船北上广州 (图 2.19)。



图 2.19: 等待乘船离开香港前往中国的旅程。



图 2.20: 广州爱羣酒店。

我们于黄昏时分抵达广州, 随即被安排入住此地颇负盛名的爱羣酒店 (图 2.20), 我们八人共挤在一个房间内; 据领队说, 在这里住宿比较安全, 可避免日军到来侵扰, 因为日本旅客喜爱入住爱羣酒店之故。

翌日, 我们由酒店迁往位于十八甫的基督教循道会, 我们的造访令该教会的牧师大感意外, 当他获悉我们是周学牧师的后人之后, 即欣然接待我们。领队为我们雇用了一些木头车, 把所有的行李运送往循道会去。入住后的翌日, 政府宣布广州市全面戒严, 我身上只有国币 (大洋), 完全没有此地通用的日本军票, 因为戒严之故又未能外出兑换军票以作生活费, 心里感到十分彷徨无助, 只好祷告天父; 此时幸得郭英祺替我们取得军票, 解决了困难, 在这件事上, 再一次看到上帝的保守及看顾; 于是弟兄们负责购买食物, 姊妹们则负责煮食; 如是者我们

在教会里住了三个星期，直至戒严完结后，才又再起程往广东省的曲江投靠那里的基督教循道会去。

在广州逗留期间，我遇上了在圣保罗小学就读时的莫玉笙同学，从她口中得知我们以前姓夏的圣经老师就住在附近，并且她在家中定时与同学们举行查经聚会；听罢我感到兴奋莫名，我取出圣经，用报纸包起来，手执雨伞（当时太阳十分猛烈）准备依时前往；我实在非常渴望与人一起查考圣经了，因此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治安问题便独自从循道会步行往老师家里去。可能我手中的圣经活像一盒饼干罢，我立时遭到劫匪的光顾（当时广州缺粮，食物昂贵），劫匪把我的圣经抢去了；我忘命地发力狂追，一面追，一面不断地大声喊叫：[还给我！这是我的圣经！]真的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力量，我竟然一口气追了数条街之遙，才用我的雨伞把他勾着，他丢下我的圣经逃跑了；我为了能够夺回我心爱的圣经而感恩不已。

2.6 从广州逃难至曲江 (260 公哩)



图 2.21: 香港及中国西南部的城市 - 广州 (Guangzhou) 附近佛山市 (Foshan) 的芦苞 (Lubaozhen 离广州 56 公哩) 位于北江及西江的交界 (Bei and Xi River); 属于韶关 (Shaoguan) 的曲江 (Qujiang) 则位于芦苞以北约 200 公哩; 曲江西北面 500 公哩是桂林 (Guilin) 市, 贵阳 (Guiyang) 则位桂林以北约 700 公哩。

由广州至曲江的路程相当迂回曲折 (图 2.21)。我们一行八人坐车到广州的西南火车站, 赶乘开往沦陷区边界的火车; 好不容易火车才抵达终站, 此时我们必须攀过山头, 再步行超过二个小时, 经过一个名为 [三不管地带] 的地方²⁶才到达芦苞镇 (位于佛山市三水区的中北部, 距离广州市 60 公里), 然后再经水路从芦苞到曲江(约 200 公里)。我们在这段路程历尽不少艰辛, 吃尽不少苦头, 正是身心灵都受尽了折磨; 个中滋味, 只有身历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我们雇用了数名挑夫为我们担负行李, 一步一惊心地从火车终站步行至芦苞, 所走的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最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必须经过那对我们生命有威胁性的 [三不管地带]; 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 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支撑下去。



图 2.22: 等待日军检查。

我们于早上十时左右抵达 [三不管地带], 前面有一个日本哨兵站岗, 我们必须取得日军的许可才能通过 (图 2.22); 此时天色骤变, 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来, 我们站在哨岗前面等待日军的盘查, 由早上十时直等到黄昏五时, 也没有任何日军由哨岗内走出来查问, 我们只好仍然站在哨岗前等候; 此时我们身上的衣服及行李已全然湿透, 真是饥寒交逼, 身心灵都极为疲惫, 我的脚肿胀得很厉害, 甚至肿至无法把鞋子脱下来; 尚幸我的表弟周耀孙身上有一小瓶他随身带备作急救用的拔兰地酒, 使我们能够喝着取暖, 各人又吃着随身带备仅有的干粮 (炒米饼) 充饥, 才勉强捱过了。约在下午六时, 一名日军自哨岗内走出来向我们打手势, 示意我

²⁶ 三不管地带 (No Man's Land) 位于日军沦陷区及自由中国之间, 是没有政府治理的地方, 因为没有法律制裁的关系, 在这地带出入的人多是三教九流, 为非作歹之辈, 治安非常差劲。

们向前走，如此我们没有接受任何盘问便可顺利过关。最奇妙的是我们一过关后，随即阳光普照，不到半个小时，那曾经湿透的行李都给晒干了；我知道这是我所信靠的上帝的作为，祂透过这些迅速被晒干的行李向我启示，让我明白祂一直在看顾着我，自此我对主的信念更为坚定。

我们继续往前走，于傍晚时分抵达芦苞，由于天色已晚，只好在这里住宿一宵，翌日早晨，即起程经由水路沿着北江前往曲江。开往曲江的是一艘可乘载百多人两层高的渡轮，当渡轮驶达浅水之处时即不能继续前进，否则便会搁浅；因此我们一行八人便须换乘小艇才可以继续前进；小艇的船夫把长竹篙在水底用力一撑，小艇即可在浅水中前进（图 2.23）。船夫并且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前面的另外三只小艇均遭洗劫，而我们则幸免于难，我们却心里明白，这是天父的保守。基于生理上的需要，在乘坐小艇途中，我们须要到岸上小解，而江边的公厕地上满是粪便，无奈只好把眼睛闭上，硬着头皮踏在粪便上走过；这又是一个极难忘的经历；逃离确是很不容易的。



图 2.23 (左): 从芦苞到曲江, 经过浅水的地方须换乘小艇, 船夫用长竹篙在水底用力一撑, 小艇即可在浅水中前进。



图 2.24 (右): 位于广东省韶关市的曲江;抗日期间不少人从香港逃难到此地。

抵达曲江(图 2.24)后，我们入住当地的基督教会，并且立刻往中国政府所设立的[难民救援中心]，报到后实时获得适当的照顾。首先我们每人可以先支取救济金国币一百元，然后接着我们各人不同的需要作出妥善的安排。弟弟霭东和表弟耀孙虽然因战乱的关系未能在香港完成大学预科课程，然而位于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却录取他们成为医学生，让他们继续进修。于是我与弟弟就在曲江分手，我把母亲给我一千大洋所余下的都全数给了他。



图 2.25: 金教授 (Gordon King, 右二) 在四川省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

我在曲江遇上了三名比我先抵达此地又曾与我在玛丽医院共事的护士同学，她们的名字是姚瑞棠 (Sheila Lu, 后来成为葛量洪医院的护士长)，李民光 (Margaret Lee) 和曾浦倩 (Jenny Tsang)。一名由英国政府指派在中国内地照顾医疗人员的大使金教授 (Gordon King, 图 2.25) 在曲江接见我们，并且安排我及与我一起同行的好友兼同学陈培英 (Daisy Chan)，连同以上的三名护士同学和另外三名我不认识的医学生共八人往贵州省的贵阳中央医学院任职或继续进修。他更嘱咐我们先前往位于广西省桂林市之英国领事馆，每人领取国币五千元 (后来我才得知这是英国政府为三年零六个月的香港沦陷期所补发给我们的部份工资)。

2.7 从曲江逃难至贵阳 (1200 公哩)

于是我们八名医护人员立即从曲江起程前往桂林 (图 2.26; 相距约 500 公哩)，再往贵阳 (图 2.27; 相距约 700 公哩)，我们必须先经过火车尾站的金城岗再乘货运车到贵阳；在金城岗我们共逗留了五天，抵步的翌日，立即往那里的 [难民救济所] 报到，所长李赞增为我们安排入住一小酒店 (招待难民的地方)；第五天的凌晨，李赞增所长到来，表示已经找得货运车前往贵阳，只因为车上的空间有限，他叫我们只须携带个人物品，因他稍后会替我们把行李运送到贵阳去。

我们被安排坐上一辆烧炭的运输货车的车顶上 (图 2.28)；我们坐在货物上，并用双手抓住支撑帆布覆盖的栏杆。沿途真是惊心动魄，每当货车经过架空架着的电线及沿途的大树时，我们必须立时伏下躲避，以避免被缠住；这实在是一程令我毕生难忘的危险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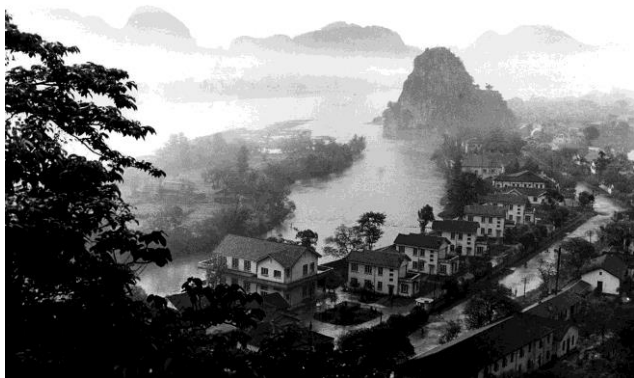


图 2.26: [山水甲天下] 的广西省桂林市一如其名, 风景美丽如画。



图 2.27: 贵州省的贵阳市, 绿悠悠的梯田一望无际。

至于我们行李的下落则一直是个谜, 尽管我后来发出了多封信予李赞增去查询, 也不得要领。后来弟弟霭东经过金城岗时, 竟然看到我的衣服被挂在大街上摆卖呢! 如此我便失去了我的行李, 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藤书包, 里面有一直不离我身的圣经, 一本福音圣诗集, 毛巾, 牙刷, 漱口盅及睡衣等。虽然我失去了当时是我财富的衣服, 却想不到因为没有包袱的缠累, 我出入则轻便得多了。为此我感谢神, 祂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祂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后来我在飞虎队工作时才领悟到, 正如圣经所说: [我似乎一无所有, 但却是样样都有] 呢!



图 2.28: 负责运输的 [公谊救护团] 货车。

2.8 从贵阳逃难至重庆 (500 公哩)

抵达贵阳后,我和好友陈培英都没有像其余六名医护人员一般立时到金教授所引荐的贵阳医学院里报到,因为培英对留在贵阳的兴趣不大;她选择再深入内地到重庆去投靠在那里执业律师的哥哥陈衡剑。我与培英的感情深厚,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她的决定就等于是我的决定。

我们只在贵阳逗留了二天,于第三天早上便离开贵阳。当时因为没有火车,我们便去在贵阳的[公谊救护团]办公室(所有在此办公的人都是洋人)询问什么时候会有一辆货车前往重庆。于是我们免费乘搭 [公谊救护团]的一架运载供应物资的货车往重庆去(图 2.28);经过历时半天的旅程,于当天黄昏时分我们便抵达重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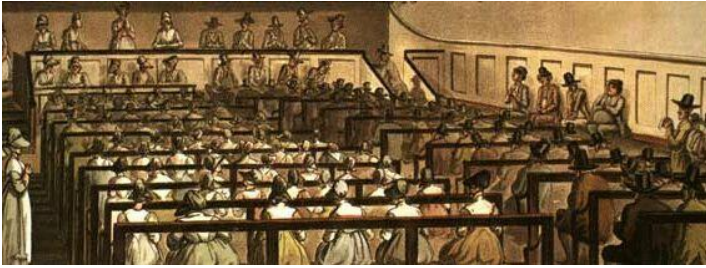


图 2.29: 贵格会崇拜的特点是在沉默中等待神发言。

[公谊救护团] (The Friends' Ambulance Unit, 简称 FAU) 是一个以救援服务来见证和平的组织, 由一群热爱和平的英国 [贵格会] (Quakers, 图 2.29) 基督徒所成立。[贵格会] 与中国颇有渊源, 早于 1886 年, 首批 [贵格会] 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

其实 [公谊救护团] 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成立了, 目的是让那些对这类服侍有负担的人提供一个服务人群的机会, 救护团的主要成员仍是来自英国 [贵格会] 的信徒, 其中的一个机会自然是护卫中国了。

为了减轻同盟国际救援队 (当年救援队的基地设在成都) 对中国的救援工作, [公谊救护团] 于 1940 年向英国政府申请加派救护团成员到中国予以协助。他们早期的工作主要是将医疗物品由仰光运载到中国; 据估计, 当年 90% 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医疗物品 (包括毛巾、毯子、肥皂、牙膏、医药、医疗用品、医疗设备等) 都是 [公谊救护团] 负责运送的。1941 年一群为数四十人的 [公谊救护团] 成员齐集仰光, 将货车改装成为流动医疗站及手术室 (所有物资由美国提供), 为中国平民提供医疗服务。1942 年五月, 日本占领了缅甸, 切断了同盟国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一条最重要亦是唯一的通道 (滇缅公路) (图 2.30) 后, 运载物资的工作才被空运所替代; 尽管如此, [公谊救护团] 在中国境内仍然为市民服务, 他们与中国红十字会联手在医院作救援的工作 (图 2.31 及 2.32)。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公谊救护团] 的车队成为中国主要国内的运输工具, 由 [驼峰航线] 空运至昆明的医疗物品都是由 [公谊救护团] 运送至中国卫生局及各大医院的。1945 年大战结束后, [公谊救护团] 仍然留在中国协助重建的工作, 直到 1950 年国际组织成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联手参予护卫中国为止。

[公谊救护团] 为我们中国同胞实在付出很大的爱心, 1947 年 [公谊救护团]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实是至理名归。



图 2.30: [公谊救护团]车队在滇缅公路上; 斯基尔 (Jack Skeel) 的照片。



图 2.31: [公谊救护团] (上) 在云南保山的医疗服务 (1941-42)。 (下) 在中国另一个地方的医疗服务。 <https://peaceworks.afsc.org/peace-building-asia-opens-conversations>

从 1938 年二月十八日至 1943 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陪都重庆遭到日军严重的恐怖轰炸;轰炸几乎完全集中在平民区 (图 2.33-2.36)。1941 年六月五日, 数以千计的居民为了躲避轰炸而藏匿在防空洞, 可惜很多人在那里因窒息而丧生。



图 2.32: [公谊救护团]的流动医疗站。斯基尔 (Jack Skeel) 的照片。



图 2.33: 日本军机在重庆(长江)上空投下一群像白球般冒着烟的炸弹。
(1940 年九月十四日)

抵达重庆后, [公谊救护团] 的司机依着培英给他的地址找着了陈衡剑律师事务所, 可是她的哥哥却不在; 司机在这条重庆市的大路林森路旁边把我们放下即绝尘而去。此际我们实在感到极度彷徨无助, 正在游目四顾之际, 赫然看到公路旁有一所 [广东同乡会] 办事处, 我们跑进去要求给予援助, 那里的职员十分和

蔼可亲,她说:[陈衡剑律师么?我们认识他,只可惜如今因为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被封锁的关系,他被迫滞留在缅甸罢了。妳是他的妹妹吗?那妳为什么不去找陈衡剑律师的姊姊陈婉慈呢?]像绝处逢生一般,我听罢感到兴奋莫名,可是培英却是皱着眉头说:[不对,我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哪里会有甚么姊姊呢!]我说:[我们还有别的选择么?为甚么不试一试呢?]





图 2.34: 在战火中被日军严重摧毁的战时中国陪都重庆。



图 2.35: 重庆防空洞外尸横遍地,其中包括儿童;市民因恐慌过度而互相踩踏致死。(1941年六月五日)

那位和蔼可亲及乐于助人的[广东同乡会]职员亲自带领我们到位于林森公路三百九十二号二楼陈婉慈家里去，原来婉慈姊姊的住处就近[广东同乡会]，步行只需十分钟而已。抵达后培英急不及待跑上前去叩门，婉慈姊姊把门开了，盯着培英看了一会儿，突然她说：[你是培英吗？] 却原来她是比培英年长十岁的堂姊姊。她们彼此相认之后，婉慈姊姊便接待我们，让我们暂时住在她的家中。婉慈姊姊在一个政府机构（可能是中国资源委员会）当书记，人面很广，她曾介绍数份工作给培英和我，只是不太合适；最后她把我們引荐加入 [飞虎队] 作护士，如此又再写下了我人生重要的另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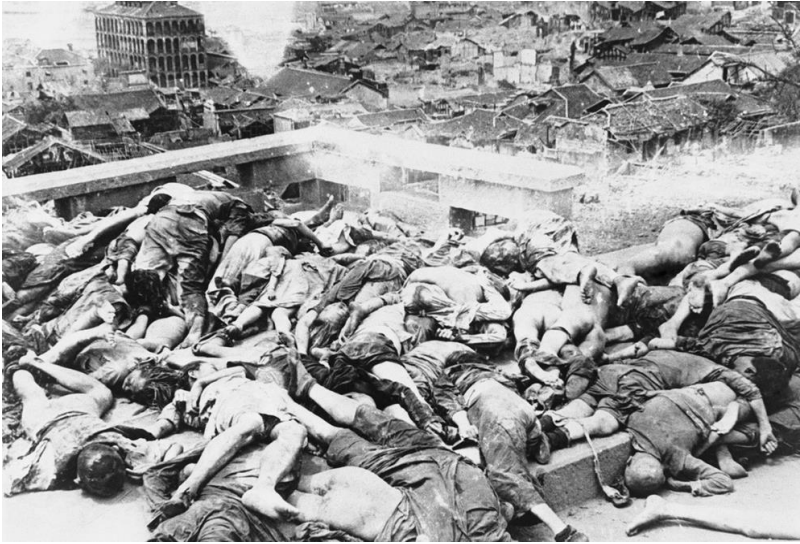


图 2.36: 大堆重庆市民的尸体; 为数约 700 人。

第三章: 与飞虎队的情义结

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完成了为期三年的护士课程, 刚开始在医院实习之际, 日军占领了香港, 香港政府在紧急的情况下先给我颁发护士毕业证书。想不到在半年后, 我凭着此证书加入飞虎队作护士; 而且更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全时间的护士工作。我是飞虎队旗下四名 (二男二女) 受聘的护士之一; 我为自己能有机会与中国人的老朋友孟杰 Manget 医生共事而感到十分荣幸。尽管照料那些为保卫国家而战伤的军人极具挑战性, 特别当我看到他们因日军空袭后而受伤的时候, 更是感到黯然神伤, 但我仍是为了自己能与他们有分, 与他们共渡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 见证他们的英勇事迹而感恩不已。很多时候, 我为他们在病房里制造巧格力软糖, 目的在于娱乐他们, 为他们的生活加添一点色彩。另一方面, 我对每天所享用那丰富奢华的西方食物和昆明的新鲜桃子和蚕豆, 至今还是回味无穷呢!

- 3.1 领导飞虎队的陈纳德
- 3.2 飞虎队的背景及策略
- 3.3 进入飞虎队的经过
- 3.4 在飞虎队的工作
- 3.5 中国人的朋友 - 孟杰医生
- 3.6 飞虎队的食用
- 3.7 飞虎队的生活点滴
- 3.8 对家人的照应
- 3.9 飞虎英雄著作被搬上银幕
- 3.10 飞虎队归入美国陆军后的工作
- 3.11 日军空袭昆明机场
- 3.12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生活点滴

3.1 领导飞虎队的陈纳德

领导飞虎队的陈纳德原名克莱尔·李·谢诺尔特 (Claire Lee Chennault, 1893-1958), 于 1893 年出生于美国德萨斯州 (Texas) 的一个农庄(图 3.1), 自小喜爱天文地理, 中学毕业后即考进克里佛航空学校, 以优秀的成绩结业。1918 年秋, 陈纳德于美国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四十六队战斗机队副官; 1920 年获得飞行员职位, 正式成为美国空军飞行员。1930 年他于维珍尼亚州 (Virginia) 的兰尼空军战术学校毕业后, 在亚拉巴马州 (Alabama) 的马克斯韦尔基地的航空兵战术学校担任教官。



图 3.1: (左) 陈纳德的诞生地 (Commerce, Texas, U.S.A.)。 (右) 美国陆军航空队(U.S. Army Air Corps, 美国空军的前身)陈纳德机长在 1934 年十月二十九日摄于一个波音 Boeing P-12E 飞机前。

当时美国的空军隶属于陆军之下(图 3.1), 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 美国人民对于空战的知识十分薄弱, 认为空军的任务就是轰炸而已。然而当时苏联却十分赏识陈纳德的才华, 曾经尝试以重金礼聘他作苏联空军飞行教官, 但陈纳德却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 截然拒绝其邀请。

陈纳德于 1937 年四月以上尉的军衔退役, 同年的六月, 他接受了蒋介石与中国航空委员会主席宋美龄 (蒋介石夫人, 1898-2003) 的联合邀请到中国视察; 陈纳德抵达上海后, 随即会晤在美国长大的蒋夫人宋美龄, 二人相谈甚欢, 陈纳德欣然接受了宋美龄的委任, 成为中华民国空军上校 (图 3.2 及 3.3)。就任后, 陈纳德巡视了整个中国的空军单位, 了解到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拥有五百架战机,

可是实质上能够起飞作战的不到一百架，与军力雄厚拥有三千多架战机的日本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了；然而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中国抗日之战爆发后，他独自招募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第十四志愿轰炸机中队，参与八一三淞沪会战。



图 3.2: 蒋宋美龄 (左) 与陈纳德 (右) 摄于中国; 1942 年美国邮票。



图 3.3²⁷: 陈纳德 (左)、蒋宋美龄 (中) 和蒋介石 (右)。

陈纳德除了训练中国空军之外，更亲自参战。1938 年四月，日军为了庆祝天皇生辰，出动了四十架战机空袭武汉，陈纳德派出廿架战机迎战，几乎将所有日本战机全数击落。当时日本政府知道陈纳德帮助中国，曾透过外交手段要求美国政府把所有美军撤离中国，而陈纳德却回答道：[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我会高高兴兴地返回美国去。]

1940 年苏联与日本的关系缓和，不愿为援助中国而与日本抗衡，于是将驻守在中国的苏联空军援华人员撤离中国；此举令中国空军在形势上处于更恶劣的地位。这时中国和日本的战机比例为 1:53，日本完全控制了整个空军的军事局面。有鉴于此，蒋介石委托陈纳德返回美国，向军政界宣传中国国民的抗战事迹，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他努力奔走，终于说服了总统罗斯福及美国国会通过对中国进

²⁷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940s_Chiang_Soong_Chennault.gif (公共领域)

行军事援助，为中国提供一百架 P-40 型战斗机，他亦同时招募了二百七十名航空人员前来中国，其中包括一百名飞行员。

3.2 飞虎队的背景及策略

在陈纳德 (图 3.4 及 3.5) 从美国所招募的一百名航空人员当中，四十名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六十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其余的一百七十名则为地勤人员，大部份为后备或退役军官。他们获得相等于美军三倍的月薪以合约形式受雇；飞行员的月薪是六百美元，小队长六百五十美元，中队长则是七百美元，每击落一架日本战机可获取额外奖金五百美元；在当时来说，条件实在相当优厚。

[飞虎队] 于 1941 年十二月廿日首次迎战，日军使用十架轰炸机袭击昆明，被 [飞虎队] 落九架；而第三中队在日本向英美宣战后保卫仰光，此后各中队轮流驻守仰光，直到 1942 年三月仰光失守后才撤回中国。

抵达中国后，蒋介石总统立即任命陈纳德为上校指挥官，成立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线队] (AVG, 即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队员随即被派往缅甸，由陈纳德亲自教导以 P-40 与日机作战的技巧及严格地训练以团队作战的精神。1942 年二月，宋美龄亲自邀请陈纳德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中将。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线队] 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家喻户晓的 [飞虎队]，以 [飞虎] 命名源自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的头部画上鲨鱼头 (图 3.6 - 3.8)，可以吓吓日本人，藉此增加其威势。1941 年十二月廿日 [飞虎队] 首次在昆明上空与日军交战时取得胜利，一鸣惊人，中国人没有见过鲨鱼的真貌，故此翌日在昆明报纸上头条报导战绩时，中国官方将之翻译为 [Flying Tigers]，从此这支空军作战队伍即被命名为 [飞虎队] (图 3.9)。[飞虎队] 分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名叫 [亚当与夏娃 Adam & Eve]，第二中队名为 [熊猫 Panda Bears]，这二个中队驻守在云南和昆明；第三中队 [地狱天使 Hell's Angel] 则驻守在缅甸和仰光附近。

1942 年七月 [飞虎队] 在美国陆军部及蒋介石总统的下令底下被解散了，由成立至被解散的短短的大半年中，[飞虎队] 的战绩彪炳，其中于 1941 年十二月廿日在昆明重创日军。又于 1942 年五月日军进占缅甸，再犯云南，为阻止日军再度前进，陈纳德指挥飞虎队连连出击，一队企图跨越怒江的日军空战队在飞虎队的轰炸底下几乎全军覆没。同年的六月，飞虎队在桂林上空击落日机八架而已方只损失了一架战机。



图 3.4²⁸: 美国空军教官陈纳德上尉。(下右) 陈纳德与第 3 中队负责人 Arvid Olsen 和第 1 中队的罗伯特·桑德尔 Robert Sandell 讨论细节, 而一名中国飞行员正在观察。
<https://www.historynet.com/american-volunteer-group-claire-l-chennault-and-the-flying-tigers.htm>



图 3.5: 陈纳德 (右) 把优异军团 Legion of Merit 加在上校金特里(Gentry) 医生 (首席外科医生, 左) 在 1944 年。金特里医生找我来飞虎队的。

²⁸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hennaultcic.jpg> (公共领域);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laireChennault.jpeg> (公共领域)



图 3.6: 以鲨鱼头为标志的飞虎队 P-40 战机。



图 3.7: 以飞虎命名的 P-40 型战斗机, 飞机头部画上鲨鱼标志. 陈纳德将军重金礼聘由美国招募到中国作战的飞虎队员。



图 3.8²⁹: 飞虎队机械员正在修理 P-40 型战机 (1942 年)。

²⁹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40_FlyingTiger_maintenance.jpg (公共领域)



图 3.9: 由美国和路迪斯尼公司 (Walt Disney Company) 所设计的飞虎标志; 飞虎英雄 Robert “R.T.” Smith 站在他的 P-40 战机前。

3.3 进入飞虎队的经过

1942年六月我和培英 (Daisy) 抵达重庆, 寄住在她堂姊陈婉慈家里; 婉慈姊姊任职于中国政府部门, 她对我们说重庆的川盐银行和资源委员会都在招聘护士, 同时我的同学又介绍我们到重庆的仁济医院工作, 然而我们对此兴趣不大, 可是当我们从婉慈姊姊口中得知当时驻守在昆明的飞虎队伍正在招募护士时, 立时感到兴致勃勃, 跃跃欲试。于是我们分别向重庆的飞虎队办事处发出了申请信; 数天之后, 飞虎队的医生金特里(Gentry)上校在没有事先通知我们的情况下突然造访, 就在我们的住处为我们进行了面试, 同时又捡阅了我们的毕业证书; 金特里(Gentry)医生对我们面试的表现感到满意, 并且实时决定以月薪一百美元包括食宿费用和薪酬录用我们; 他更嘱咐我们安坐家中等候, 待他返回昆明安排妥当后, 便即把我们送到昆明上任去。培英与我都为能获得这份高薪厚职而感到欣喜若狂; 然而在我的心底里, 我全然明白那是神的预备, 我实在衷心感谢我的恩主在我的人生路上不断的让我经历祂那实实在在的恩典。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我们没有金特里(Gentry)医生的消息; 一星期后, 我决定让培英独自留在家中等候消息, 而我则往重庆的仁济医院当私人护士。当时一名注中国的英国领事夫人正在仁济医院养病; 她的三个儿子都分别在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这个重大的打击使她的精神受到严重的创伤, 患上精神失常症, 并且需要护士每天廿四小时的照顾及护理; 在仁济医院的英国籍护士长安排下, 我与另一位曾经与我在玛丽医院学习的护士同学 Rose Yuen 每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轮值守候, 工资以国币及日薪计算。

一星期后，领事夫人的精神状况比较好转，她便离开仁济医院，被安排到英国领事馆位于重庆南岸的别墅养病，我和 Rose Yuen 仍继续以轮值的方式廿四小时在她的别墅中看护她，直至二个月后的某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1942 年八月的一天早上，金特里(Gentry) 医生突然来到婉慈姊家里告诉培英，他会在当天的黄昏六时接载我们二人到机场，然后乘坐小型飞机往昆明，开始飞虎队的工作；培英得知后立刻到别墅通知我；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令我感到不知所措，那时我正在当值日更，逼于无奈，我只好立时把 Rose 唤醒，央求她代替我看顾病人，然后自己立刻赶到英国领事馆，向领事提出辞职要求，并且表明我请辞的原因；领事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接受了我的辞职要求。当天晚上金特里(Gentry) 医生准时把我和培英送到机场，乘坐军用小型客机，飞行了约一个小时（相距约 950 公哩）即抵达昆明；那时我们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因为知道我们将要成为飞虎队的成员之一呢！

3.4 在飞虎队的工作

抵达云南昆明(图 3.10-3.13)后，我们立时被送往中国政府为飞虎队在昆明预备的住宿之处〔昆明第一招待所〕；这是一幢堂煌华丽的多层建筑物(图 3.14)，内部的设备美轮美奂，十分现代化，地上的云石地板闪闪发亮，浴室内有花洒及冷热水供应；我与培英共同享用一个与浴室相连的套房。真的不敢相信在当时乱世的时代竟有如此优质的生活享受，实在令我感到自己犹如置身于仙境中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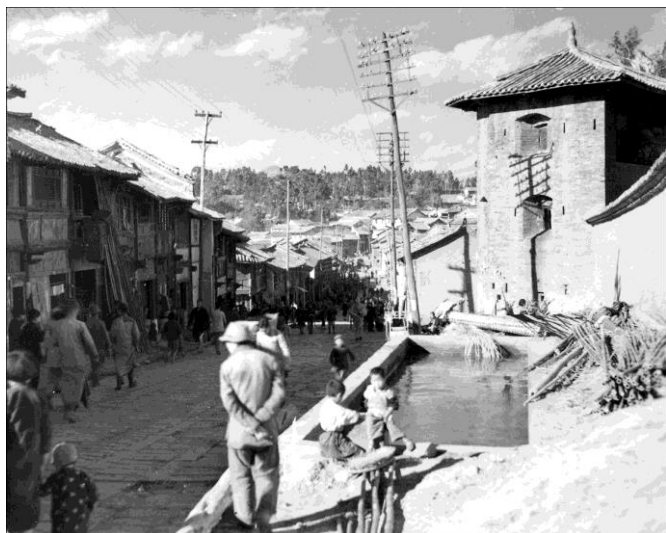


图 3.10: 昆明街与浸泡软化织造用的竹子和芦苇的水池(右)。



图 3.11: (左) 中国銀行, 办公室和公寓。 (右) 昆明的主要街道上的店面开刺绣店。



图 3.12: 中国士兵在昆明的城市公园的茶馆吃饭。



图 3.13: 沿河为乘客提供的许多船只。

简单梳洗过后, 体格魁梧, 温文有礼的金特里(Gentry)医生亲自陪伴我们到第一招待所内的军官餐厅 (Officers' Mess) 享用晚膳, 并且嘱咐我们于翌日早上八时上班。 第二天早上, 金特里(Gentry) 医生带我们会见负责正在医务所(Clinic)当

值的孟杰医生 (Dr. Fred P. Manget); 这位孟杰医生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能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原来他是从美国南部循道圣公会所差派到上海去服务的, 进入飞虎队之前, 他早已在上海工作了。如此我和培英便正式开始了在飞虎队的工作。

医务所位于我们住宿的〔昆明第一招待所〕旁边, 是二座临时搭建的木屋, 每间屋子内有七到十间病房, 而每个病房只有一张病床; 孟杰医生是唯一的当值医生, 他那日以继夜辛勤不休的工作态度使人不禁对他肃然起敬。飞虎队没有录用从美国来的护士, 但是他们以公平对待我们, 因为我们的工资与当时的美军护士看齐。四名中国籍的护士当中我和培英是女护士, 另外二名男护士 (护士长 Kok 先生和 Hsu 先生) 都是来自上海的。我们需要十二小时轮值工作, 我和培英当日更, 男护士 Hsu 先生则当晚更;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诊所里替病者裹伤、打针, 洗耳, 洗眼及护理受伤或患病的飞虎队员及队中的工作人员。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照料一名住在一号病房已一星期名字仿佛叫 Robert Neale 的患病机师时, 他倒活像一个没病的人一般, 反倒是口沫横飞地述说他曾打下十数架日本战机, 为此他感到十分自豪呢! 如此我们在医务所里工作了约三个月, 直到美军正式宣布参战, 飞虎队便由美军所取代了。





图 3.14: 与我共战难的护士陈培英摄于昆明第一招待所门前;这是我们在飞虎队共事时住宿的地方。

飞虎队是中国空军的一部分,飞虎队和中国军队之间有相当的合作(图 3.15)。中国航空特遣队(CATF,第14航空队的前身,1942年七月-1943年三月)和第23战斗机大队(1942年七月四日开始)的徽章都具有飞虎队的图片或标题(图 3.16)。



图 3.15³⁰: 一个中国士兵组(国民革命军);士兵们穿着美国供应的M1头盔;一架P-40战机在他们之上飞行。

³⁰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NRA_marching_and_aircraft.jpg (公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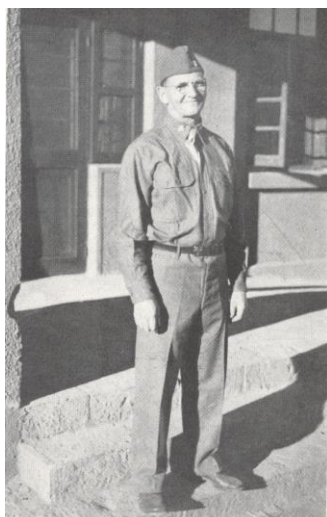
图 3.16³¹: 徽章; (上) 中国航空特遣队; (下) 第 23 战斗机大队

3.5 中国人的朋友 – 孟杰医生

孟杰医生 (1880 - 1979) (图 3.17) 于 1880 年在美国乔治亚州一个名叫 Marietta 的小镇出生; 他的母亲 Eliza Manget 非常热衷于海外宣教, 她常常鼓励自己的孩子把旧书报及故衣卖给当地的纸厂, 将所得的金钱资助中国的福音事工, 她甚至自己跑到老远的中国去传福音; 1884 年当她由外地从事宣教后返抵家乡时发现染上脑膜炎, 不到一个星期便病逝了, 当时孟杰医生只有三岁。他与中国的情意结受母亲的影响至深。

孟杰医生的双亲都是基督教卫理会的信徒, 是一对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夫妇; 孟杰医生在父母的熏陶下, 从小就明白圣经真理; 当他十二岁还是孩童的时候, 已决意在长大后要作一名医疗宣教士。他一直朝着这目标走, 努力不懈地用功读书, 于 1906 年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医学院 (Atlanta Medical College)。三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于 1909 年十一月十五日, 他带着新婚只有二个月的妻子到了上海, 他的四名女儿都相继在浙江省湖州 (Huzhou) 出生; 在湖州的头一年, 他埋首于学习中国语文, 与此同时, 他在家中医治病人, 一年下来, 在他家里接受诊治的病人多达一千五百人。

³¹http://www.cbi-history.com/part_ib.html (公共领域)



Lieutenant Colonel Fred Manget



Dr. Fred Manget, Superintendent of the Huzhou General Hospital, Huzhou, Chekiang, China

图 3.17: 飞虎队之中国人的朋友孟杰医生

1912 年他在湖州向一名中国人租用了一间屋子，开办了第一所可以容纳三十张病床的医院，医院内有一个小礼拜堂作崇拜之用，有一个慈善病房，当中有十二张为贫苦病人而设的病床，又有一个有六张病床的头等病房；另外又有一个女性专用的病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超过一百万名捷克和德国军人被苏联政府囚禁在北极西伯利亚 (Siberia) 的监狱里；监狱里的情况糟透了，斑疹伤寒和痢疾迅速地蔓延；捷克政府要求美国红十字会派出医疗救援队前往援助。1918 年，孟杰医生被红十字会委派，带领一组由美国红十字会组成的自愿医疗队伍 (五名医生和十五名护士) 到北极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帮助那些患病的囚犯。

大战结束后，他返回上海，与洛克菲勒基金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派往中国的代表见面，商讨有关洛克菲勒基金有意在中国大力推动西药的计划；经过多方面的接触，中国政府愿意拨地九英亩，洛克菲勒基金愿意拨款三万美元作为在湖州兴建一所医院的费用，余下不敷之数，由美国的南方基督教卫理会 (Southern Methodist Church) 和基督教北方浸信会 (Northern Baptist Church) 资助。如此这所湖州医院 (Huzhou General Hospital) 由一所租用的屋子，只有一位医生的小规模医院发展成为一占地九英亩，建造宏伟的大医院，内里有超过一百名护士，一百名其他的工作人员，并且拥有全中国最先进的化验设备，X-ray 服务，更有护士训练学校。

1928年, 蒋介石总统为战事中受伤的军人招募医护人员, 孟杰医生义务应召, 当他抵达南京时, 蒋总统即任命他为中国军陆战队上校。

后来日本军占领了湖州医院, 尚幸孟杰医生的家人能安全地返回美国, 而他自己却不肯离开中国; 不但如此, 他更为了日军恶待中国人而愤愤不平, 勇敢地站起来指摘其恶行; 为此他曾被日军逮捕, 控以从事间谍活动。这实在是一个 [莫须有] 的罪名, 后来日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他释放了; 在日军严密的监管底下, 湖州医院获准重开, 孟杰医生在此工作了三年半之久。

蒋介石总统向美国政府要求医疗援助给予为数约二十五万名的铁路工人(这条铁路长二百五十英里, 连贯昆明, 缅甸和中国); 他们当中多人患上疟疾, 孟杰医生再度被蒋介石总统委任为陆军中校; 孟杰医生为他们工作了二年后, 到昆明加入飞虎队与我共事 (图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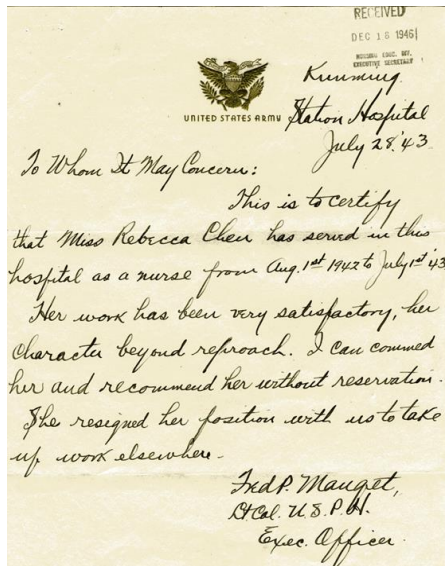


图 3.18: 1943年七月八日, 因为要转职中国航空公司, 孟杰医生为我亲笔在美国陆军的信笺上书写工作证明书, 他错把我的姓氏 Chan 写成 Chen。信中孟杰医生说: “她从 1942 年八月一日至 1943 年七月一日在这家医院担任护士。她的工作一直使我非常满意; 她的性格平易近人。我赞扬她, 并愿意毫无保留地推荐她。”

有机会与孟杰医生共事是我的福气, 我亲自见证他那发自爱心和任劳任怨的服侍精神, 实在使我敬佩; 在他的激励下, 一名英勇的飞行员罗拔·史葛 (Robert L

Scott) 还著作了一本畅销世界的名著: «上帝是我的护航者» “God Is My Co-Pilot”; 这本名著后来甚至被改编拍成电影呢!

孟杰医生于八十多岁时返回家乡乔治亚州, 他的年纪虽然老迈, 却仍然在小镇 Macon 设立一所医疗所, 为年老的病人服务。孟杰医生于 1979 年 99 岁之年离世返回天家, 他一生致力于服务社会, 甚至将自己最宝贵的大半生贡献在中国, 他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

3.6 飞虎队的食用

回想在飞虎队工作的这三个月, 时至今日还是令我回味无穷; 严格来说, 这是我取得护士证书后首份正式的合约工作, 其福利之高, 条件之优厚, 在当时的乱世时代是鲜有的。飞虎队所用的食物制成品如牛油、果酱、咖啡、巧克力及罐头杂果等都是由美国直接空运而来, 而新鲜的蔬果、肉类及鸡蛋等则来自本地。我们每天三餐都是在华丽的第一招待所 (当时国民政府有甚么喜宴都在此举行) 的军官餐厅以西餐形式进行; 军官阶级包括少校, 中尉, 中将及将军等。餐厅内全都是精心摆设的四人桌子, 假使每桌都坐满了人的话, 估计全餐厅可容纳一百人左右。身穿整齐光洁白色侍应制服的中国籍男性侍应侍立在侧。

早上七时是早餐时间,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一份三只鸡蛋煮成的荷包蛋 或水煮蛋 (Poach Egg); 我最爱吃水煮蛋, 并且可以一连吃三份, 换句话说, 我在早上可以一口气吃掉九只鸡蛋呢! 除此之外, 还有面包、薄煎饼 (Pancake)、窝夫 (Waffle) 及法式西多士 (French Toast) 等配以牛油、花生酱、蜜糖及不同类型的果酱。饮品则包括不同种类的果汁如橙汁、苹果汁及西柚汁; 热饮则有咖啡、奶茶、可可奶及鲜奶等。昆明得天独厚, 四季如春, 并且有运河灌溉, 故此有 [春城] 之称, 所出产的蔬果特别多且茁壮 (特别是长得肥大足有一呎阔的椰菜花), 因此每天都有大量的水果如桃子、梨子、橘子和苹果供应。中午十二时的午餐及晚上六时的晚餐更是丰富, 有主菜牛扒、猪扒、鸡胸扒、咖哩鸡、鱼及鸭等并配以焗马铃薯、椰菜花、西兰花、豆子及包心菜等。最后的甜点有不同味道悦人眼目的蛋糕、布丁和雪糕等。食物种类之多, 实在不胜枚举; 只可惜没有我喜爱的鲜虾、龙虾、羊扒和法国蜗牛罢了。面对丰富的食物使我禁不住食指大动, 我的体重由一百磅骤增至一百廿五磅, 亦可算十分惊人。一批并非军官阶级的军人包括 Sergeant (俗称三画)、Corporal (二画)、Private (一画) 及所有病房料理员等则在另外一个餐厅进食。

3.7 飞虎队的生活点滴

军中所供应的丰富饮食也未能满足我对家乡思念之情，我十分怀念中国菜；一次，我跟培英到昆明市中心的惠滇医院探望院长姚汉平医生，偶然发现在医院附近一间名叫 [大三元] 的中小学菜馆所售卖的 [太爷鸡] 驰名远近；我们喜出望外，急忙买了拿回宿舍去分享。菜馆没有替我们把鸡斩件，我们只好把它撕下，狼吞虎咽吃个不亦乐乎。自此以后，我们经常到那里买 [太爷鸡]，以慰我们思乡之情。



图 3.19: 昆明大路，路的两旁是高大的桃树和梨树；我（中），余秀芬（左）及在飞虎队孟杰医生手下当化验师的李先生（右）同往昆明旅行时摄。

昆明所出产的桃子令我和在昆明惠滇医院当护士的同学余秀芬着迷，这些在树上熟的桃子，既大且甜，我曾经有一口气吃掉十个至十二个大桃子的纪录呢！（图 3.19 及 3.20，图中那深红色底白点的美丽旗袍是我向同事借来的。）

我们经常要到市中心去却没有交通工具代步，本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军队员有他们专用的车子名叫 [吉普车]（英文名叫 Jeep，是普通话的译音），除了司机座位前面有一片挡风玻璃之外，整架车都是四面通风，没有窗

子的 (图 3.21); 前排有两个座位, 其中的一座位当然是司机专用的; 后座的四个座位成“凹”字型, 并且全是由钢铁造成。我们作护士的实在得到极大的优惠, 每当我们需要外出, 或是从外返回宿舍, 当我们看见有 [吉普车] 驶过, 只要把手一扬, 立即就有一辆停在面前, 把我们送往目的地去。我们还因此获得 [吉普车女郎] 的美誉呢!

飞虎队以国币支付我的工资; 每月我可以支取的工资约为国币二万元; 当时银行的美元和国币的正式兑换率 (Official Rate) 为 1:20, 假若以正式兑换率计算, 我的月薪应是二千元。但是飞虎队所用的是 1:200 黑市兑换率 (Unofficial Black Market Rate)。故此我的工资可达国币二万元, 而国币一直都在贬值, 所以我把每个月的月薪以国币跟美军及其他工作人员换取美元存放起来, 此举十分具有保值作用呢。



图 3.20: 我 (右) 与余秀芬 (左) 摄于昆明的桃树下, 我可以一口气吃掉十至十二个大桃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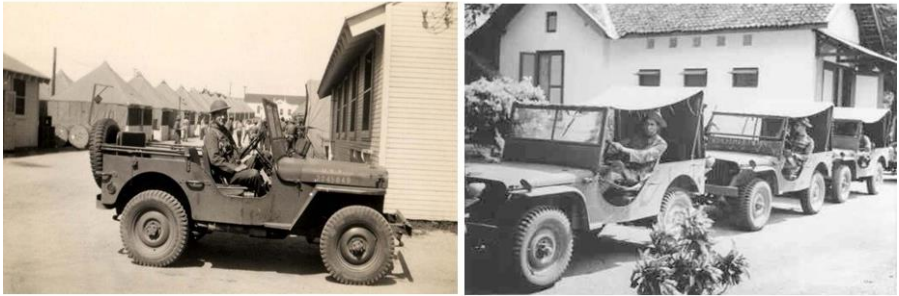


图 3.21: 吉普车 - 我在昆明的交通工具。

在军中我们可以买到日常起居用品如牙膏、牙刷、果酱、巧克力、甚至价钱昂贵的名牌雷朋太阳眼镜 (Ray-Ban Sunglasses); 我还记得有一种非常美味可口的巧克力名叫 Ration D Chocolate; 后来我在中国航空公司当航空服务员的时候, 一次我需要坐飞机到一个地方接一位病人而无暇进食, 公司便给我 Ration D Chocolate 予以充饥。

3.8 对家人的照应

飞虎队为我提供了食宿费用, 因此我的工资就是我的零用钱; 自小性格节俭的我, 绝不会将辛苦赚得的金钱花在宴乐上, 因此我才有能力靠着这笔工资供养在曲江的父亲; 当时父亲在曲江独自生活, 收入微薄, 我每个月都会到昆明的邮政局寄出五百元国币给他, 好使他的生活有保障。由于她需要支持, 我还把钱寄给表妹周妙英(九舅父周怀佑的长女)。沦陷之后, 母亲由桂林迁往重庆, 在重庆的街上摆卖故衣,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故此我不用寄钱供养她。

弟弟霭东和表弟周耀孙(1924-)一同考入上海医学院³²习医; 因战事的关系, 医学院从上海迁移至重庆的歌乐山(图 3.22), 所以他们二人也乘[公谊救护团]的货车从贵阳到达了重庆。在学院里他们分别在同学中邂逅了自己的至爱(后来成为他们的妻子); 弟弟的妻子是谭月贞(Teresa Tam) 医生, 而表弟的妻子是罗松儒(Loretta Lo, 1923-) 医生。他们是一群努力苦读的学生, 学院里的食用简便, 每周只得一顿肉食(主要是少量肥猪肉)的饭餐绝对未能满足这群正在发育的年轻人, 因此每当我探望弟弟和表弟的时候, 一定宴请他们到歌乐山村的餐厅享受那里驰名的排骨面, 他们每次都尽兴而回。我从没间断却是不定时的寄钱资

³²上海医科大学是在中国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的医学院校之一;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它位于上海市; 这个学院于 2000 年并入复旦大学而成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助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正因为我在军中我能买到很多不容易在市场上买得到的物品,于是我常常将买来的物品寄给在歌乐山之上海医学院苦读的弟弟。

在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弟弟和表弟往北美再深造,获取更高的医疗训练;后来弟弟成为一个心理专科医生,而表弟则是手部的外科手术专科医生。香港著名的骨科医生方心让医生亦是他们在上海医学院同时期的同学呢!

虽然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只是我身处昆明,更有工作缠身,所以没有机会去探望他们。回首过去,当我重温这段人生的片段时,我实在不得不赞叹上帝的作为,祂那丰富的恩典像雨露甘霖般倾泻而下,即使在整风骇浪的战争景况中,我仍可以享受丰足和平安。



图 3.22: 位于四川省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在战争时的校园;弟弟霭东和表弟周耀孙在此院学习。

3.9 飞虎英雄著作被搬上银幕

要数算在战场上最出色的机师则非罗拔·史葛上校 (Colonel Robert L. Scott 1908 – 2006, 后来被提升为 Brig. General 将军) 莫属了(图 3.23)。第廿三战队 (23rd Fighter Group) 于 1942 年七月成立, 史葛上校被蒋介石总统委任为此战斗队的指挥官 (此战队就是第十四航空队的前身)。史葛上校在 1942 年七月至 1943 年十月期间共飞行了三百八十八次, 擊落了十三架日本战机; 他的战绩标彪, 因此获颁二面银星奖 (Silver Star), 三面杰出飞行十字架奖 (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 及三面空军金章 (Air Med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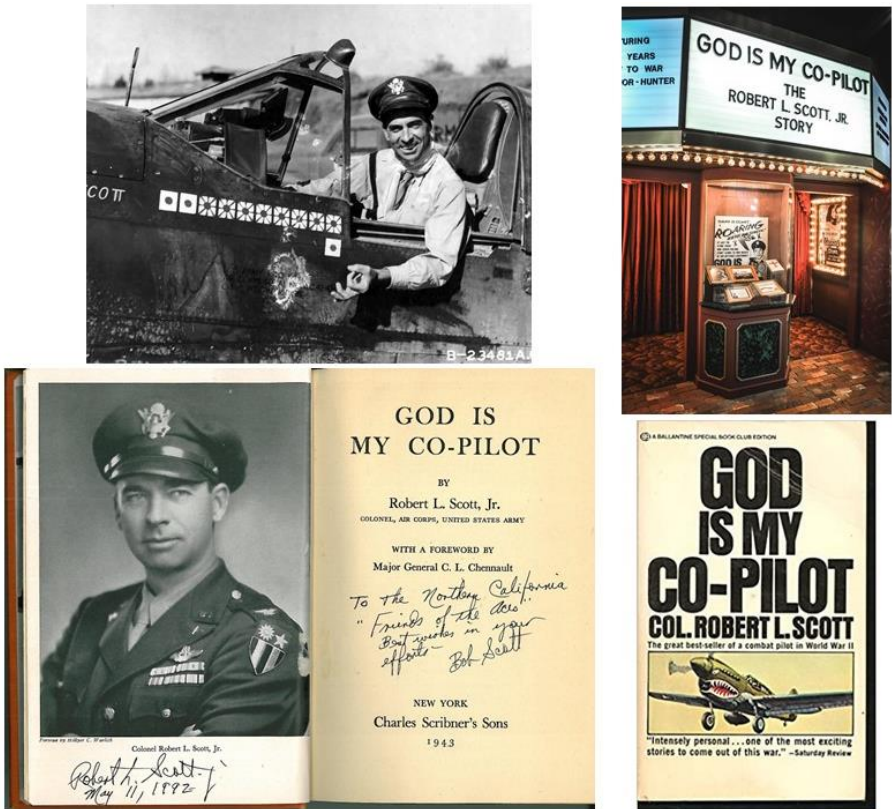


图 3.23³³: 史葛上校 (Colonel Robert L. Scott) 坐在他的 P-40 战机上; 图中的手势表示胜利 (1943)。

³³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Robert_Lee_Scott_Jr.jpg (公共领域);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Robert_L._Scott.jpg (公共领域)

一次史葛上校因为颈部后面被碎片所伤，孟杰医生替他处理伤口时，他向孟杰医生诉说他的工作任务困难的地方；在战机上，除了掌舵之外，他须要同时兼顾开机舱和换机油，在轰炸的时候又要落炸弹，这些工作全都是他自己一人担当；他曾经历过上百次生命受到威胁的境况，却是全部都化险为夷，从来没有受过重伤。孟杰医生对他说：[你绝对不是孤军作战的，因为在你旁边，有一位最佳最可靠及最有能力的护航机师与你同在] 孟杰医生的意思是指上帝一直在他身边，好像他的护航师般保守着他。史葛上校顿然领悟了这道理，[上帝是我的护航师]这几个字一直在他脑中回响，历久不散。

他终于在 1943 年着写了这本以 [上帝是我的护航师] (God is my Co-Pilot) 命名的书，把他在空中的战事及战地的经历记录下来。想不到此书竟成为美国当时最畅销的书本之一；1945 年美国荷李活的华纳兄弟电影公司 (Warner Brothers) 把它改编拍成电影，电影名字仍是 [上帝是我的护航师] 此部电影甚具历史价值；虽然电影里的情节记录史葛上校的战机被炸下，与事实并不相符。

3.10 飞虎队归入美国陆军后的工作



图 3.24: (左) 被飞行员称为 [血幅] 的绸布，被缝在军衣背面，好使遇险之飞行员获得中国军民的救援；上面写着“来华助我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右) 美国飞行员和他们的中国朋友。

1941 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飞虎队在昆明建立基地，直至 1942 年七月美军正式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亚洲区的盟军 (图 3.24)。陈纳德将军接获美国陆军部及蒋介石的命令，将航空志愿队 (飞虎队) 解散，以保留其中部分队员为主重组另一支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此部队乃是隶属美国陆军第 10 航空队；至 1943 年三月十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再将驻华特遣队编入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

空队] (美国陆军航空队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1941-1947, 图 3.25, 由阿诺德 Arnold, 1886 - 1950 领导, 它是美国空军的前身)。那些用鲨鱼头为标志的 P-40 以代表飞虎队的战机已被拆下; 尽管如此, 它的精神仍是深深地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 永远被怀念。而当时所有医疗组的中国籍医务人员如护士和化验师, 连同主任医生孟杰医生等全数投入美军医院服务, 薪酬仍然与飞虎队时期一样维持不变。



图 3.25: (左)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肩袖徽章: 蓝色的圆形背景,两个黄色的翅膀, 一个白色的星和一个红色的圆圈在星的中心。(右)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越驼峰的地勤人员在印度工作后放松一下。



图 3.26: 一群停泊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军机正整装待发, 准备空袭日本 (1942 年四月); 领导空袭的是杜利特尔中校 (James Doolittle, 1896-1993)。

这支新组成的空军队伍仍由陈纳德将军带领, 他的官衔再度晋升成为少将司令。在他的领导下 [第十四航空队]和美国海军作出了一系列对日军战略的轰炸行动

(图 3.26 及 3.27), 为保卫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美国亦于 1942 年十一月正式宣布参战。

第十四航空队仍然驻守昆明, 但是驻守地则由第一招待所迁往昆明的郊区, 因为位于市中心的第一招待所实在无法容纳这支人数比前倍增的军队。昆明机场是中国最主要的军事基地, 其面积广阔, 可停泊差不多一百架战斗机。此时我的工作单位便改称为 [第十四航空队美军医院] (14th US Army Station Hospital) (图 3.28 及 3.29)。



图 3.27: 杜利特尔 (Doolittle) 中校 (左, 站立)、美国航空母舰 (USS Hornet) 的指挥官 Mitscher 上尉 (右, 站立), 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在这艘航空母舰的船员。



图 3.28: 昆明美军医院诊所内: 我 (后左一); 男护士 Mr Hsu (后左二); 护士长 Mr Kok (后左三); 陈培英 (后右); Schultz 医生 (前左) 和病人 (前右)。

医院增聘了二名来自上海的男护士，其中一名姓陆(匿称小陆子)，另外一名姓章(匿称小章)及二名女护士陈静渝(Cynthia Chan) 和 Chenaloy。陈静渝是在香港比我早六个月入学的玛丽医院护士同学，战争结束后她到了台湾，嫁给当地的 Richard Lee 医生；她的妹妹就是日后成为陈纳德夫人的陈香梅女士 (Anna Chan); Chenaloy 则是一位不太懂中国语言的广东人。至此护士人数即由以前的四名增至八名，我们全都是华裔；医院对我们勤奋认真的工作态度甚为满意，因此没有从美国调派护士到中国来。此外，他们又聘请了 Schultz 医生 和 院长 Jacob 医生(少校 Major)，连同孟杰医生在内，此时医院便有三名医生轮流当值了。除了医生和护士之外，医院还安排了数名男性的美国军人协助护士整理病房及处理杂务(替病人淋浴及照顾病人饮食等)，职位是病房服务员 (Ward Attendant); 因为一起工作的关系，我跟这些助手都十分熟稔，我还记得其中一位的名字叫 Olson 呢!



图 3.29: 我 (后右), 陈培英 (后左), Mr Kok (前左)及两位美军病房服务员 (Ward Attendant); 前中可能是 Olson。

医院是由六座楼高一层的木屋组成，其中的一座主楼 (main building) (图 3.30) 内有三间手术室，诊所，化验所，配药房和数间医生工作间等。主楼与另三座病房成一排，每座屋子里面约有十间单人病房；另外的二座则与其他四座成四十五度角并排着，而两座屋子中间被一条通往医院大门的大路分隔着；这二座被分隔的屋子里面同样有一间大病房，大病房内有病床十五至二十张。在飞虎队时期，我不须要当夜更，如今在第十四航空队则不然；当日更的时候，我在单人病房工作而当夜更时则在大病房工作。

医院附近有多座也是用木建造楼高一层的男宿舍和女宿舍，供医护人员及第十四航空队军人住宿；我与培英理所当然地同住一房，陈静渝和 Chenaloy 合住的房间就在我们旁边。当年陈香梅女士来到昆明探望她的姊姊（陈静渝）的时候，曾逗留了数月之久，并且与她姊姊同住一个房间，因此我们也彼此认识。

跟以往在飞虎队时无异（上文 3.6），我们仍然与军官们一起在摆着四人桌子的军官餐厅内用膳，仍旧有穿着整齐彬彬有礼的侍应侍立在旁，食物之丰富与飞虎队时相比也是不相伯仲。



图 3.30: 在飞虎孟杰医生手下当化验师的李先生在昆明摄于第十四航空队美军医院主楼前 李先生在相片的右下角签名留念。

3.11 日军空袭昆明机场

自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空军部队移师中国云南，在首都昆明建立基地；日军为了争取航空控制权，自恃己方空军实力占尽优势，企图歼灭新组织的美国驻华空军部队，因此军事要塞地昆明机场便首当其冲成为他们空袭的对象（图 3.31），当时停泊在昆明机场的飞机接近一百架，当中有战机及运输机，也有民航机。

我在飞虎队及十四航空队中服务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日军曾多次空袭昆明机场；日军空袭之前（所有的空袭都在日间进行），一阵尖而又急的警报讯号便会响起来，市民听到警报讯号便立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附近的防空洞去躲避。那时医院内大概有一百名病人，因此所有的员工，包括医生在内都须要用最短的时间把病人护送至安全的地方〔防空洞〕去；病情较轻可以自由行动的病人便随着带领者步行约廿分钟往附近的防空洞，至于那些病重，伤重或不方便行动的病人，我们实在爱莫能助，无奈只好用担架把他们抬起来，藏在病床底下而已，直到警报解除后才把他们放回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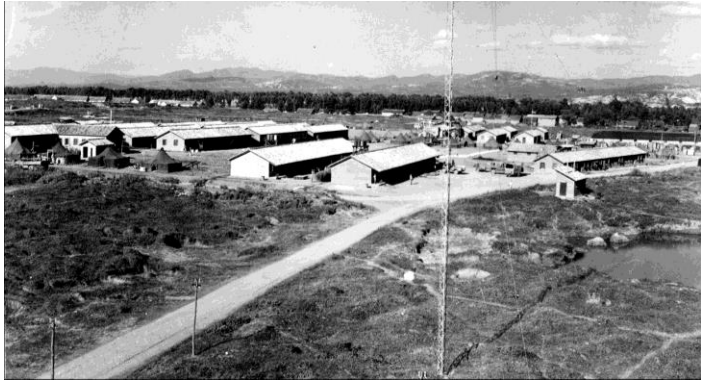


图 3.31: (上) 昆明机场的一角落; (下) 一些宿舍。

我们所到的防空洞大概可以容纳百多人, 有一些木板凳子可以让伤者或病人坐下来憩息; 空袭的时间由半个小时至二个小时不等, 视乎当时的空袭情况而定。因为太匆忙的缘故, 我们没有时间带备食物, 只有自备食水而已; 当中有些人可能为了缓和紧张的情绪, 又或许是为了打发时间, 他们竟带备了[扑克牌], 躲在一隅玩到兴高采烈呢!



图 3.32: 飞行员赶紧登上停泊在机场的战机, 准备迎战。

犹记得在 1942 年 四月十八日 最严重的一次日军空袭, 对象仍是驻守昆明机场的第十四航空队; 我们在防空洞里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渐渐感到有点儿不耐烦, 直到那低沉而又缓慢的解除警报讯号响起, 才如释重负, 急不及待地离开防空洞。当我甫踏出防空洞即被当时的情景吓至目瞪口呆, 只见多辆响着号的救护车往来穿插着, 其中还有不少吉普车以高速度载着受伤的士兵往医院方向驶去。此时我深知事态不妙, 于是立即飞奔返回医院; 甫进医院, 即看见十多名伤兵躺在走廊上, 再往内走, 更是伤兵处处, 举目皆是。我立时得到医生的指示, 替伤势较轻的伤兵包扎伤口。我们消毒的方法是用盐水洗涤伤口, 然后用硫磺粉 (Sulphur Powder) 及红汞水裹伤。由于伤兵实在太多, 医院的病床不敷应用, 我们只好把部份伤兵放在地上, 然后跪在地上替他们包扎伤口。

Schultz, Jacob 和孟杰三位医生都忙于替伤者施行手术, 仅有的三个手术室全作急救之用。多名被炮弹炸至背部及臀部严重受伤的士兵 (我们称之为 [屁股开花], 因为他们臀部那十字形的伤口看来有点像开花的样子) 轮候手术时, 他们俯伏在床上或地上因为极度痛苦而不断地呻吟着; 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 医生被迫授权护士们为他们注射吗啡 (Morphine) 止痛药。

当时我觉得十分奇怪, 为何有如此多名士兵伤及屁股和背部; 后来才得知因为空袭来得太突然, 有些士兵赶不及登上停泊在机场的战机迎战(图 3.32), 被迫俯伏在地上而被炮弹击中受伤的, 对他们英勇的精神, 我深受感动。

3.12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 的生活点滴

军中的生活异常枯燥寂寞, 当这群身在异乡的年轻的军人不用作战的时候, 实在没有甚么娱乐可言; 故此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些从美国来的明星和歌星到来, 在军营旁边的康乐大楼 (Recreation Building) 作劳军演出, 为他们枯燥的生活平添一点色彩。然而此举亦未能填补他们空虚寂寞的心, 因此他们常常晚上在康乐大楼里面举行舞会派对; 我们作女护士的是理所当然地被邀请参加。我由始至终没有参加过任何此类的派对, 所以未能把派对的情况记录下来; 我不愿意参加主要是因为我的行李衣物在贵阳时已全失掉了, 当时陪伴我的就只有二件由同学送给我, 可供替换粉红色从香港带来的玛丽医院护士学生制服, 称为 Pinky。爱美本是女孩子的天性, 我不愿穿着护士制服去参加派对; 况且我对此类交际应酬实在没有多大兴趣, 宁可选择独自留在宿舍里阅读, 反而感到乐趣无穷。然而我的好友培英、陈静渝及她的妹妹陈香梅等都乐意奉陪, 并且分别找到了男朋友。陈香梅因此认识了陈纳德将军, 后来更成为陈纳德将军夫人(图 3.33-3.36)。而我的好友培英的男友名叫佐治中尉 (我已忘记了他的姓氏), 他的父亲曾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 在北京生活过一段不短的日子, 他那一口流

利的普通话使人感到特别亲切；培英对这段感情十分认真，只可惜后来他在昆明驾驶吉普车时不幸在一宗交通意外中丧生了，培英为此曾伤心欲绝呢。



图 3.33: 陈纳德和记者陈香梅的婚礼(1947 年底在上海)。



图 3.34: 陈纳德、陈香梅和他们刚出生的女儿。



图 3.35: 陈纳德夫妇与斯隆(Norman Sloan,第 22 炸弹中队成员) 夫妇在美国华盛顿(1953 年八月)。



图 3.36: 陈香梅与陈纳德年纪相差 32 岁, 但鹣鲽情深。他们有两个女儿: 安娜克莱尔 (Claire Anna, 1949 年出生) 和辛西娅刘易斯 (Cynthia Louise, 1950 年出生); 可惜陈纳德于 1958 年因病与世长辞。 <https://www.radcliffe.harvard.edu/schlesinger-library/item/general-claire-and-anna-chennault-in-conversation>



图 3.37³⁴: C-46 突击队支持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 (CBI) 的工作。

³⁴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urtiss_C-46_Commando.JPG (公共领域)

培英在逃难中与她的父亲失去了联络, 后来她听从了美军朋友的建议, 在一份美军战地报章 (CBI Newspaper: CBI 是指 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即中缅印之盟军战区, 图 3.37) 上刊登寻人广告, 终于在纽约找到了她的父亲, 后来培英到美国纽约与父亲团聚, 不久在美国与一名德裔美国人 Daniels 先生结婚了(图 3.38)。



图 3.38: 陈培英在美国与一名德裔美国人 Daniels 先生结婚。

我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常常为病者带来欢乐, 很多时候, 我会利用病房内的炭炉去煮美国人最喜欢吃的巧格力软糖 (Fudge, 图 3.39), 方法是把巧格力条和糖浆与切碎的腰果和奶粉混和同煮, 冷却后即成为美味可口的巧格力软糖了; 这是我自制的零食, 是病人最爱吃的。



图 3.39: 巧格力软糖数片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认识了不少美军, 他们十分赞赏我们那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 从他们当中, 我获赠军中各阶级的军人勋章作为留念, 我一直都把这些勋章珍而重之的保存着。

还记得我在医院作护士的时候, 曾经输血给一名病人; 当时那名病人急需手术, 医院的血库没有该病人血液类型 (B 型), 刚巧我的血型吻合, 我自恃身体健壮, 因此毫不考虑就为他捐出血液。

每当我轮值夜更时, 我总是利用日间的时间出外四逛; 我常常到医院附近的田园去采摘蚕豆, 边采边吃, 想不到新鲜的生蚕豆是如此美味可口的。有时我又会从农户那里买一些蚕豆拿回宿舍用开水煮熟, 再用盐和辣椒调和, 然后放在房间内的暖炉上烘焙, 留待日后去享用, 这就是我另一款自制的零食, 品尝过的同事还对这零食赞不绝口呢!

没有多少人像我一般喜爱踏足这片田园, 很多时候就只有我独自在田间游逛, 我十分享受这份宁静, 禁不住高声欢唱; 所唱的歌都是我耳熟能详, 立时可以背诵的诗歌; 其中我最喜爱, 又是最常唱的诗歌就是 [你孤单么?]。这首诗歌不断提醒我上帝就在我的身边; 况且主耶稣在世时孤单地面对十字架, 实在比我更孤单呢! 节录歌词如下:

你孤单么

*你孤单么? 真孤单么? 耶稣比你更孤单
祂曾降生成为人子, 受尽凌辱和苦难
祂曾孤单在城镇间, 曾孤单在加略山
未见一人与祂分担, 试想祂心多凄惨*

*你困倦么? 真困倦么? 耶稣比你更困倦
祂曾困倦在那晚间, 祂曾困倦不能眠
大声祈祷, 汗如血点, 跪在客西马尼园
终背十架往各各他, 走完世路功成全*

第四章: 与驼峰航线的情义结

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从飞虎队转职到以印度为总部的中国航空公司 (CNAC) 之后移居印度加尔各答, 并且随着客机每周在中印二国之间飞越驼峰二次; 飞越驼峰是挑战飞行员胆色的工作, 因为航线处于世界最高最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 连绵不绝的山峰高耸入云, 残旧的航机实在难以飞及峰顶, 只可在山峰与山峰之间穿插着飞行, 倘若在飞行中要躲避日军的追击时, 更是险象环生。这工作的性质本是航空服务员, 但是任职者必须具有护士资格, 因为具有护士资格的航空服务员不但能够照料来回中印的军人及其家人旅途中的饮食, 更可以提供一点医疗护理服务。飞越驼峰的工作虽然极度危险, 只因为此航线是当时中国与外界唯一的接触通道, 对抗日工作非常重要, 飞行员唯有冒死作为中外联络的桥梁。

- 4.1 险要的驼峰航线
- 4.2 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
- 4.3 转职中国航空公司
- 4.4 初抵印度
- 4.5 飞越驼峰的工作
- 4.6 最惊险的飞行经历
- 4.7 停止飞行

4:1 险要的驼峰航线

[中国航空公司]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简称 CNAC 或中航公司) 在中国现代历史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是由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寇蒂斯·华特公司合办的商业航空公司当中的一条航线; 后来于 1933 年成为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分支; 最初的时候, 航线是将北京及长江沿岸的大部份城市与

上海接连起来, 1937 年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 CNAC 航线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飞行员被迫另选一条更险峻的航线以避免遭受日军战机的袭击。

1941 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1942 年五月, 日本占领了缅甸 (图 4.1), 切断了同盟国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 - 滇缅公路; 同时苏联亦正在为保卫国家作战而疲于奔命, 因此经过新疆进出口的通道实质上也名存实亡; 有见及此, 中国政府的代表宋子文(1894-1971, 宋美龄的哥哥) 和美国的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 (Stilwell, 1883-1946, 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服务, 图 4.2 及 4.3) 及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经详细的商议后, 决定与中国联合开辟一条新航线, 此航线飞越印度东北面的亚森谷, 横跨缅甸北部, 直到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 航线地处于喜马拉雅山高达三千千米以上的山脉 (图 4.4 及 4.5), 并且有五千六百米的高峰坐落其间; 最初投入服务的 D-3、C-39、C-53 和 C-47 等都是些改装的残旧飞机, 后来加入的 C-46 及 C-87 虽然马力比较强劲, 可以飞得更快和更高, 然而它们最高也只能可以飞行约至三千五百米而已。由于山峰太高, 飞机要在山峰之间起伏飞行, 就像在骆驼背上飞行一般, 因此它被战地记者称之为 [驼峰航线]。



图 4.1 : 1942 年日本占领区: 黑色为日军占领区, 浅灰色为非日军占领区 (包括重庆、昆明和印度); 在此情况下, 中印的航线是中国对外的唯一通道。

[驼峰航线] 是飞行员噩梦之源，因为在五百英哩的航线之下是世界上最险峻的地形，他们要面对崇山峻岭，急流峡谷，强劲的升降气流和高空的疾风。每年由五月到十月长达五个多月的暴风雪季节是飞行员最感吃力的时段，季候性的风暴经常夹杂着雷电及滂沱大雨，在厚厚的云雾里面，能见度极低；猛烈的雷击足以把飞机摧毁；纵使冬天的天气比较缓和，但晚上的浓雾和强达每小时一百公哩的冬季季候风使飞机的升降出现困难；加上飞机的性能，通讯及导航设备的限制等等，令飞行员执行任务时更倍感吃力。最要命的却是日军的战斗机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而他们则苦于无法还手，因为他们的飞机 C-46 和 C-47 都没有武器装备，为了躲避日军的追踪，飞行员被迫在山峰之间穿插飞行，险象环生。基于以上重重的障碍，令他们在飞行时处身于极险的境况中；倘若在飞行时不幸在途中遇到机械故障，机员几乎无法找得一块可供紧急降落的平地，即使飞行员跳伞逃生，也难以活命。最要命的是当时驻守缅甸的日军对 CNAC 的机师恨之入骨，他们竟然悬红一万元赏赐给成功歼灭一名 CNAC 机师的军人；再者一些反中国中央蒋介石政府的云南土著也对 CNAC 机师构成威胁，故此他们视这 [驼峰航线] 为 [死亡战线] 却也绝不为过呢！



图 4.2：蒋介石委员长（左）、宋美龄（中）和美国史迪威(Stilwell)将军（右）于 1942 年四月。



图 4.3：宋庆龄（左）和美国史迪威(Stilwell)将军（右）于 1942 年四月在重庆。

为了补充飞行员，CNAC 曾招收了不少前飞虎队员及从中国和美国来的年轻飞行员。这群平均只有廿多岁年青力壮的新飞行员胆色过人，他们被要求在世界上最险峻和最恶劣的环境下每次飞行十六到廿小时而无惧，为支持中国抗日作出极大的贡献，实在使人肃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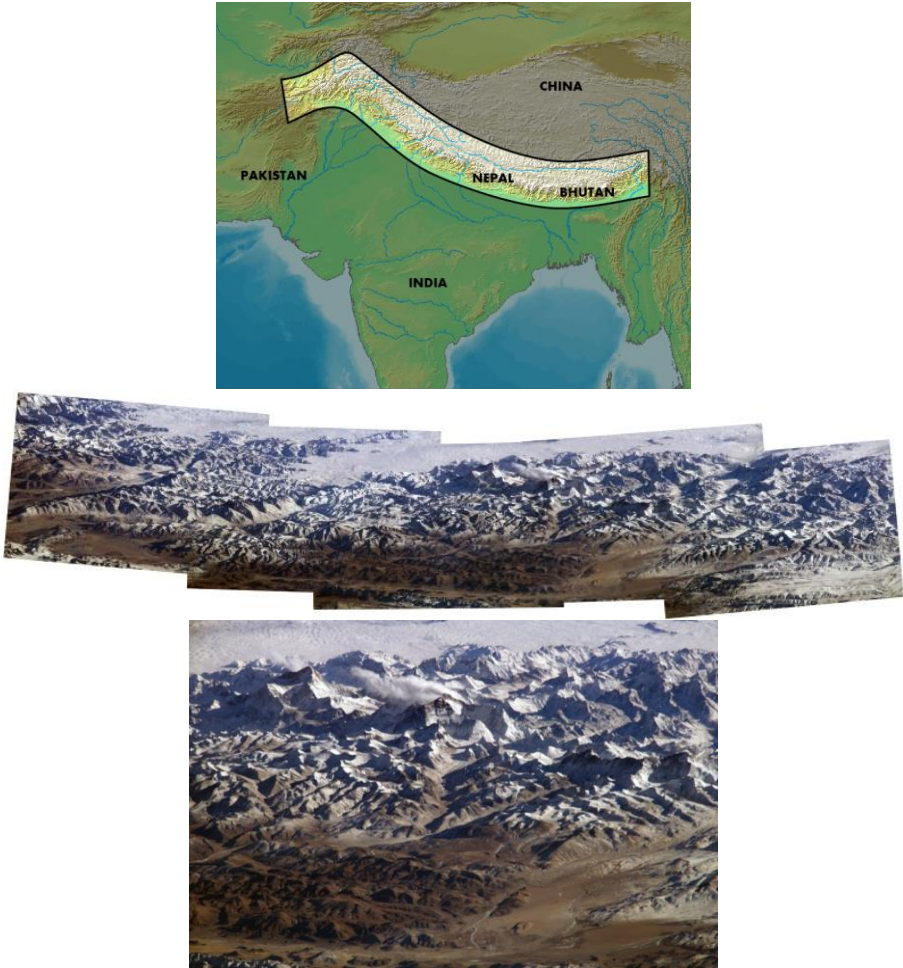


图 4.4³⁵: (上): 喜马拉雅山位于北部的中国与南部的印度和缅甸之间; (中): 连绵不绝的喜马拉雅山高峰, 山峰高达三千米以上, 因此峰顶几乎长年积雪; 远眺中国, 印度及缅甸之间的长山脉。(下): 近观的山脉。

³⁵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verestMosaic.jpg> (公共领域);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imalayas.jpg> (公共领域)



图 4.5: 在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雪山顶峰。

于 1943 年二月十八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言。信心百倍，她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将继续对日本侵略斗争(图 4.6)。在 1943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于埃及开罗会见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图 4.7); 盟国在“开罗宣言”中声明向日本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在 1944 年八月，罗斯福总统帕特使赫尔利 (Hurley, 1883-1963) 到中国来改善蒋介石和美国在中国的指挥官史迪威(Stilwell, 1883-1946)之间的工作关系(图 4.8)。



图 4.6: 1943 年二月十八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言。



图 4.7: 1943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开罗(埃及)会议。左起: 中国的蒋介石, 美国总统罗斯福,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的夫人宋美龄。



图 4.8: 蒋介石 (中)、毛泽东 (右) 与美国外交官赫尔利 Hurley (左) 在 1945 年; 左二: 蒋介石和毛福梅(1882-1939)的儿子蒋经国 (1910-1988)。

4.2 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 CNAC (图 4.9) 为飞虎队作空运支持服务, 当时所有飞虎队基地人员的装备都来自 [驼峰]。1933 年[驼峰航线]成立之初, 投入服务的运输机 (图 4.10) 只得数十架, 到 1942 年因为需求关系激增至六百多架, 后来更增至差不多二千架; 几乎每天都有二十至三十架运输机穿梭在这条航线上。所运出的物品包括矿产、农产品、黄金及国币 (黄金是存放在飞机的发动机内), 而运进口的有航空器材、油料、武器弹药和药物等。驼峰空运在物资和精神上

都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政府，更为在中国作战的第十四航空队和保卫中国对日本实施轰炸战略的第二十航空队提供了物资保障。



图 4.9³⁶: CNAC 的标志, 方格内有 [中国航空公司] 字样; 1921 年中国邮票。



图 4.10: CNAC 的运输机及没有顶盖的货车³⁷。

驼峰空运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而又是最艰苦的空运服务，从 1942 年五月至 1945 年九月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投入服务的飞机约有二千架，飞行员三万多人，损失的飞机共六百多架，牺牲的飞行员不计其数，所运送的物品超过七十三万吨。在航线两侧八十多公里一带的丛林中，隐约可见飞机的残骸散布在山谷之间。据说当飞机失事前，飞行员就要在电光火石之间作出决定是否弃机潜逃；幸运的机师于弃机后能够降落平地得以活命，不能及时弃机逃命的机师则被烧至难以辨认；此弃机行动被称为 Bail out；每次飞机失事后，CNAC 都

³⁶ <http://img.informer.com/wiki/mediawiki/images/6/6f/ChinaNationalLogo.png> (公共领域)

³⁷ <http://www.cnac.org/bull01.htm> (Photo courtesy of Gifford Bull, CNAC Pilot, 1944-45, 提供) (CNAC.org 提供)

会实时派出救援机队去寻找出事的飞机及进行救援的工作。殉职的机员多是美国人，其中有被安葬在昆明、重庆及印度的，所采用的安葬仪式是美国军人的官方仪式，棺木上盖着巨型的美国旗。

4.3 转职中国航空公司

爱美本是女孩子的本性，我也没有例外；因为在逃难途中失去了所有衣物，以致在飞虎队及美国第十四队航空队作护士服务的十一个月里面(1942年八月一日至1943年七月一日)，我差不多每天都穿着同一款色的护士制服，心里实在感到有点儿委屈；因此当我得知中国航空公司招聘必须要具有护士资格的航空服务员，来回穿梭飞行于中国与印度之间时便兴奋莫名，完全没有细加考虑这条飞行路线是否危险便写信应征，因为我深知到了印度，我可以买到很多我渴望已久的华衣美服；意想不到的就是我竟然在印度认识了神早已为我预备的丈夫。

应征信寄出不到一个星期即收到中航公司总机师沙伯(Captain Charles L. Sharp; 1908 - 1974年)的回复，他在昆明机场甫下机就在机场的草坪上接见我，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他只询问了二三个问题便决定录用我了。他告诉我这职位还有空缺，并且希望我能介绍另外一位护士来填补这空缺；我首先邀请跟我最要好，一直与我共同进退的陈培英，可惜她因为舍不得离开她的男朋友佐治而婉拒了；我唯有介绍正在惠填医院工作的余秀芬(Irene Yu)与我同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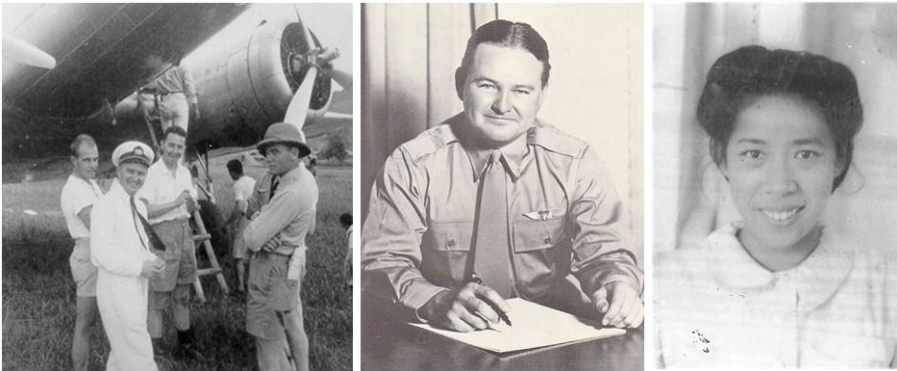


图 4.11: (左)³⁸与我共事 CNAC 的沙伯机长 Captain Sharp (左二，身着白色制服，1938 年)，在他身旁的全是地勤机械员被架上的梯子是为上落飞机所用；(中) 1944 年的沙伯机长；(右) 我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穿上 CNAC 的白色护士制服。

³⁸ <http://www.cnac.org/charlesssharp01.htm> (CNAC.org 提供)



图 4.12: 我在中国航空公司 (CNAC) 任职时的工作证正面 (上); 工作证的背面均印上我的左右大姆指的手指模 (下)。



图 4.13: 图中左下角的一枚襟章是我任职飞虎队时所配戴的, 襟章上的圆蛇代表医护人员; 其余的三枚全是中国航空公司 CNAC 的服务襟章; 左上角的一枚印有 [CNAC] 及 [中航] 字样; 右上的一枚印上 [中] 字; 当中最大圆形的一枚印上 [中国航空公司] 及我的相片。

当时因为战争, 中国航空公司那庞大的总部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受雇的全都是男职员 (没有女性空中服务员受聘之前), 大概有千多名, 都被安排住进宿舍里, 至于我的工资亦与飞虎队及十四航空队时期一样维持不变, 仍以美元计算。而我也得由昆明迁居至印度, 沙伯机长 Captain Sharp (图 4.11) 还亲自掌舵带着我和余秀芬从昆明出发, 飞行约三个多小时往加尔各答上任呢! 于是从 1943 年七月二日我便开始任职中国航空公司 (CNAC), 至此又再写下了我人生重要的另一页 (图 4.12 及 4.13)。

4.4 初抵印度

飞机于黄昏时分抵达加尔各答的 Dum Dum 机场, 航空公司的一辆车子早已在机场等候着, 要把我们送往目的地去; 当司机询问我往哪里去时, 我立时呆若木鸡, 不知所措; 我只是首次踏足印度, 在此地举目无亲, 当然不知道可以往哪里去; 可是, 他们总不能把我送往航空公司的宿舍里, 因为那里只有男职员宿舍。那时他们当中有一人问道: 『有一名中国籍的女护士住在这里, 她名叫 Lucy Wong, 你认识她吗?』像放下心头大石一般, 我兴奋地回答说: 『噢! 她是我在香港玛丽

医院的护士同学哩!』如此, 他们把我送到 Lucy Wong (她是香港著名的黄戴维医生之妹) 家里去。

4.5 飞越驼峰的工作

自 1942 年五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后, 驼峰航线就成为中国唯一与外界的交通通道; 我是中航公司三名受雇的女性航空服务员其中之一 (另外的一名当然是余秀芬了), 我所服务的不是货运机而是运载乘客的客机; 逢星期一、三及五共有三班客机, 由我们三名航空服务员轮值每人每周飞行一次; 航机早上从加尔各答出发 (图 4.14), 经昆明(图 4.15) 再往重庆; 在重庆住宿一宵, 于翌日早上大

约四时左右, 航空公司便会派出专用车子把我送往机场, 由重庆经昆明飞返加尔各答; 这样子的飞行需要两整天, 就是由出发天的凌晨到翌日回程的傍晚六时左右, 因此周内其他的日子都是我的休息日。其实当时 CNAC 尚有另一客运航线由印度加尔各答以北的汀九市 (Dinjan) 出发的, 我只是被公司安排飞加尔各答航线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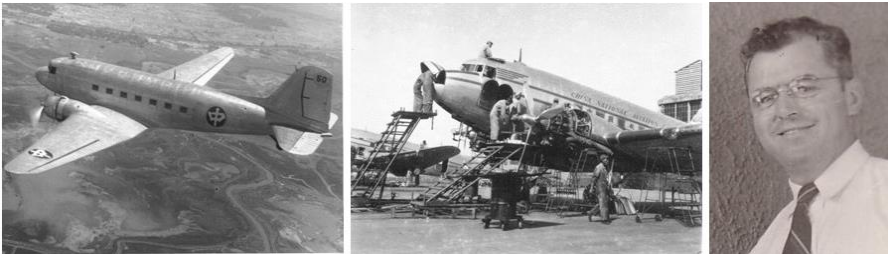


图 4.14: (左)³⁹ 在印度加尔各答 Dum Dum 机场附近上空的中国航空公司之 C-47 客机。(中)⁴⁰ 中航地勤人员维护 DC-3 飞机。(右) 我的主管 Lewis C. Richards 医生 (1903-1992 年), 他是中航的外科医生, 曾在飞虎队工作。

重庆高山林立, 机场的跑道位于沙屏坝区之嘉陵江边 (图 4.16), 二旁都是高山 (图 4.17), 因此我们须要徒步走室外足有层层楼高的木梯级下山才可到达机场; 然而现在的重庆机场 (江北机场) 已并非在此处了。昆明的机场名叫巫家坝机场, 机场的四周都是大片平地 (图 4.18) 是美国第十及第十四队空军总部, 同时也是我在第十四部队工作时期的所在地。

³⁹ <http://www.cnac.org/aircraft07.htm> (CNAC.org 提供)

⁴⁰ Steve Michiels, CNAC Captain Captain Joe Michiels 的儿子 提供。



图 4.15⁴¹:中国航空公司 (CNAC)。(上)在飞行中, 飞机有中航徽章; (下左) 中航广告; (下右) 中航航班时刻表。

⁴¹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e-111A_CNAC.jpg (公共领域)



图 4.16: 一名学生坐在嘉陵江边的防空洞上。



图 4.17: 嘉陵江边的峭壁。



图 4.18⁴²: 昆明机场及附近 (1944 年)。

加尔各答 Dum Dum 机场的四周十分荒芜, 早见人迹, 从我的住处到机场须要大约四十五分钟的车程; 途中我常常看到一些四脚向外直伸, 身体已发胀的死牛侧卧在地上, 一群八至十只, 每只长约二至四呎的黑鹰从空中俯冲啄食死牛, 当地的人称之为 [天葬]; 印度人不吃牛, 因为他们奉牛为神, 更称呼牛为 [神牛] 呢!

航机上的全组机员共有四人, 除了服务员以外(图 4.19), 还有一名正机师、一名副机师和一名无线电操作员, 我们全部须穿上草绿色卡其布军服作为飞航员制服, 机师们更要戴上那令人看来威风凛凛的帽子。我还记得曾经有数次的机会与沙伯机长(Captain Sharp) 在同一组共事呢!

⁴² <http://www.ibiblio.org/hyperwar/USA/USA-CBI-Time/USA-CBI-Time-1.html> (公共领域)



图 4.19: (上) 我身穿墨绿色 CNAC 空中服务员制服摄于重庆机场的客机前,乘客正从活动梯子下机,,二线向左右打开的出口大门更方便乘客上落。(下) 工人从飞机上卸下长管。

客机是由军用飞机改装而成的,乘客的座位是二排相对着,沿着机身贴墙而立的金属椅子,可以容纳三十五至四十名乘客,而我(航空服务员)的椅子则是独立设置在飞机尾部进出口的大门侧,座位旁边是咖啡和热茶桌子,而所有的桌子和椅子都被系上安全带,使之在飞行中得到稳固;只可惜机仓内没有窗子,令人失去饱览大自然美景的机会(图 4.20)。乘客中多是军事人员及其家眷,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我的工作主要是服侍乘客进餐,因为设备不足之故,航机没有热食供应,只有一份一份用食物盒子盛载的三文治及饼食和糕点等,然而热茶和热咖啡却仍是不缺的。



图 4.20⁴³: CNAC DC-3 客机之机舱内; 图中尽头的一扇门后面是机师仓; (左)乘客之衣履十分整齐; (右上) 中国士兵在机舱内; (右下) CNAC 的 C-46 飞机在印度加尔各答 Dum Dum 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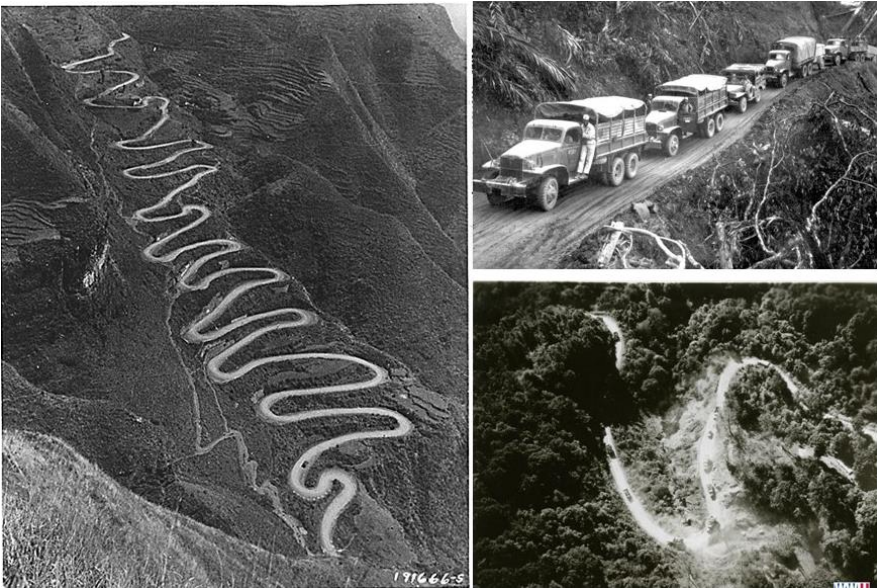


图 4.21⁴⁴: (上)从高空眺望迂回曲折的滇缅公路。公路曲折是因为山坡太斜之故; 此路跨越丛林与山川, 以连接缅甸腊戍与昆明(超过 1100 公里), 对中国军队的供应至关重要。(下) 在滇缅公路的卡车车队。

⁴³ <http://www.cnac.org/aircraft07.htm> (CNAC.org 提供) (Photo by Jack Wilkes, LIFE Photographer, 1945 年十二月)

⁴⁴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Ledo_Burma_Roads_Assam-Burma-China.gif (公共领域)

CNAC 旗下聘用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飞行员, 当中有不少是来自美国、中国、加拿大及英国的; 然而航空服务员与飞行员, 或飞行员与飞行员之间并非一定彼此认识, 我与沙伯机长 (Captain Sharp, 1908-1974) 及陈 Hugh En Chen 机长 (1901- 1993) 曾数度同组共事, 因此与他们熟稔。

[驼峰航线] 沿途的景色怡人, 浩瀚壮观, 当飞机跨越峰顶时, 机师舱的窗外那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高峰呈现眼前, 极目远望, 只见那一望无际, 连绵不绝的尖峰一座接着一座地矗立着, 有些更高耸入云, 我顿然感到人实在渺小, 更赞叹造物主的伟大; 当飞机低飞穿过峡谷时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但见山脚下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梯田, 使人有一种处身于世外桃源, 与世无争的感觉。遗憾的是基于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闭了, 我们的飞行路线都在滇缅公路以外, 因此我没有机会从高空饱览那名噪一时迂回曲折的滇缅公路 (图 4.21)。

陈机长(图 4.22)在中国出生, 他是第一位受聘于 CNAC 的华裔飞行驾驶员 (受聘期由 1933 年至 1949 年), 自 1942 年起直到 1949 年离职为止, 他一直在中航公司任职机长, 对飞行工作充满热忱的他, 是最后二名离职中航公司机长职位之其中一人。陈机长与我的同事兼闺蜜黎护士 Esther Lai 的中国空军姐夫曾一起学习驾驶飞机, 因此当他的航机停留在加尔各答之时, 我曾数度到他家中作客, 所以我也认识他的妻子黄医生 Dr Beulah Huang; 后来听说他们定居美国,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了。



图 4.22⁴⁵ (左): CNAC 的三位机长:陈 Hugh En Chen (右一)、 James Tate (中) 和 Rolf B. Preus (1916-1959)(左一); 陈机长是相当高的。

图 4.23 (右): CNAC 的马氏兄弟 Albert (左) 和 Cedric (右) 机长。

⁴⁵ <http://www.cnac.org/hughchen01.htm> (CNAC.org 提供)

除了陈机长外，值得一题的是一对出色的飞行驾驶员兄弟，他们分别是兄长马 Albert 机长(1920- 2005) 及弟弟马 Cedric 机长(1922-2010) (图 4.23) 。马氏兄弟出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 ，兄长马 Albert 机长首先加入 CNAC，曾在 1943 至 1944 年间执行任务飞越驼峰 420 次，弟弟马 Cedric 机长随后加入 CNAC，于 1944 至 1946 年间飞越驼峰 337 次；当时他们的母亲住在广州。Albert 机长的危险经历包括机翼的结冰及遭受日本飞机的突擊；在音乐方面他颇具天赋，是萨克斯管乐的吹奏者，当他兴之所至之时，即使在 17000 英尺的高空中驾驶也会播放音乐自娱呢！

马 Cedric 机长的危险经历听来使人惊心动魄；一次他驾驶一架满载 52 大袋美钞的残旧 C-46 型战机飞越 22000 英尺的峰顶时，残旧的飞机因性能有限致使其中的一个引擎产生故障，降落的齿轮亦已落下了，机翼因结满了厚厚的冰致使机的重量加增；此时他没有选择舍弃飞机 bail out。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他机智地把 48 大袋美钞弃掉，最后飞机因为重量减轻而安全着陆。

4.6 最惊险的飞行经历

在这段飞行的日子中，我经历了一次令我印象难忘的旅程。当时我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飞机突然摇晃得十分厉害，我立刻伸手抓着安装在椅子旁边墙上的手环；此时乘客们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摇曳而惊慌起来，为了安抚乘客，又是为了职责所在，我也顾不得危险，实时从座位站起来，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才来到乘客面前，不断的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一切都安好，不用惊慌。

当时我在二排乘客的椅子中间走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吃力的，因为当中完全没有柱子或手环可以令我抓住去稳定自己，可能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习武，所以我的平衡功夫还是不错的，故此我从未跌倒过。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左右，飞机才稳定下来，而乘客的情绪亦比较舒缓之后，我便跑到驾驶仓去讯问机师飞机摇曳的原因，他对我说，当时他驾着飞机在山峰与山峰之间迅速地穿插着飞行，为要躲避一架尾随着客机的日军战机的追击；听罢我倒没有感到惊慌，也没有将这情况告诉乘客，以免他们感到不安。

如今当我回想这段身处险境而不知险的日子时，又再情不自禁地感谢天父对我慈爱的看顾，在这六个月的飞行，跨越当时被视为世上最险峻的 [驼峰航线] 旅程上，祂一直保守着我，使我安然无恙。

在这六个月的飞行工作中，我飞越驼峰约五十次；当时美国军部颁赠一只 [飞行金章] (Air Medal) 给予飞越了 [驼峰航线] 廿五次的飞行员，及 [飞行优异十字勋章] (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 给予飞越了五十次的飞行员。CNAC 与美军的关系甚为密切，于 1992 年，这些退役的飞行员，包括飞虎作战队员都被美国空军承认为美国退伍军人。

4.7 停止飞行

[驼峰航线] 的客运为旅客服务了六个月便结束了，因为除我以外，另外的二名航服务员都先后因为结婚及私人理由而离职了，同时中航亦无法聘请别的护士以填补其空缺，逼于无奈，唯有将航线服务员的职位取消了，自此我不再作航空

服务员，而是保留在中航公司的职位，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医疗诊症部 (Dispensary) 任职护士，地点仍然在 Dum Dum 机场的范围内。虽然飞越驼峰的工作已正式终止了，但是当其他的城市需要医疗服务 (例如照料患病的飞行员) 的时候，我还是会被公司调派，乘坐 CNAC 客机到那里工作的 (图 4.24)。



图 4.24: 我被公司调派乘坐 CNAC 客机往外地出差;大衣内是白色的护士制服。身后的梯子是供乘客上落飞机所用。

诊症部里面连我在内共有四名护士，她们是叶护士长 Susie Yeh (绰号 [唐三藏]) (图 4.25)，何护士 Lucy Ho (即 Lucy Wong, 绰号 [猪八戒])，Helen Lin (林衡, 绰号 [沙僧]) 和我 (绰号 [马骝精])。这些绰号都是机械部的同事们按着我们的性格而取的，他们认为我们四名护士就好像唐三藏带着猪八戒，沙僧和马骝精前往印度取西经一般。他们又认为我的性格较活泼好动，又乐于助人，从不计较多做额外的工作，经常跑来跑去帮助病人抽血，打血管针，到药房帮助派药及到诊症

室作医生的助手, 所以为我冠以绰号 [马骝精]。可能因为我勤于工作的关系, 当叶护士长离职时, 我被公司提升为护士长来填补她的空缺。



图 4.25: 我 (左), 叶护士长 Susie Yeh (右) 和黎护士 Esther Lai (中) 在加尔各答一次旅行时摄。我曾与 Esther 共同租住一房间。

第五章: 千里姻缘驼峰牵

我在 1943 七月抵达印度的翌日便邂逅了未来的丈夫钟华亮，他是香港英国义勇军之军人，在 1941 年十二月日本侵略香港之役受重伤，左边面部的三叉神经线被割断。他被英国政府安排由重庆送往印度接受治疗，我们是在星期天他到教会崇拜后彼此认识。他在印度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医院接受了详细的检查，医院的报告显示他们未能为华亮提供适当的治疗；无奈地华亮唯有回返重庆，而我则留在印度工作。虽然我们相隔中印两地，但每周来回飞越驼峰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每周在重庆与他相会，情愫渐生。这可说是 [驼峰姻缘] 呢！

- 5.1 印度之乱世情
- 5.2 钟华亮的抗日工作
- 5.3 驼峰姻缘
- 5.4 在印度的音乐友谊
- 5.5 印度订情
- 5.6 缔结良缘
- 5.7 婚后即分离
- 5.8 婚后大幅度加薪
- 5.9 放弃离职中国航空公司
- 5.10 在印度教会的义务工作

5.1 印度之乱世情

实在感谢神丰富的预备，我(图 5.1):抵达加尔各答后最初的三个月，一直都租住在比我高班的玛丽医院护士同学 Lucy Wong 家里；她是一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与丈夫何先生 (Alfred Ho) 及刚出生的儿子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当她知道我在此地举目无亲的时候，即义不容辞地极力挽留我住下来；可能我们同是主内姊

妹的关系罢，我与她一见如故，于是我决定暂时租住下来，一方面因为自己对此地的环境实在陌生，未能实时适应过来，另一方面亦因为她刚产下一名儿子，实在需要人悉心的照料；因此每当我不用飞行的时候，便帮忙料理他们的起居饮食；星期天我和她们一起到当地的基督教教会作主日崇拜。在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星期天，我邂逅了二年以后成为我丈夫的钟华亮 (Leslie Wah-Leung Chung, 1917-2009)……..。



图 5.1: (左) 我身穿由裁缝师为我度身订造中国式旗袍摄于印度加尔各答。(右) 加尔各答的圣保禄大教堂；华亮到这里崇拜因而与我相识。

Lucy Wong 的丈夫何先生 (Alfred Ho) 在此地一间名叫圣保禄大教堂 (图 5.1) (St Paul's Cathedral) 的西人教会参加英语崇拜，何先生更是该教会的诗班成员之一。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那天是我到达加尔各答的翌日) 华亮向医院取得假期，来到这间与他所住的医院相近的圣保禄大教堂参加主日崇拜；他们是教会内仅有的华人，故此在异地相遇之时，自然是倍感亲切。那天早上 Lucy 因为刚生产，正在坐月子期间，而我则在前一天才抵达此地，故此我们都没有到教会崇拜。话说何先生与华亮于崇拜后彼此问好，在交谈中得知双方同是香港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成员时，话题就更多更广了；他们畅谈甚欢，却仍是意犹未尽，于是何先生邀请华亮到自己家里稍坐，再续未完的话。就在那天，我认识了他---我的丈夫钟华亮。

5.2 钟华亮的抗日工作

华亮于 1917 年在香港出生，并且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中长大，是一个十分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年青时活跃于张祝龄牧师带领的香港合一堂 (图 5.2) 少年德育会，他于 1935 年当选为该团契之主席，曾在普世青年崇拜中作讲员；他是香港

望觉堂的教会诗歌班指挥，又为该教会筹款建堂带领及指挥一队为数百人的诗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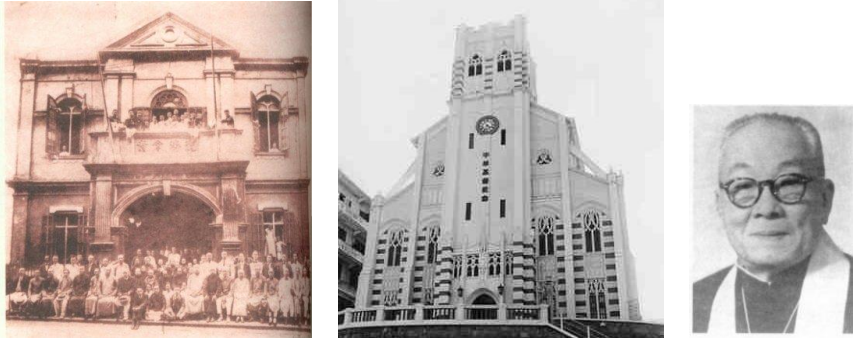


图 5.2: 华亮和他的家人在道济会堂 (左) 崇拜, 在 1926 年道济会堂移动成为合一堂 (中), 这两个地点都在香港半山; 张祝龄 (右) 是他的牧师。华亮在此教会成长。



图 5.3⁴⁶: 1920 年代香港湾仔的填海工程在照片的远程, 那里有一些成堆的泥土。

华亮的父亲钟挺超 (约 1884 - 1924) 本是香港早期一名富有的房地产发展商, 其名下拥有不少房产物业, 包括湾仔的填海区及正在兴建中的地盘 (图 5:3), 可惜因为 1922 年的海员罢工事件 (图 5:4) 引致生意失败而破产, 家中的经济顿陷于困境, 父亲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他留下妻儿在香港, 独自逃亡至广东佛山市, 更在那里英年早逝;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他的母亲陈咏金

⁴⁶ <http://gwulo.com/node/1187>

(1891-1980) 仍住在中国广州的乡间。华亮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却是在穷困的环境底下长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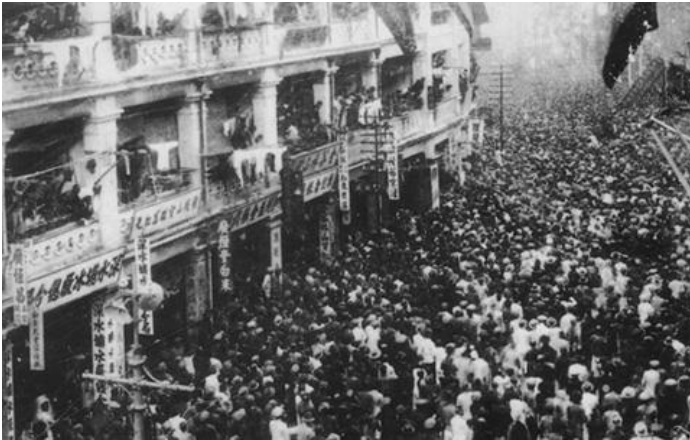


图 5.4⁴⁷: 1922 年香港海员罢工; 当时有超过三万名海员参与罢工, 向政府要求加薪及争取海员工会权益, 其结果是海员得直。

华亮本是一名聪颖勤奋的学生, 可惜因为经济困难而被迫间歇性地辍学, 然而感谢天父的保守, 他所就读在香港颇负盛名的华仁中学监督怀恩神父 (Father Thomas F Ryan, 1889-1971) 十分欣赏他那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 不愿意看到一名具有上进心的青年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学习的机会, 怀恩神父为华亮提供资助, 致使华亮得以顺利于 1936 年在华仁中学完成了中学阶段, 其后更获取香港大学预科 A 等毕业证书; 虽然家中经济暂时未能容许他继续升读大学, 但他仍然竭尽全力考进了罗富国师范学院 (Hong Kong Technical Institute), 于 1939 年完成整个教师训练课程, 结业后于 1939 年至 1941 年在九龙华仁中学执教鞭, 作育英才, 又于 1941 年成为喇沙中学 Class 6 (即一年级) 的主任老师。

⁴⁷ <http://wiki.china.org.cn/wiki/index.php/File:Hkseamen.jpg> (公共领域)

然而他的好学精神并非止于此，他于 1948 年远笈美国宾州，以三年的时间获取经济学学士。

1940 年华亮与三位兄弟（三兄华驹、四兄华超及八弟华璋）一同加入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此军团在 1854 年成立，是由香港和英国政府合力资助的一队本地辅助民兵部队，部队徽章（图 5.5）上的词句是由拉丁文写成的，其意义是“在东方首屈一指”。1941 年十二月八日，义勇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保卫香港而召集了 2200 名志愿军人，他们被分派至七个步兵连队、五个炮兵团、维克斯（Vickers）机枪部队和装甲车部队；华亮属于第四炮兵团。当日日军由新界开始向南面的九龙半岛及香港岛进攻时，义勇军团为了保卫香港岛不致失守，曾在港岛区艰苦战斗，特别是在黄泥涌峡及赤柱的两个关键战役中，为了不让日军占领死守港岛而奋战不懈。



THE ROYAL HONG KONG REGIMENT (THE VOLUNTEERS) 1854 - 1995 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



图 5.5: 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的徽章

1941年十二月华亮驻守香港鲤鱼门炮台(图5.6); 鲤鱼门是帆船湾(Junk Bay)和维多利亚港湾之间分隔着九龙及香港岛的一段水路通道; 它是南中国海的重要通道, 也是维多利亚港的东大门。华亮任炮兵营探海灯及电力发动机管理员(Searchlight Generator and Ruston Engine Driver)。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空袭香港启德机场的一星期后, 于同年的十二月十四日炮轰鲤鱼门港口, 他不幸被炮弹击中受重伤, 因为左边面部的三叉神经线被炮片切断, 引致左边面部的肌肉神经瘫痪, 左面的眼珠因为突出来而无法把眼皮瞟上, 左耳的听觉亦受到严重的损害。他曾在香港玛丽医院接受了大概为期十天的治疗, 可惜因为香港政府于十二月廿五日投降日本, 玛丽医院被日军征用, 因此华亮在港府投降的同日逃离玛丽医院, 到住在医院附近的亲戚王子传医生的家中暂住, 而他的治疗亦暂时被搁置了。



图 5.6: 香港鲤鱼门 (上) 鲤鱼门(狭窄的海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i_Yue_Mun; (中)炮台; (下)军营之一。

一天华亮与他的十弟华耀正在王子传医生的家中弹琴唱诗之际，忽然听到一阵扣门声，他们心想可能歌声骚扰了邻居，怀着歉疚的心情，他们急忙把门打开，正想道歉之际，赫然发现站在门外的竟是一名日本军官大佐；这突如其来的境况令他们兄弟二人感到目定口呆，不知所措；大佐却是笑容可掬地大踏步走进屋内，口中不断地哼着我们刚唱过的诗歌，并且不断以手势示意我们加入与他共唱，一起赞美神；原来这大佐不但是一名基督徒，而且更是玛丽医院被日军征用作军医院后的院长呢！

此后，这大佐曾数度出现，与他们一起唱诗赞美神，并且彼此成为朋友。大佐知道华亮的处境后，就慨然为他签署了字条（即当时的通行证），华亮凭此字条与教会的一群青年人离开香港到自由中国去。一名与中国人敌对的日本军官竟然愿意恩待他的仇敌，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奇事，华亮确知那是从上帝而来的拯救。

华亮由香港逃难到了中国桂林，于 1942 年七月三十一日获得驻桂林的英国领事馆颁发一份义勇军光荣退役的证明文件（图 5.7），结束了他在义勇军为期二年（1940 - 1942）的服务；这二年英勇的服务使他获英国政府颁赠了数枚勋章（图 5.8）；尽管他已退役，英国政府仍然为他在战事中受伤而负责，继续为他安排适当的治疗。

由 1949 年他返抵香港定居开始，直到 2009 年离世为止，英国政府都给他支付为数每星期只十一英便士（Shilling）的伤兵退休金（Disability Pension）；但是政府却不肯支付 1949 年之前的薪酬和退休金。

Kweilin No. 11.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t is to certify tha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the bearer, CHUNG WAH LEUNG (程华亮) was until 25-12-41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as a Searchlight Operator and Ruston Engine Driver in D.E.L. Detachment, 4th Battery.

持证人程华亮乃前在香港
英义勇军充当瞭望兵
携油灯及电力启动机关
理员特此证明

Wm Barclay

Per
KW
H.
By
CH
KING
Kweilin, 1st July, 1942.



图 5.7: 驻桂林的英国领事馆所颁发给华亮的一份义勇军光荣退役证明文件。



图 5.8: 华亮在英军服务时所获颁赠的勋章, 其中一枚(左三) 勋章上印有英皇佐治六世的肖像; 系在勋章上的布带颜色各有不同。

5.3 驼峰姻缘

华亮被英国政府军部送往重庆继续未完成的治疗。在逗留重庆的期间 (1942-1945 年, 图 5.9-5.11), 他受雇于澳洲领事馆 (Australian Legation), 为当任的澳洲驻中国领事 Sir William Eggleston 作私人秘书; 与此同时, 他亦在重庆的基督教会里面担任诗歌班的指挥及在教会的夜校任教。因为被炮弹所伤, 华亮面部的三叉神经线受损, 引致他下颚的部份面部肌肉萎缩, 嘴唇也向左面歪斜; 重庆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为他提供适当的治疗, 因此英国政府于 1943 年把他送至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所医院留医, 作进一步的诊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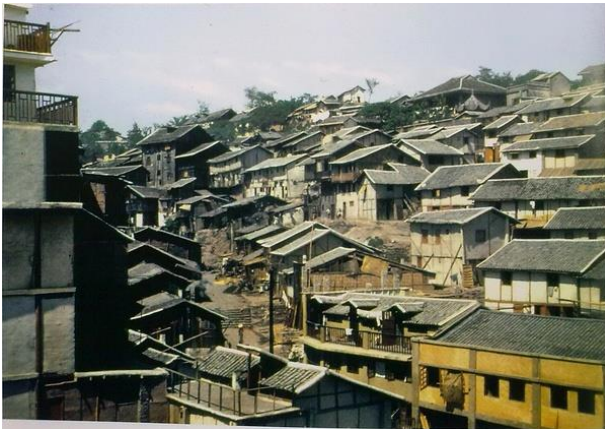


图 5.9.⁴⁸ 在 1945 年重庆市的一个住宅区。

⁴⁸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hina_from_the_Eyes_of_the_Flying_Tigers_1944-1945_58.jpg (公共领域)



图 5.10.⁴⁹ 在 1945 年重庆市街头。



图 5.11.⁵⁰ 1945 年在重庆，一个女人在码头附近的一个拥挤的街道被抬上轿子。

华亮知道我热爱音乐，并且懂得弹奏钢琴，于是提议为我找一部钢琴，好使我在闲暇的时候可以弹奏自娱 (图 5.12)；我们走遍大街小巷 (图 5.13 及 5.14)，他终于给我租下了一部音质颇佳的钢琴，放在 Lucy 家中 (图 5.12)；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为我搜罗了不少甚有份量的旧琴谱，好让我能够练习；此举令我深受感动，我不能够想象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他竟然可以为我找得如此优美的音乐琴谱，

⁴⁹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hina_from_the_Eyes_of_the_Flying_Tigers_1944-1945_57.jpg (公共领域)

⁵⁰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hina_from_the_Eyes_of_the_Flying_Tigers_1944-1945_55.jpg (公共领域)

我实在情不自禁地对他另眼相看。我们在家中相聚的时候，华亮，Lucy 和何先生唱圣诗，而我则弹琴伴奏，其乐也融融。



图 5.12⁵¹: 印度人的独特搬运方法：六名工人用头顶着一座钢琴，把它运往目的地。



图 5.13⁵²: 位于加尔各答十字路口交通干道的 Chowringhee Street。

⁵¹ <http://www.oldindianphotos.in/2009/05/life-in-calcutta-kolkata-1944-part-i.html> (公共领域)

⁵² <http://blog.pkp.in/2007/07/calcutta-1947-old-photos.html> (公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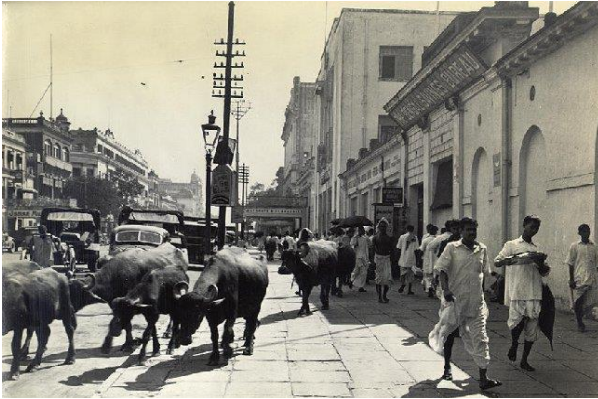


图 5.14⁵³: Old Court House Street 是加尔各答最繁忙的街道之一; 一群牛正在繁忙的街道上漫步; 旁若无人; 印度人奉牛为“圣”, 牠们可以随意的进入这儿的食物店铺饱餐一顿而不被制止的; 图片的左后方是此地最豪华的酒店 Great Eastern Hote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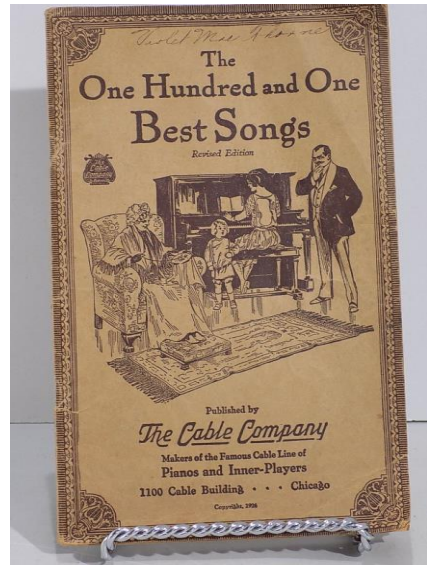


图 5.15: 这座钢琴是我租下放在 Lucy Wong 家中, 我在弹琴,华亮替我揭琴谱。

一个星期之后华亮在此地所进行的治疗已告一段落, 而他的病假亦已终结, 于是他辞别了我们, 返回重庆继续在澳洲领事馆的工作。当时我在中国航空公司的职位还是航空服务员, 每星期我都会随航机飞往重庆, 华亮也必定到机场来接我与他晚膳, 有些时候他把陈婉慈也带来与我们一起用膳, 饭后我会到陈婉慈家中

⁵³ <http://blog.pkp.in/2007/07/calcutta-1947-old-photos.html> (公共领域)

住宿一宵。只是半年后，中航公司取消了有航空服务员的客运服务，从此我不再用再飞行而是留在印度的中航公司总部任职护士；我们的交往唯有靠着一星期一封用英文书写（华亮打字，我则手写）的信件往来去维系着，我一直把这些信件完整无缺地保留着；想不到我们的感情就在不知不觉间一点一滴地被建立起来。

5.4 在印度的音乐友谊

我在 Lucy 家住了差不多三个月，待她的身体康复过来后便迁往别处，与 CNAC 的同事叶护士长 (Susie Yeh) 以六十印币 (Rupee) 租用一个小公寓，当时我的月薪是四百印币，相对之下，六十印币的租金实在是十分便宜的。

在那里我认识了住在同一层楼宇的租客俞履基先生及与他共住的同事，他在此地的商行工作，妻子和女儿则留在上海。俞先生的音乐造诣很高，能拉得一手小提琴，于是我弹琴，他拉小提琴，此唱彼和；经过差不多三年（每周二至三次，每次约二个小时）不断的练习，我的琴技也大有进步，虽然我们合作无间，却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

俞先生的雇主替他请来了一名厨子，每天都为他烹制美味的食谱，因此每当练习那天，我这馋嘴姑娘也可以得享美食！我喜欢留在家里，从不到外面的餐厅用膳，一方面可以享受宁静，更重要的是此举能节省金钱呢！



图 5.16⁵⁴: 加尔各答最豪华的 Great Eastern Hotel 里面的餐厅是美军常到访的地方；我曾在此与一名在从昆明到此地休假的美军上校共进晚餐(他是我的好友陈培英及佐治的朋友)，并且欣赏当地的传统表演 - 印度舞；直到如今，我对这儿美味的头盆甜芒还是念念不忘呢！只因为我素常都在家中用膳，从来没有到外面的餐厅（包括中国餐厅）用膳，所以我对这顿晚餐的印象特别深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Eastern_Hotel_\(Kolkata\)](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Eastern_Hotel_(Kolkata))

⁵⁴ http://www.cbi-history.com/part_vi_20th_af-2.html (Frank A. Bond 照片) (公共领域); <http://www.calcuttaweb.com/history.shtml> (公共领域).

有一次我曾与一名在从昆明到加尔各答休假的美军上校到此地最豪华的 Great Eastern Hotel 酒店里面的餐厅共进晚餐 (他是我的好友陈培英及佐治的朋友), 并且欣赏当地的传统表演 - 印度舞, 舞蹈员在跳舞时身体不动而头颈却能自由转动, 十分有趣, 其难度也颇高; 直到如今, 我对这顿美味晚餐中的头盆甜芒果还是念念不忘呢! (图 5.16)

CNAC 热衷于歌唱的朋友每个星期天都是风雨不改的聚集在我的家中练习唱歌, 很多时候我们手执那本 [一百零一首名歌] (101 Best Songs) (图 5.15) 的歌谱由开首唱至结尾也还是意犹未尽呢!

5.5 印度订情

我与华亮鸿雁相交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一直不断地为我们感情的发展而祷告神, 在神的带领底下, 我深知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老实人, 他爱主及敬畏神的心在他的行为人上已表露无遗, 是无可疑置的事实; 他表示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 经过多方的祷告后, 决意接受由美国颁赠的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 我十分佩服并且支持他这份追求上进的心, (当年肯冒险出国留学的年青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 他决定在 1945 年八月乘坐美国军舰途经欧洲到美国攻读大学, 我为他这决心不断地感谢神, 并且求神大大的赐福予他。

1945 年五月底, 华亮把领事馆的职位辞掉了, 由重庆飞抵加尔各答, 我们在分隔二地一年半之后重聚; 双方一直都切切地思念着对方, 故此我们极之珍惜这段相聚的日子。就在此时, 华亮向我提出结婚的要求; 尽管他是一个可托终身的对象, 我却也没有实时应允他, 一方面我须要在神面前恳切地祈祷, 另一方面我亦要征求双亲的同意。最后在神的印证及父母的同意下, 我决定将我的终身托付于他, 我只是向他提出唯一的要求, 那就是我一生最爱的必定是创造我的上帝, 第二是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材的母亲, 他在我心里只可以排列第三而已; 他不但接受, 并且对我这坦诚的表白表示极度的尊重。我深知我们婚后即要分离, 且一别便是四年, 是一段很长的日子, 我曾经提议等他完成学业后再谈论婚嫁, 但是华亮则认为若先结婚会使他更专心读书。于是我们迅速于六月十日星期天在我的教会 Old Mission Church (位于 Mission 街第十一号) (图 5.17 和 5.18) 的中文主日崇拜中向会众宣布订婚的消息, 并于崇拜后在我及叶护士长 (Susie Yeh) 的住所举行一个简单的茶会, 接受十多位弟兄姊妹的祝贺。

5.6 缔结良缘

我们的婚礼订于 1945 年七月七日在我的教会 Old Mission Church 举行 (由 G.F. Westcott 牧师主礼, 他的就任期由 1939 至 1946); 当时我的母亲在重庆而

父亲则身处曲江，故未能出席为我们主持婚礼，然而父亲却亲笔书写了一段对联送给我们作为结婚礼物 (图 5.16)。



图 5.17⁵⁵: 我在加尔各答的教会 Old Mission Church 之外廊。



图 5.18: 我的教会 Old Mission Church 之崇拜礼堂，可容纳一百多人一起敬拜；祭坛的墙上有三个长形的彩色玻璃窗，当阳光透过这玻璃窗射进来时，室内一片七彩缤纷，甚是美丽。礼堂的座位分左右两旁排列，座位中间的通道直通往祭坛，而讲台则设置在祭坛的左面。

因为我的双亲都未能从中国到来为我们主持婚礼的关系，我只好邀请在当地任职中国银行行长的李先生 (Paul Lee) 代替父亲在婚礼中领我进入教堂，并且作我们的证婚人；李先生对我实在呵护备至，待我如女儿一般，他甚至在我婚礼的当天，自掏腰包为我们在中国银行的大餐厅内设宴款待我们的亲友呢。虽然李先生以厚恩待我，然而在结婚的请柬上，我们还是要尊重长辈，以当时华亮家中最年长的四兄华超作为我们的家长，因为他的三兄华驹因战乱而不知所踪，生死未卜。

⁵⁵ <http://www.virtualserampore.org/Calcutta%20html/otherpix.html> (公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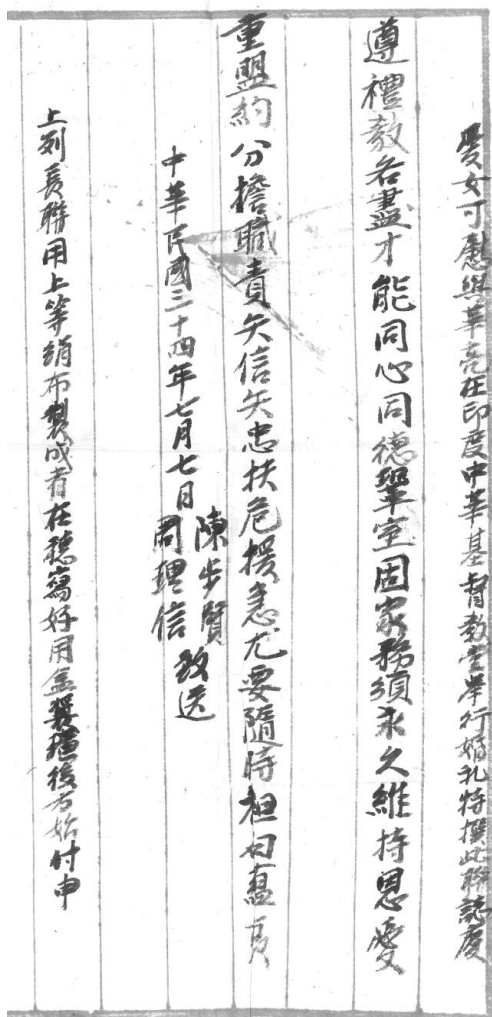


图 5.19: 父亲亲笔书写了一段对联送给我们作为结婚礼物。

筹备婚礼是一件极烦琐的事情，首先我们得准备一对订情信物“结婚指环”；于是我们到此地最著名的购物市场 [新市场] (New Market) (图 5.20 及 5.21)，以印币四十元 (40 Rupee) 买下了一对由 24K 黄金制造的指环，指环里面分别刻上了 [华亮给可慰] (Leslie to Rebecca) 和 [可慰给华亮] (Rebecca to Leslie) 的字句。然后我们又要为当天婚礼茶会所需用的三明治张罗，准备大量的面包；1945 年七月仍是战乱时期，当地的面包是需要用配给券才可购买得到，但感谢神丰富的预备，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乐意把他们的配给券送来供给我所需。



图 5.20⁵⁶: 印度加尔各答的 [新市场] (New Market) 可算是当时东方最大规模的市场, 位于加尔各答的市中心, 超过二千间商店为顾客供应不同的物品, 在物资短缺的大战时代, 实在是难能可贵。[新市场]是我常光顾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到此地的大型百货公司购物, 因为这儿的货品如珠宝首饰、食物布疋等, 包罗万有, 并且价钱公道。



图 5.21⁵⁷: [新市场] (New Market) 内其中的市商店之一。

⁵⁶ <http://www.oldindianphotos.in/2010/07/calcutta-kolkata-1945-american-military.html> (公共领域)

⁵⁷ <http://www.oldindianphotos.in/2010/07/calcutta-kolkata-1945-american-military.html> (公共领域)



图 5.22⁵⁸: 我在加尔各答的交通工具 - 人力车。

婚礼定于下午二时, 该日的早晨, 我独自一人乘坐人力车往 [新市场] (New Market) 去 (图 5.22); 我只懂得一些简单常用的印度语言, 当我坐上我的交通工具 [人力车] 时, 就对车夫说 Sida Jaiga New Market; Sida Jaiga 是印度语, 即 [向前行] 的意思。如此我顺利的抵达了 [新市场] 去购买我所需用的面包、新娘, 伴娘及花女之鲜花球 (实时购买的花球要比预先订购的便宜)、一些用作装载面包及蛋糕的大竹盘, 然后到饼店购买蛋糕。最后到婚纱店拿取我那花了四百印币 (400 Rupee; 一美元可兑换四元印币) 由印度裁缝师精心设计的昂贵婚纱, 他在整件婚纱上用手工缝上白色丝带结成的花球, 婚纱的尾部拖着一幅长曳的燕尾, 令人穿上后更显得高贵美丽 (图 5.23-5.25)。

伴郎是华亮在香港华仁中学时期的同学李佑荣 (Y.Y. Lee), 他在大学毕业后任职于中国航空公司当营业部主任。伴娘本是我的好友 Jenny Tsang, 可惜因为她临时感到身体不适, 结果由另一好友 Mavis Leung 替代。

我把买来的面包送往张太施帼英 (Mrs Amos Bush) 家中, 让那些早已在那里齐集的教会姊妹替我制造三明治, 然后我便在张太家中准备出嫁; 我在教会里认识张太, 她比我年长, 对我呵护备至, 待我如自己家人一般, 我在印度没有亲人, 只好把她的家当作我的外家, 张太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图 5.23); 她的丈夫张先生 (Mr Amos Bush) 更为我的婚礼拍摄彩色电影, 在那个年代拍录彩色电影是高科技的创举, 我实在感谢我的天父, 因为祂以厚恩待我。我们又向英国驻加尔各答的官员 Sir Gibson 借用他的私人汽车和穿着制服的司机 (图 5.26) 作我们的婚礼 (图 5.27) 所用。我的未来契妹陈帼超 (Patsy Tan) 在婚车后面系上一大串铁罐子, 又在车子的尾部挂上 “刚结婚” (Just Married) 的牌子, 当婚车行驶时, 后面的铁罐子唧唧作响, 吸引很多途人驻足围观, 为我的婚礼平添不少色彩。

⁵⁸ <http://groups.yahoo.com/group/Roshnee/message/9273> (公共领域)

婚礼茶会(图 5.28-5.30):在中国旅行社举行,当天恰巧是七七国庆节,纪念因1937年七月七日爆发中日战争的[卢沟桥事变],此事变就是中国抗日行动的开始;为了纪念这国庆节,当天早上在中国旅行社的花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他们在花园里搭建了一座棚,并且摆设了很多台子和椅子;我们的婚礼茶会是下午四时,因此庆祝会完结后,这些摆设刚好为我们的婚礼所用,我们不禁又为上帝的看顾及预备而心存感谢。

到来参加婚礼的嘉宾共百多人,除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外,CNAC中航公司的多位同事也来向我们祝贺,其中包括叶护士长(Susie Yeh)和我的上司 Richards 医生(1903-1992);还有任打字员却是我在玛丽医院的同期护士同学曾浦倩 Jenny Tsang (曾浦倩不久下嫁在重庆结识的英国公务员 Cameron 先生,可惜夫婿于婚后数年即病逝了)。



图 5.23: 张太施帽英(右)和教会的姊妹古太(左)替我装扮,准备出嫁。



图 5.24: 1945 年七月七日结婚礼成后, 与临时伴娘 Mavis (代替身体不适的 Jenny Tsang) 及花女 Patsy (张太的二女儿) 摄于 Old Mission Church 门前的台阶上。此图与图 5.14 的地方相距不远。



图 5.25: 价值四百印币,由印度裁缝师精心设计的昂贵婚纱; 裁缝师在婚纱上用手工缝上由白色丝带结成的花球。



图 5.26 (上): 我与伴娘及花女步出 [豪华的花车]进入教会礼堂, 我们手捧的鲜花是我于当天早上从 New Market 那里购买的。右立者是证婚人 Paul Lee 李先生; 图中左起: 花女、伴娘、我和 Paul Lee 先生。

图 5.27 (下): 新郎新娘与伴郎李佑荣 (左)及伴娘 Mavis Leung (右) 合照。



图 5.28 (左): 婚礼茶会中, 新娘与好友曾浦倩 (Jenny Tsang 右)正在欣赏那由宾客所送精心设计的结婚蛋糕。在众嘉宾中曾浦倩是我唯一在香港时的朋友。

图 5.29 (右): 婚礼茶会中的一角, 图中在我前面的椅子是破烂的。



图 5.30: 婚礼茶会的一部份嘉宾; 当中身穿印花长旗袍者是张太施帼英, 她的旁边是古太。

在婚礼茶会中, 我们夫唱妇随, 华亮在台上高唱二首名曲“*I'll walk beside you*” (我伴你同行) 和“*Holy City*” (圣城)来赞美神的伟大及其丰富的预备, 而我则以钢琴伴奏。二首名曲的歌词如下:

I'll walk beside you (我伴你同行)
曲: Alan Murray / Edward Lockton

*I'll walk beside you through the world today
While dreams and songs and flowers bless your way
I'll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hold your hand
I'll walk beside you through the golden land
I'll walk beside you through the world tonight
Beneath the starry skies ablaze with light*

*And in your heart loves's tender words I'll hide
I'll walk beside you through the eventide*

*I'll walk beside you through the passing years
Through days of cloud and sunshine, joy and tears
And when the great call comes, though sunset gleams
I'll walk beside you through the land of dreams*

Holy City (圣城)

曲: Michael Maybrick / Stephen Adams

词: Frederick E. Westlerly

*Jerusalem! Jerusalem!
Lift up your gates and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当年陈博生医生(Dr P.S. Chan; 他是加尔各答 Old Mission Church 教会中文堂的信徒之一) 及其他信徒在加尔各答的中文报纸为我们的婚礼刊登了二则结婚贺词。(图 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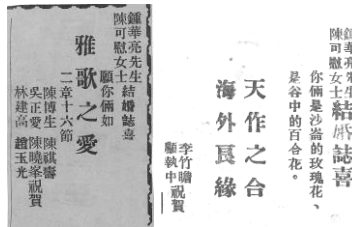


图 5.31: 在加尔各答中文报章上刊登的二则结婚贺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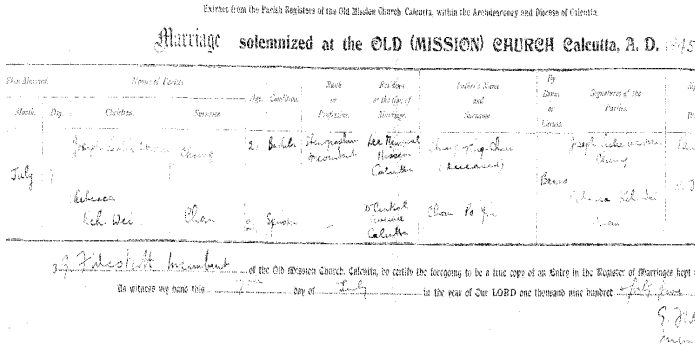


图 5.32: Old Mission Church 发给我及华亮的结婚证书。当时华亮的名字是 Joseph Leslie Warren Chung. 证书上有 Westcott 牧师的签名; 证书很长, 这里只是证书的一部份而已。

Old Mission Church 颁发结婚证书(图 5.32) 给我及华亮。证书上华亮的名字是 Joseph Leslie Warren Chung; 证书上有 Westcott 牧师的签名。

在婚礼中领我进入教堂的李先生 (Paul Lee) 款待我们的好友, 二桌酒宴由中国银行所雇用的大厨子亲自操刀, 故此菜色异常丰富。

陈博生医生 (图 5.33) 更专程从上海带来了一套十人用的绿色瓷器餐具送给我们作结婚礼物, 这套古董餐具一直陪伴着我, 从印度到上海, 从上海到香港, 如今在加拿大我还是把它珍而重之的保存着。



图 5.33: Westcott 牧师(右) 和陈博生医生(左) 1946 年摄于 Old Mission Church。

5.7 婚后即分离

婚后只有一个多月, 华亮便照着原定的计划, 于 1945 年八月廿八日乘坐美国军舰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攻读大学 (拉法叶大学, Lafayette College, 图 5.31 及 5.32), 主修经济学, 因为要上班之原故, 当天我没有往送船。华亮于九月廿六日抵达美国, 如此我们又再度回复每周一信的鸿雁相交生活了。



图 5:34 (左): 美国宾州 Easton 市拉法叶大学 Lafayette College 校园内的大片草坪被多座建筑物围绕着



图 5:35 (右): 拉法叶大学 Lafayette College 校园内的大树在秋季时转为金黄色,并且遍地落叶, 华亮正是站在园内落叶之上。

虽然华亮获取了大学的奖学金, 不须为学费去筹算, 但生活费用却仍是必须要预备妥当的; 他在中国工作的时候, 省吃俭用, 把储蓄的国币在中国银行以公价兑换外汇的方法购买了五千美元 (五千美元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最高限额) 他带着这笔储蓄用作生活费; 只是五千美元是不敷应用的, 我还是须要汇款资助他在美国最后一年的生活费用。很多与我共事的 CNAC 同事都为我的选择感到诧异, 原因是很多在 CNAC 工作的男同事都具有更优厚的条件, 他们不但是大学毕业生, 并且拥有高薪厚职; 但是在我的心底里, 我深知他是神为我预备的配偶, 我并非是一个草率行事的人, 而是经过长期不断的祷告才作出这决定的; 我忠于神的托付及自己的抉择, 所以不惜付上代价, 忍受婚后即分离之苦及资助他完成学业, 并且每事都为他的好处着想。

其实华亮是一个责任感极重的人, 他在美国努力读书之余, 又在校内及校外兼职工作, 赚取生活费用。1946 年和 1947 年的暑假期间, 他曾在纽约市的汇丰银行任职实习书记 (Trainee Clerk); 又在中国贸易公司 (China Trading Co) 为上海驻纽约的中国贸易公司之代表任秘书; 更在大学里担任校牧 (Chaplain) 的助手。在分别的三年多里面 (1945 年八月至 1948 年十二月), 我们没有见过面, 只是一直维持着每星期一封书信来彼此互诉心曲, 纵使我们十分思念对方, 也舍不得花钱去打那费用昂贵的长途电话。

5.8 婚后大幅度加薪

想不到神奇的计划又再一次显明在我身上；婚后不久，CNAC 医务处的院长 Richards 医生和叶护士长 (Susie Yeh) 同时向公司请辞，转职新成立的台湾中央航空公司，叶护士长的空缺就由我接任，自此我便成为 CNAC 的护士长，薪酬由原本的一百廿美元增加至一百七十五美元；更意想不到的却是我能够成为美国男女同工同酬制度下的受益者；美国的劳工法例规定员工不分男女，婚后一律获得家庭津贴，因此 CNAC 给予已婚的雇员家属在重庆领取一份相等于他们的月薪作为家庭生活津贴；换句话说，我在婚后即可获取双倍的薪酬。感谢神，我不但不需为支持华亮读书而费神，更可以继续供养双亲及供给弟弟蔼东暂时在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及其后迁回原本在上海的上海医学院攻读医科的费用。当年弟弟每月都会到重庆的 CNAC 总部支取家庭津贴，然后交给住在重庆南岸的母亲；一次他在往母亲家的途中，不幸失足跌进一口没有水的井里，幸好一名途人把他救出而幸免于难。

5.9 放弃离职中国航空公司

有一位护士同学告诉我，四川省成都市的美军医院正在聘请护士，假若我对此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信求职。我听后感到十分雀跃，因为我的母亲当时住在重庆，而成都市与重庆市同属四川省，若然我能转职到成都市工作，就能够更接近母亲，于是我未经考虑便向 CNAC 请辞；我兴致勃勃地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不料她却立刻来信要求我再三思，并且力陈利害；在信中她向我详细解释不应该离开 CNAC 的原因；她表示美军于战后必定回归他们的祖国，然而 CNAC 则是中美合作的机构，即使战事结束，CNAC 还是存在的。我立即往见上司 Laube 医生 (Paul J. Laube, 1910-2001) (图 5.36)，希望可以挽回我的辞职请求，Laube 医生不但立刻退还我的辞职信，并且微笑着对我说：[我非常高与你肯改变主意]。因此我仍然留在 CNAC 工作共五年之久。母亲在这件事情上充分表现出她的智慧及远见。

Form-A-11.

PHONE DUM-DUM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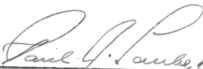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MEDICAL DEPARTMENT
DUM-DUM AERODROME

May 31, 1944.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Miss Rebecca Chan was employed as a nurse by CNAC from Dec. 1st, 1943 till June 1st, 1944. During that period her services were entirely satisfactory. I can recommend her without reservation as a nurse. She is leaving CNAC's employ at her own request.


Paul J. Laube, M.D.



PJL/edh

图 5.36: 我向中航公司 (CNAC) 请辞, 上司 Laube 医生为我签署推荐书; 其后我决定继续留任。

5.10 在印度教会的义务工作

我在加尔各答工作, 星期天如常返加尔各答的华人基督教会 (教会是 Old Mission Church 西人教会的一部份) 参加主日崇拜, 又积极参与义务工作; 感谢神, 祂使用我在教会崇拜时弹奏电风琴及钟楼里的钟, 虽然我懂得弹钢琴, 但对电风琴却是陌生的, 幸而得到这教会的风琴师 (F.S. Stenton Dozey) 免费的教导, 我可以在星期天的崇拜里以电风琴作伴奏。我又发觉教会缺乏中文书籍, 因此当我于 1946 年迁居上海后, 给他们寄运了约为数十本中文书籍, 万想不到该教会竟然为此设立了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呢!

除了每星期一次借用 Old Mission Church 作主日崇拜及开办主日学外, 每星期我都会腾出一个晚上在唐人街的一位基督教朋友陈博生医生的诊所内研习及查考圣经; 我们在这查经班引领了不少当地的华人和 CNAC 的同事认识上帝。一

位在 CNAC 作机械员名叫 Sze U Uing 的同事于 1945 年八月廿日在 Old Mission Church 教会接受了水礼 (受洗加入基督名下)。后来 Sze 先生跟随 CNAC 的总部迁移上海, 并且进入了上海的圣经学院 (Yan Chu Bible School) 进修神学, 而陈博生医生亦回归上海进修神学, 他们二人都为献身作传道人作好准备呢! (图 5.37 及 5.38)



图 5.37: 陈博生医生 (后右) 与 Old Mission Church 教会的主日学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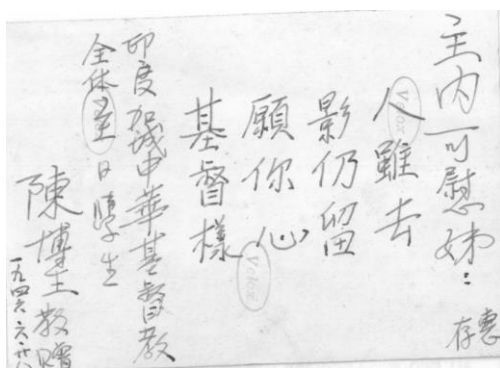


图 5.38: 陈博生医生亲笔在图 5.38 的相片背面所书写给我留念的诗句。

第六章: 和平后

1946 和平后, 我随着 CNAC 从印度迁到祖国上海, 一年后被公司提升为护士长, 负责处理数千名员工的档案及训练 [空中小姐] 的医疗急救技术。在 1948 年 10 月, 我因为国内政局不稳定而离职 CNAC, 离开中国返回香港定居, 同年的 12 月丈夫华亮也完成学业从美国返港与我团聚, 结束了三年半相隔二地的婚姻生活。弟弟霭东于 1948 年在上海医科毕业返港后, 不久再往加拿大继续进修。为了供给弟弟在加拿大的生活费, 我在香港曾不眠不休地一身兼三职工作达一年半之久。又为了让父母亲有一个安居之所而不惜在香港借钱买地, 想不到三十年后 (当我退休之后), 因为卖地而得到经济上的充足。

- 6.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 6.2 重返祖国 - 上海
- 6.3 上海中国航空公司的组织
- 6.4 上海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
- 6.5 郊游
- 6.6 成立歌咏团
- 6.7 因政局而离职中国航空公司
- 6.8 在香港为弟弟一身兼三职
- 6.9 为父母借款在香港买地
- 6.10 父亲隐居及病逝于香港
- 6.11 家庭与事业的发展
- 6.12 回顾事业与家庭

6.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从 1945 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二日，主要同盟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当时已被占领的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此会议名叫波茨坦会议 (Potsdam Conference)；与会者有代表苏联的斯大林大元帅 (Stalin)、英国的丘吉尔首相 (Churchill) 和美国的杜鲁门总统 (Truman)，(图 6.1 及 6.2)。1945 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发表“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向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要求；由于日本内阁的意见分歧，日本拒绝接受所提之条款。



图 6.1: 从 1945 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二日，主要同盟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会议 (Potsdam Conference) 会晤。



图 6.2.⁵⁹ 在德国的波茨坦会议，由左到右：英国首相丘吉尔 (Churchill, 1874-1965)、美国总统杜鲁门 (Truman, 1884-1972) 和苏联大元帅斯大林 (Stalin, 1878-1953)，并排坐在花园中接受访问。

美国于 1945 年八月六日向日本的广岛及八月九日向长崎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后 (图 6.3)，美国心理战专家建议美军飞机于空中向日本投下传单，勒令日本投降及告知盟军对其拒绝投降之反应；因此美国军机于八月十三日向日本投下传

⁵⁹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tsdam_Conference (公共领域)

单。果然,日本天皇裕仁(昭和 1901-1989)于 1945 年八月十五日宣布向盟军投降。随后,日本与盟军签署投降文件(图 6.4),因此香港获得解放(图 6.5)。1945 年九月二十七日日皇和美国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在东京美国大使馆会晤(图 6.6);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正式结束了。虽然日皇没有接受审判,但他却被迫向外界否认自己是一个化身神威(日本国家神道的信仰),因为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认为日皇只是领导日本进占他国,并非是神;但“神威放弃”只是外国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日本人民对此并不在意。日皇公开否定他拥有神的地位时,态度故意模糊不清;因此在战后期间,日皇裕仁反倒成为国家的新希望(图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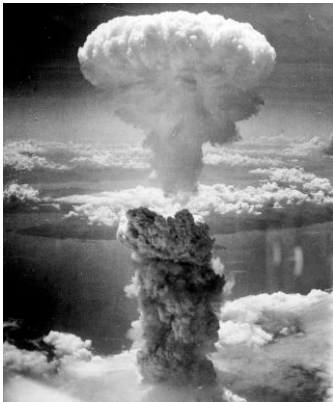


图6.3⁶⁰(左):美国于1945年八月九日向日本的长崎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图6.4⁶¹(右):美国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在1945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USS MISSOURI)军舰上正式接受日本投降。



图 6.5⁶²:香港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解放的仪式发生在香港中环和平纪念碑。

⁶⁰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Nagasakibomb.jpg> (公共领域)

⁶¹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Douglas_MacArthur_signs_formal_surrender.jpg (公共领域)



图 6.6: (左)⁶³ 日皇裕仁(右, Hirohito, 1901-1989)和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左, MacArthur, 1880-1964)于 1945 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第一次会议。(右)⁶⁴ 日皇裕仁在 1938 年八月期间检查陆军。



图 6.7⁶⁵: 日皇裕仁在 1947 年访问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时接受国民热烈欢迎。

6.2 重返祖国 - 上海

和平后不久, 于 1946 年 CNAC 将印度的中航总公司迁移至上海, 所有在印度工作而又愿意跟随公司移师上海的员工及其家眷都获得免费机票到上海; 当时华亮还在美国读书, 同时我亦要负起供养双亲及弟弟的责任, 我绝不能放弃这份高薪厚职, 因此我亦顺理成章地随着公司返回上海工作。

⁶²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945_liberation_of_Hong_Kong_at_Cenotaph.jpg (公共领域)

⁶³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acarthur_hirohito.jpg (公共领域)

⁶⁴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mperor_Sh%C5%8Dwa_Army_1938-1-8.jpg (公共领域)

⁶⁵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mperor_Showa_visit_to_Hiroshima_in_1947.JPG (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



图 6.8: 随中国航空公司 (CNAC) 由加尔各答移师上海后摄。

我向公司申请了机票, 从加尔各答飞往重庆, 把母亲接到上海去。自从 1944 年停止飞行[驼峰航线]后, 我与母亲阔别两年后首度与她相见, 只见她戴上厚厚的老花眼镜埋首作女红, 艰辛的岁月把她折磨透了, 老态毕现, 心里一阵酸痛, 再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了。那时母亲与我同住在于上海法租界的 CNAC 宿舍, 而弟弟也由重庆搬至上海, 住在上海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里 (图 6.8 及 6.9); 但是母亲只住了数月即离开上海返回香港与她的八弟周怀璋医生相聚。

6.3 上海 CNAC 的组织

CNAC 的总部设立在上海市中心黄浦江边的龙华机场 (图 6.10-6.12), 公司的组织十分庞大, 所服务的范围包括交通, 机械, 医疗, 饮食, 财务等等; 雇用的员工多达数千名, 全部都被安排住进位于法租界的员工宿舍里; 每天早上公司都会派出车子把我们送到工作的地方去, 车队于早上八时由宿舍出发, 大约在八时四十五分便抵达龙华机场。中午的时候, 所有的员工都会在机场的食堂享用公司为我们预备的中式午餐; 很多时候, 我都会把华亮从美国寄来的流声机拿出来播放一些音乐, 与比较相熟的同事于午饭后翩然起舞, 藉此舒缓繁忙和紧张的工作。



图 6.9: 1946 年与母亲及弟弟摄于上海。



图 6.10: 与同事于冬天时摄于上海龙华机场; 图中由左至右: : Gloria Kong、我和 黄爱珍 (Loretta Wong); 图中机场大楼有 [CNAC 上海站]的标志。



图 6.11: 在中国航空公司 CNAC 停泊在上海龙华机场的客机前合照, 图中由左至右: 黄爱珍、Gloria Kong 与我; 飞机上有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的标志。



图 6.12: 摄于上海龙华机场中航公司 CNAC 的客机前, 当时是夏季。

6.4 上海 CNAC 的工作

在上海的初期, 我的上司是随航机飞行的 Richards 医生 (1903 – 1992), 护士长仍旧是由加尔各答随 CNAC 调派来上海的 Susie Yeh; 后来他们二人都双双转职到台湾的中央航空公司工作, 因此在 1947 年七月, 我被公司提升为护士长代替 Susie Yeh, 而上司则是代替 Richards 医生的医疗部长 Charles F Hoey 医生 (图 6.13-6.15); 以上的二名上司 Richards 医生和 Hoey 医生 均十分平易近人, 从来都没有摆官架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 他们其中一人 (我忘记是谁) 要前往日本公干, 出发前询问我是否需要他从日本带一些我喜爱的东西回来, 我只是随便地告诉他我希望拥有一条珍珠项链; 想不到他果然替我买来了一条令我爱不释手的价值十美元的珍珠项链, 令我喜出望外, 我忙把买价十美元还给他。



图 6.13: 1947 年上海中航公司医疗队: 我 (后右一)、程弘 (化验师, 后右二)、Hoey 医生 (后右三)、Jane Wong (前左二)、Lorraine Wu (前左三)、黄爱珍 (前右三)、Gloria Kong (前右二)、Susie Yeh (前右一)、医务部秘书 Rosemary Yen 严 (前左一) 及护士 Nora (后左一) 合照。



图 6.14: 一群医疗人员与 Hoey 医生摄于上海龙华机场: Hoey 医生 (后左一)、我 (后左二)、Lorraine Wu (后左三)、程弘 (后右一)、叶护士长 (前左一)、黄爱珍 (前左二)、Gloria Kong (右一)。



图 6.15: Hoey 医生驾驶着 CNAC 为他供应的汽车往上海龙华机场。



图 6.16: (左) 我在上海 CNAC 负责处理数千名员工的医疗档案。



图 6.17: (右) 上海诊所一角。

跟在印度时一样，我仍在 CNAC 上海的医疗所担任护理的工作，又负责处理数千名员工的医疗档案（图 6.16-6.18）；并且更要担负起训练航空服务员（俗称空中小姐）紧急救援技术的责任。和平后，驼峰航线虽然被取消了，CNAC 却在中国不同的省份开辟了很多新航线，招聘了不少航空服务员，她们已不再像以往的航空服务员一般拥有护士资格，所以接受基本的医疗护理常识及急救训练实在是必须的；想不到这作导师的经验为我日后在香港护士学校成为护士教师而铺路。我还记得在第一批急救训练班当中的一名年纪甚轻的航空服务员不幸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了（图 6.19）。

感谢神，在上海二年多里面我有很多在医疗上实习和学习的机会，其中最令我印象难忘的是我学会了怎样替伤口缝针；当时有一名机械工程师因为修理飞机的

螺旋桨时一只手指不幸被割断了, 当他被送到医院诊所的时候, 那节断指仍是摇摇欲坠地悬挂在那鲜血淋漓的手掌上, 十分可怕; 当时医院内没有医生, 护士长 Susie Yeh 指派我为他处理伤口; 逼于无奈, 我惟有硬着头皮独自处理他的断指; 首先我把那悬挂着的断指切掉, 然后小心奕奕地把伤口的皮肉修剪整齐, 最后才把伤口缝合。次日当医生到来诊断这伤者的时候, 对我的果敢及手术的完善表示极度赞扬呢!



图 6.18: 医护人员摄于墙上有 CNAC 标志的医院大楼前: Jane Wong (左一)、黄爱珍 (左二)、我 (左三)、Judy (左四)、主任医生 Dr. Wally Wong (左五)、Lorraine Wu (右四)、程弘 (右三) 及许燕清 (右一)。



图 6.19⁶⁶: 首批航空服务员于 1947 年九月摄于上海训练中心

⁶⁶ <http://www.cnac.org/flightattendants01.htm> (CNAC.org 提供)

6.5 郊游

周末不用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行八人都会相约一起外出旅行, 我们曾经到上海的黄家花园游览 (图 6.20 及 6.21), 又曾踏足无锡 (图 6.22-6.24); 我十分怀念无锡的著名小吃 - 里面放了虾米的咸豆腐花 (图 6.25 及 6.26); 上海与无锡相隔两岸, 我们必须乘坐渡轮才可抵彼岸; 还记得一次其中一名护士 Jane Wong (图 6.23; 图中左二): 在登船时不慎把手袋掉进水里去, 同行的机械师伊德华立时跳水替她把手袋捡回。我们在旅游时观看神所创造的宇宙, 当我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时, 实在感觉天父的伟大而自己的渺小。与我最要好的同事包括刚在玛丽医院毕业即被我邀请从香港而来的护士黄爱珍 (Loretta Wong; 图 6.23: 图中左三), 爱珍后来更成为香港东华三院的总护士长及我二女儿端玲的契娘呢! 另外一位跟我非常要好的同事余凤仙 (Winnie Yu) 则任职于公司的财政部。



图 6.20: 游览上海的黄家花园,图中由左至右: 护士黄爱珍、护士 Gloria Kong、我、莫乃诚 (CNAC 机械员)、Martin (叶护士长的丈夫, CNAC 机械员) 与叶护士长 Susie Yeh



图 6.21: 盛夏之时游览上海的黄家花园。图中由左至右: 黄爱珍、Gloria Kong、我和叶护士长 (我们全是受雇于 CNAC 的护士)。



图 6.22: 与 CNAC 同事乘坐渡轮由上海到无锡。



图 6.23 :与一群 CNAC 同事往无锡旅行: 由左至右: 弟弟霭东、Jane Wong、黄爱珍、我、莫乃诚、陈念桐 (CNAC 机械员, 我在加尔各答带领他信主, 因此他称我为 [契娘])。



图 6.24: 游览无锡公园, 当时正是冬天, 有些游览者身穿中式服装, 一些则穿上西式衣服, 十分有趣。图中由左至右: Jane Wong、我和黄爱珍。



图 6.25: 于无锡公园内品尝当地驰名的咸豆腐花。黄爱珍 (右)与我 (右二) 在等待那碗咸豆腐花时的馋嘴样子。背向者是贩卖咸豆腐花的小贩。



图 6.26: 在严寒的冬天品尝热气腾腾的咸豆腐花，实在是至高无尚的享受。站立者: 黄爱珍 (右)、我 (中) ; Jane Wong 坐在最左面; 站在我面前弯着腰者是贩卖咸豆腐花的小贩。

6.6 成立歌咏团

在 CNAC 工作的时候, 我于工余的时间组织了一队从 CNAC 的同事而来, 为数约四十人的歌咏团; 特别情商吴东律师为我们的歌唱咏作指挥。我们的演出获得外界好评如潮, 当地的报章也争相报导 (图 6.27)。吴东先生后来成为香港圣保罗男校合唱团的指挥, 并且屡获香港校际音乐节比赛的大奖。

吴东律师的太太是一位资深的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毕业), 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曾在她的门下学习弹奏钢琴一年之久, 所学的包括几首贝多芬的奏鸣曲, 例如著名的月光奏鸣曲; 琴谱是华亮在印度加尔各答替我买的。



图 6.27: 由我所组织的 CNAC 歌咏团在一次成功的演出后合照 (此照片曾刊登在报章上); 歌咏团的指挥是吴东先生 (前排身穿黑色礼服者); 图中前排左一是许燕清、黄爱珍 (前左三)、护士 Judy (前右三)、Lorraine Wu (前右二)、我站在吴东先生身后 (中排右五)、男高音刘年美 Peter Liu (第三排左一)、陈念桐 (第三排右一)、男高音莫乃诚 (最后一排右三)。

6.7 因政局而离职 CNAC 返回香港

虽然大战结束了, 但中国的政治局势还是动荡不定, 内战频频, 为了我们的安全, 华亮于 1948 年从美国不断的来信催促我返回香港去; 于是在 1948 年十月, 我向 CNAC 请辞,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任职五年月薪高达二百五十美元的高薪厚职 (图 6.28), 独自返回香港; 同年的十二月, 华亮亦完成了他的课程, 顺利取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 (B.A.), 便返回香港与我团聚, 结束了三年多夫妇二人分隔两地的

生活，我与丈夫一同在香港开始了我们人生宝贵的另一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的内战于 1948 年底结束，1949 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正式诞生了。



图 6.28: 我向中国航空公司请辞，这是 CNAC 于 1948 年九月二十九日发给我的证明书，书上明列我的个人资料，职位及薪酬，还有人事部主任刘先生的签名呢。

能够与父母团聚，我感到兴奋莫名，可惜在我回港之前，外祖父已离世返回天家了，我只好到他安葬在薄扶林道基督教坟场的墓前探望他(图 6.29)，那坟地是我

在玛丽医院作护士学生时常往练声及查考圣经的地方。我十分想念我的外祖父，特别当想念到童年时与他共处的那段日子时，真的有点依依不舍之感；然而我确知我只是与他暂别，将来我必定可以在天上再与他相见。



图 6.29: 外祖父同清泉在我尚未返港之前已因病去世，我到他那位于港岛薄扶林道的基督教坟场（那是我作护士学生时常往练声及查考圣经的地方）的墓地去探望，图左是外祖母墓碑的小部份，其设计与外祖父的一模一样。

6.8 在香港为弟弟一身兼三职

1948年十月回港后，我立时受聘于母亲曾任职，又是我长大的地方 - 养和医院，我的职位是护士主任 (Nursing Sister-in-charge)，负责管理四楼（包括特别为外籍病人而设）的病房，同时更兼任护士教师；医院所给予的工资只有每月四百港元，相等于当时八十美元，与 CNAC 时期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的薪酬相比，本是令人感到泄气的事，然而我却为了能与家人团聚而欢喜快乐，只是每天的工作长达十一小时（星期一至六，每天由早上七时半工作至晚上六时半）则令我感到有点儿吃不消而已。

稍后弟弟霭东在上海医学院完成了医学课程（图 6.30），毕业后返回香港（图 6.31），但是他仍有意往加拿大进修精神科。我的母亲是一个计划周详的人，她早已为弟弟储存了一笔为数五千美元的教育费，可惜在乱世中被亲人骗去了；我

为了弟弟的前途, 为了父母亲对他的期望, 更希望他学成后有足够的能力去供养双亲终老, 因此我毫不考虑就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送给他。



图 6.30: 1948 年参加弟弟霭东在上海医学院毕业典礼后合照, 当天参加毕业典礼的嘉宾十分踊跃, 甚是热闹, 图中所见, 医学院的二楼也挤满人呢!



图 6.31: (上) 1948 年底我们一家人终于在香港团聚。(下) 1949 年与八舅父周怀璋一家; 我自己 (右前 1), 夫钟华亮 (右后 1), 表妹周妙儿的丈夫陈宗超 (右后 2), 表妹周妙儿 (右后 3), 柯冰 (八舅父周怀璋的契子) (左后 3), 八舅父周怀璋 (左后 2), 八舅母 (左后 1), 九舅母 (右前 2)。



图 6.32: 弟弟霏东与华亮于 1948 往美国纽约旅游; 左图: 华亮与霏东; 右图: 霏东。



图 6.33: 我与华亮租住在位于香港西营盘第三街只有一房一厅 (我们亲自动手间格) 的小公寓; 这里接近我通宵轮值工作的玛丽医院, 我只须乘坐四号巴士即可到达医院。那时的租金是港币一百三十元, 然而顶手费却大约是一千四百港元。1950 年长女敏玲出生时, 我的母亲与我们同住在这里。

弟弟在加拿大安顿下来以后(图 6.32), 才知道当地的生活指数很高, 而他以学生的身份又不能在课余去兼职赚钱; 所以他来信要求我每月资助他生活费一百加元 (相等于当时五百港元); 我感到十分为难, 当时我在养和医院只有四百港元的薪酬, 即使我全数给了他也是不足的。为此我不断祷告神, 最后凭着信心, 我毅然于 1949 年三月辞退养和医院的工作, 转职到胡启勋医生 (Dr K.F. Woo) 医务所当护士, 我的工资仍然是四百港元, 但是工作时间却是减半, 每天只是由正午十二时到下午六时共六小时的工作, 因此我便可以每月拨出十个晚上在玛丽

医院以私家护士 (private nurse) 的身份由晚上八时到翌日早上八时一连十二小时通宵达旦地看顾病人; 那时每一次晚更的薪酬为五十港元, 这十次的晚更看护已足够支付弟弟在加拿大的生活费用 (图 6.33)。

不但如此, 在医务所下班后, 我还兼职到各大医生的诊所去推销西药, (其中有以前在昆明之惠滇医院任院长的姚汉平医生), 从药厂那里赚取佣金, 如是我一身兼三职, 便有足够的金钱去支持弟弟的学业;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半, 直到弟弟来信告诉我他在加拿大获得资助, 再不需要我帮补他的生活费用, 我才停止私人护士的通宵工作; 我为了免除弟弟的不安, 一直以来, 直到他在 1995 年离世时也从没有将这段艰苦赚钱供养他的情况告诉他。我十分感谢神赐下力量让我渡过这段即使在战乱时期也没有如斯艰辛的日子。

6.9 为父母借款在香港买地



图 6.34 (左): 父母亲在位于青衣岛宽敞的屋内摄; 室内的酸枝家俬全是战前制造的, 墙上挂着的二幅国画是我和弟弟在十多岁时跟包少游老师学绘画时的杰作。



图 6.35 (右): 摄于青衣岛村屋外。

约于 1940 年, 母亲的一位朋友认识香港青衣岛的乡绅李茂枝先生, 朋友建议母亲在李先生名下所拥有青衣岛部份的土地上兴建一座平房; 她经过详细考虑后,

终于盖了一所面积二千英呎, 内有五房一大厅的村屋 (图 6.34- 6.36)。当时她在港岛的养和医院工作, 住在医院宿舍里, 因此这所屋子只作渡假之用。日军占领香港后, 母亲及所有的家人都先后离开香港返回中国, 房子被迫空置着; 幸得一位曾经是我的八舅父周怀璋医生的佣人雀姐愿意迁往居住; 雀姐在那儿守望整整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香港沦陷期间, 日军大肆搜刮民居, 尚幸因为青衣岛远离港岛才幸免于难, 故此屋子, 屋内的纪念品及家具得以保留。1950 年和平后, 父亲即家居于此, 直到他离世。



图 6.36: 华亮与我及父母亲在青衣岛村门前入口处的梯级顶合照, 旁边的树木(包括竹)均是属于我们的; 图中由左至右: 华亮、父亲、母亲与我。

屋子的业权虽然属于母亲, 但是地权却是属于地主李先生的。不久, 李先生因为病重, 需要一笔庞大的医药费; 他以港币每英呎七仙的价钱向我出售这幅面积达五万英呎的土地; 当时我的储蓄不足以购买整幅土地, 于是要求李先生分割出售, 可是他仍坚持原意; 几经交涉, 他仍然坚持以港币三千五百元, 即每方呎七仙成交。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 实在没有能力以现金全数交易; 感谢天父的预备, 我从玛丽医院护士同学曾浦倩(Jenny Tsang) 那里借得港币二千元支付首期, 余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 我与华亮拼首抵足, 省吃俭用, 不足二年的时间我们已把所有的欠款清还了; 而我亦因此成为一名 [地主] 了。

香港政府计划兴建青马大桥, 需要收购我名下的土地 (土地如今位于大桥的一端), 政府发出了一张名为 Letter B 的卖地权证予我; 直到 1980 年我退休移民后才专程返港将土地卖给发展商; 卖价算不上高, 然而我的经济却因此而得以改善, 以致在退休期间不用只单靠退休金而勉强过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及祝福, 当年若不是为了让父母能拥有一个安居之所, 我绝对不会买下这幅土地, 更没有因

为孝顺而得福。圣经说：[当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6.10 父亲隐居及病逝于香港

爸爸回香港定居后一直隐居于青衣岛，过着与世无争，平静安稳的日子；往事已矣，他早已将以往的革命工作抛诸脑后，闲时只寄情于吟诗唱咏，亦自得其乐。虽然他再也没有为中国效力，然而建立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仍然给他发出养老金，再加上我和弟弟的供养，他晚年的生活还是丰裕的；至 1964 年他的身体转弱的时候，母亲更聘请了一名佣人专职照顾他。

1965 年，爸爸在青衣岛的家中突然中风，当时我正在位于九龙半岛的广华医院工作；当我获知此事后，医院的院长立即派出救护员与我一起经荃湾，再换乘一只用人力划上半小时的小船抵达青衣岛，然后再步行约十数分钟才到达爸爸家中；当时他已无法自行走动，救护员用担架把他抬至停泊在荃湾码头的救护车，然后把他送到广华医院去。因为我是医院员工之故，医院特别为他免费安排了一间私人病房，他在此病房留医了二个半月，终于因为肺炎于 1965 年十二月八日离世，安息主怀，那时他是八十二岁。我非常感谢医院对爸爸的慷慨和无条件的照顾。



图 6.37: 一群东华三院的护士学员在父亲的丧礼中向他作最后致敬。图右上是主持丧礼的循道会吴炳南牧师。左下角是常姐的背面，图中最右边的花圈是养和医院所赠。

爸爸逝世后，国民党立即派出一名曾是他好朋友的党员把三千港元交给我，作为爸爸的抚恤金，那位党员更嘱咐我必须替父亲挑选一口上好的棺木，后来我为爸爸选了一口由柳木造成的中式棺木（图 6.37），而他的寿衣则是廿年前我在上海为他以真丝所造的灰色长衫。循道会的二位牧师在 [香港殡仪馆] 为爸爸主持安息礼拜，到来吊唁的宾客中，还有六、七名是前中国国民党员呢！我把爸爸安葬在港岛半山区薄扶林道的华人基督教坟场（我的曾祖父周学牧师、外祖父母周清泉夫妇、八舅父母周怀璋夫妇全都安葬于此）。成为精神科医生的弟弟霭东，因为当年精神科在香港不被重视之故，早于 1964 年已迁居加拿大执业，所以他未能及时回港奔丧。

6.11 家庭与事业的发展

我们返港后，为了建立家庭而各自埋首在自己的事业中，我在养和医院以月薪港币四百元任职护士；华亮则以月薪港币八百元任教于圣保罗男女中学，共且兼任圣保罗英文夜校的校长；1949 年七月，圣保罗男女中学的校长胡素贞博士有鉴于当时的学校短缺，于是委派华亮筹办一所全新的，以圣保罗下午英文中学命名的中学，借用位于铁岗的圣保罗小学作校址（此校是圣马可中学的前身）。该校开办一年后，好评如潮，参与香港英文中学会考的学生成绩卓越，顺利的获准进入著名的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就读大学预科班。

正当新校办得有声有色之际，学校方面突然于 1953 年二月宣布停办；华亮心感不安，亦有点泄气，觉得前功尽废；他往见圣公会主席何明华会督，何会督表示他也未能挽回这局面。然而于 1953 年五月何会督把华亮引荐进入香港政府教育司署，成为副教育官 (Assistant Education Officer)，任教于政府官校油麻地官立中学，该校是采用英文教学，学生们十分欣赏华亮的英语及教学能力。此时我们的经济比较稳定，因为我们夫妇二人都同时任职于工资稳定及退休制度良好的香港政府（我在医务卫生署而他在教育司署）。二年后，华亮被转派往位于铜锣湾的皇仁中学执教鞭。

可能我曾就读于外文学校（拔萃女子中学），又曾在飞虎队及 CNAC 服务，与外籍同事有过很多共事机会的关系罢，从 1948 年十月至 1949 年三月在养和医院任职的期间，医院特别分派我去管理可供外籍病人留院的四楼作护士主任，同时更兼任教授护士学员。



图 6.38: 成立于 1870 年的东华三院历史源远流长, 是香港历史上最先及最大的慈善机构; 当中的 广华医院⁶⁷ (1911), 东华医院 (1890) 及 东华东院 (1929) 三间医院合称为 东华三院。图中所见是 东华三院 的标志。



图 6.39: 1950 年九月为长女敏玲摆设满月宴与亲友合照; 前排坐在地上的小孩由左至右: 钟绮玲 (华亮八弟钟华璋的大女儿)、钟锡基 (华亮八弟钟华璋的长子)、钟伟婷 (华亮四兄钟华超大女儿)、钟锡明 (华亮八弟钟华璋的次子)、吴仲侃 (后来成为建筑师及 Order of Canada, 华亮的姐姐钟锦新的次子); 第二排左起: 陈焕灵 (母亲的契女儿)、八舅父周怀璋、八舅母郭氏、母亲、华亮的母亲钟陈咏金手抱着敏玲、父亲、华亮的姐姐钟锦新的家翁吴鼎生、九舅母郭氏 (她是八舅母之姊)、契娘林克珍护士 (她与母亲共事于养和医院); 第三排由左至右: 华亮、华亮八弟钟华璋 (香港政府任卫生署帮办)、华亮的八弟妇黄玉芝、华亮四嫂关蕴芬 (香港圣心女书院的体育教师)、华亮的姐夫吴壮行、华亮的姐姐钟锦新 (英华女校的英文教师) 手中抱着她的三女吴小当、华亮的十弟钟华耀 (圣保罗男女中学音乐教师), 表妹周妙坤 (八舅父周怀璋的三女, 1928-)、表妹周妙儿 (八舅父的长女)、表妹周妙慈 (九舅父周怀佑的三女儿) 和我; 最顶一排自左至右: 表弟周耀雄 (九舅父周怀佑的长子)、陈宗超 (表妹周妙儿的丈夫)、柯冰 (八舅父的契子)、钟锦新的大儿子吴元苟医生、陈国光 (陈焕灵的父亲, 是养和医院的护士)。

⁶⁷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KwongWahHospital_OldBldg.jpg (公共领域)

那是神的恩典，1951年七月我进了香港政府的医务卫生署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当护士，并且被分派往东华三院(图 6.38) 护士学校任教。虽然当时我已累积了相当不错的护士经验，但我深知我必须再花上一年时间去进修妇产科，才有机会在香港政府晋升成为高级护士 (Sister)。可是如今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大女儿敏玲于 1950 年八月十日在一留产所由母亲协助底下诞生的 (图 6.39)。女儿刚出生不久，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我绝对不能轻率地作出继续进修的决定；我为此恳切地向天父祷告，而祂所赐下的恩典实在超过我所想所求，祂赐给我一位敬畏主的母亲，不但在神的真理底下把我教育成材，如今又协助我负起教育女儿的责任，使她自小就认识神，并且明白圣经真理，作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天父又赐下看顾我和弟弟，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家中服侍我们的常姐 (吴桂常, 1893-1986)，替我在家中打点一切日常的起居饮食(图 6.33)；我又得到丈夫华亮的体谅，鼓励和支持，我知道神已应允了我的祷告，使我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重返母校玛丽医院修毕为期一年 (由 1951 年七月至 1952 年六月) 的妇产科课程。



图 6.40 (左): 佣人琼姐抱着婴孩敏玲与常姐共坐在钢琴凳子上，这寓所位于香港北角渣华街五十七号三楼。(中) 丈夫抱着大女儿。

图 6.41 (右): 1952 年十月小女儿端玲满月，在香港铜锣湾悦兴酒家宴请亲友。



图 6.42: (上) 1950 年十二月长女敏玲于香港合一堂 (华亮在此教会成长) 受洗加入基督名下; 图中第一排由左至右: 八弟妇黄玉芝、我的契娘林克珍护士、母亲; 第二排由左至右: 华亮的十弟钟华耀、华亮的八弟钟华璋、王子棠牧师 (他是王子传医生的弟弟, 又是华亮姐姐的亲戚)、敏玲的契娘许慧馨、华亮的姐姐钟锦新、钟锦新的侄女、钟锦新的长子吴元苟、替敏玲施洗的李贞明牧师、钟锦新的丈夫吴壮行。跪着的是钟锦新的次子吴仲侃。(下) 1952 年十二月次女端玲于合一堂受洗加入基督名下; 图中第一排由左至右: 敏玲、钟绮玲 (华亮的八弟钟华璋的三女儿)、钟伟婷 (华亮的四兄华超的长女)、吴小当 (华亮的姐姐钟锦新的三女儿)、钟碧玲 (华亮的八弟钟华璋的四女儿); 第二排由左至右: 华亮的十弟钟华耀、家姑钟陈咏金 (1891-1980)、我与怀中的女儿端玲、华亮、母亲; 第三排由左至右: 八弟妇黄玉芝、十弟妇麦凤啣、华亮的姐姐钟锦新、我的契娘林克珍护士; 最后一排自左至右: 替端玲施洗的李贞明牧师、华亮的八弟钟华璋、王子棠牧师、华亮的四嫂关蕴芬、华亮的四兄华超、钟锦新的长子吴元苟。

结业后不久, 于 1952 年九月十二日, 我在玛丽医院诞下二女儿端玲 (图 6.41 及 6.42), 一切如常, 母亲仍然协助我教育二名乖巧的女儿 (图 6.43 及 6.44), 如同我们家人一般的常姐仍是忠心地照顾我们一家人的起居饮食, 而我与华亮则可以责无旁贷地分别发展我们的事业。

我与华亮于 1956 年首次置业, 我们属意位于铜锣湾恩平道一幢新建的, 面积八百多英呎三房两厅的平房 (图 6.45), 当时的楼价是港币四万元, 然后我们没有足够的储蓄, 母亲为我们向她的八弟周怀璋医生提出请求, 以当时银行借贷利率 12% 计算, 不用抵押的方式借取了四万元; 我们省吃俭用, 偶尔往看电影也选择平价的 [前座], 因此在二年内我们已把所有的欠款还清了。



图 6.43: 1952 年我与华亮及二名女儿摄于所租住, 位于香港北角渣华街的寓所内 (上左); 约 1956 年我和两个女儿游览 (上右); 1963 年八月长女敏玲 13 岁生日, 摄于位于香港跑马地的寓所内 (下); 从左到右: 华亮的八弟钟华璋的第五个女儿钟曼玲, 我弟弟的第二个女儿陈幸纯, 我弟弟的第四个儿子陈志远, 我弟弟的长女陈基纯, 我弟弟的第三个儿子陈志圣, 华亮十弟钟华耀的小女儿钟韵玲, 华耀的儿子钟锡勋, 敏玲端玲同学赵婉华, 钟华耀, 十弟妇麦凤卿, 敏玲, 端玲, 华亮三哥钟华驹的女儿钟妙玲, 敏玲端玲同学赵婉玲。



图 6.44: 长女敏玲四岁入学宴; 后排左起: 华亮(左一)、华亮当时在皇仁书院的同事黄励民、油麻地官立中学的徐虹砚, 校长、马敬全牧师、叶逊(我护士同学许慧馨的丈夫)、许慧馨(敏玲的契娘)、契娘黄瑶仙; 前排左起: 徐虹砚, 夫人、马敬全夫人、母校邹光小学的林婉芬副校长、邹光小学的吕陶英校长、母亲与怀中的端玲、敏玲、我、契娘林克真。



图 6.45: 这是我与华亮于 1956 年首次自置位于港岛铜锣湾恩平道的房子; 图中自左至右: 敏玲、我、华亮及端玲; 当天是敏玲的六岁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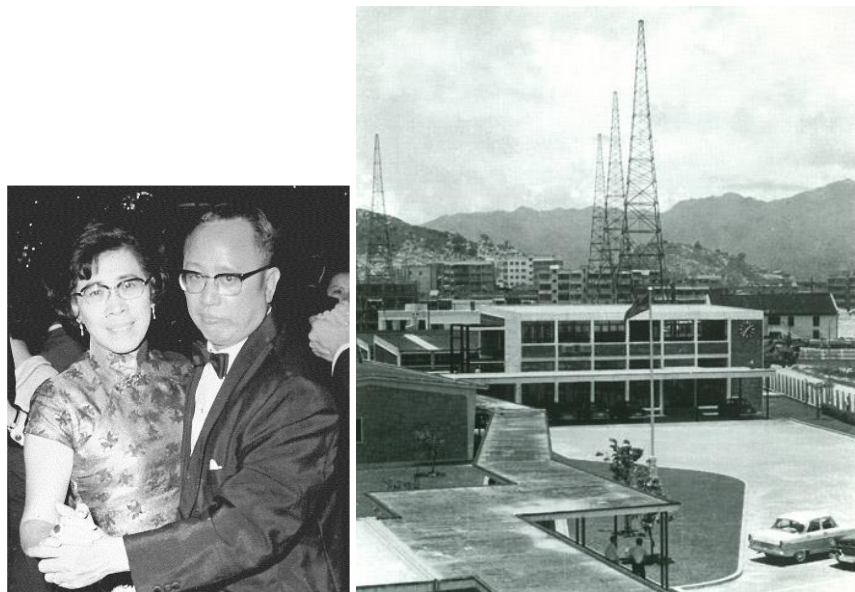


图 6.46: (左) 我与华亮在香港工业专门学院每年一度的圣诞舞会中跳舞。(右)⁶⁶ 学院



图 6.47: (左) 港岛跑马地比雅道一号地下是我与华亮于 1958 年购下的物业, 面积一千六百呎, 三房两厅, 我坐在宽大的露台拍下此照。房子背后是位于蓝塘道的马里诺女子中学。常姐非常悉心照料露台上的植物, 每当暴风雨来临之时, 她必忙着将所有植物移进后院的天井里去。(右) 我与两名女儿坐在大露台上: 坐在我左面的是敏玲, 右面是端玲。

⁶⁶http://www.polyu.edu.hk/cpa/poly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Itemid=44 (香港理工大学提供)



图 6.48 : (上左) 1965 年与丈夫; (上右) 1967 年左右与丈夫, 女儿, 母亲 (1890-1979) 和家姑钟陈咏金 (1891-1980)一起在家露台, 背景是玛丽诺学校 (Maryknoll Sisters School); 我的两个女儿所穿的裙子是我缝制的。(下) 我的两个女儿, 她们所穿的裙子是我缝制的。

1957 年华亮获香港政府选派, 以 Fulbright 学者的身份到英国及美国各半年考察当地的劳工制度; 回港后任教于香港工业专门学院 (Hong Kong Technical College, 即现今的香港理工大学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之工商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 Studies), 不久被提升为该系的主任, 直至 1972 年退休为止(图 6.46)。在退休前, 他更策划将香港理工学院提升为香港理工大学呢!

1958 年华亮获得政府分派位于跑马地比雅道一幢新建的公务员楼宇 (图 6.47 及 6.48), 面积约一千六百英呎三房两厅的花园洋房, 后花园在房子的后面, 并且有大露台及私人泊车位, 于是我们以五万七千元的楼价把恩平道的房子卖掉, 搬进这所宽敞的房子居住, 直到我们退休移民加拿大为止。



图 6.49: 1962 年在跑马地家中举行私人音乐演奏会后摄, 我们身后是新购置的 [大钢琴], 两名女儿学习钢琴, 我则学习声乐。

年少的时候, 我一直都有利用闲暇的时间来练声, 数十年来从未间断过, 如今生活稳定下来, 我更可以在工余的时间来学习声乐训练; 而我的二名女儿则学习弹奏钢琴; 偶尔我们会在家中举行音乐会 (图 6.49 及 6.50)。正如我的母亲一样, 我为两名女儿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 好使她们的潜能被发现及发挥, 她们不但学习钢琴, 更学习跳芭蕾舞及接受声乐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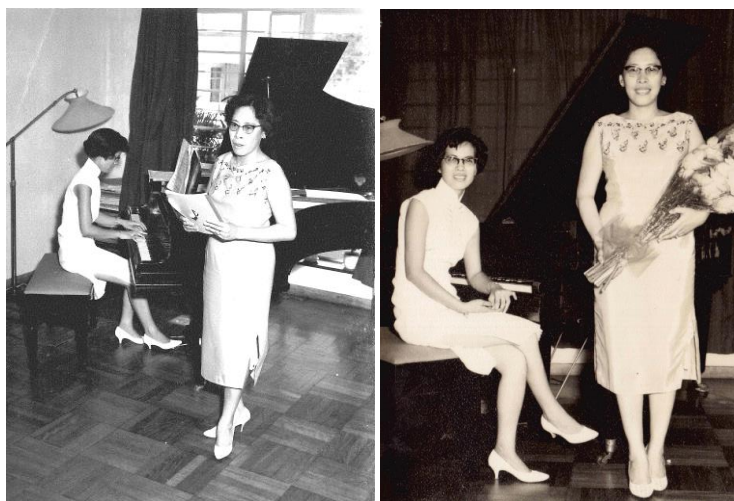


图 6.50: 在家中举行音乐会, 我以女高音独唱英文古典名曲, 钢琴伴奏者是我在循道会的姊妹并且是我多年的好友李瑞芝, 她也是我二名女儿的第一位钢琴老师。



图 6.51: 1959 年弟弟霭东由加拿大回流返港定居与母亲和我团聚; 图中后排左起: 霭东的妻子谭月贞医生、弟弟霭东、侄儿陈志圣、母亲、我与华亮; 前排左起: 大侄女陈基纯、小侄女陈幸纯、敏玲和端玲; 父亲因为长居青衣岛, 深居简出, 故此不在图中。

由于母亲和我仍住在香港, 弟弟霭东与他的妻子谭月贞 (Teresa, 她与霭东是上海医学院的同学) 于 1957 年带着他们在加拿大出生的二名女儿陈基纯 (Elizabeth, 后来她成为加拿大人 Douglas McMillan 的妻子)、陈幸纯 (Vivian, 后来她成为加拿大人 David Haskins 的妻子) 和儿子陈志圣 (Stephen, 1955-1980, 他于 1980 年在欧洲的奥大利旅游时, 因为失足而堕崖丧生) 举家由加拿大出迁回香港居住 (图 6.51), 夫妇二人同时在香港执业医生; 1960 年他们的小儿子陈志远 (Thomas) 出生。他们家住跑马地, 跟我的家相距不远, 因此我们两家人常常一起欢聚, 共享天伦之乐; 我们又在家举行圣诞派对 (图 6.52), 一起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可惜这段甜蜜的日子只维持了数年, 因为精神科医生在香港的发展机会不大的原故, 他们于 1964 年又再度举家返加拿大定居于 Thunder Bay。

差不多每年的圣诞节, 我们都与亲友在家中举行派对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图 6.52), 这些生活点滴如今想起来也令我回味不已, 我们十分享受与亲爱的家人及朋友共渡节日的那些温馨日子; 为了增添圣诞节气氛, 我给每一个参加派对的客人戴上我所购不同样式的圣诞纸帽 (我的母亲与婆婆也不能例外), 我们成年人还跳交际舞呢!



图 6.52: 1958 年在家中举行圣诞派对,前排: 华亮十弟华耀的儿子钟锡勋 (左一)、敏玲 (左二)、华亮四兄的女儿钟伟妍 (左三)、弟弟的次女陈幸纯 (左四)、端玲 (左五)、弟弟的长女陈基纯 (左六)、华亮四兄的长女钟伟婷 (前右二)、女儿的钢琴老师李瑞芝的长子(前右一); 第二排左起: 我 (左一)、母亲 (左二)、弟妇谭月贞医生 (左三)、黄应铭夫人 (左四)、女儿的钢琴老师李瑞芝 (右五)、关炎初夫人 (右四)、黄义华夫人 (右三)、家姑陈咏金 (1891-1980) (右二)、华亮 (右一); 第三排左起: 华亮的十弟麦凤卿 (左一) 循道会的弟兄黄德怀 (左二)、朋友邓羽林 (左三)、循道会的弟兄邝锡堃 (左四)、华亮在皇仁书院的同事黄应铭 (左五)、华亮在皇仁书院的同事黄义华 (左六)、华亮在工专时的上司(商科主任)关炎初 (左七)、弟弟霏东 (右四)、邝锡堃夫人 (右二)、循道会的姊妹黄循真 (右一); 最后一排: 华亮的十弟钟华耀 (右一)。

虽然我与华亮为口奔驰，置身于分秒必争，生活紧张的香港，要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理当感到身心疲累；然而我们明白到圣经所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道理，只有来到天父面前才能得着那份平静安稳。因此星期天是我们一家人的安息日，我们一起到香港湾仔中华循道会去敬拜上帝，并且积极的参与侍奉，因为我深知我应当将神赐给我的恩赐，就是我的歌声回馈给祂；我在教会的诗歌班里面担任诗班长（我用歌声侍奉神至今七十多年，从未间断过），华亮是诗班的顾问，华亮的十弟是该诗班的指挥；后来我们在合一堂的诗班侍奉神（图 6.53）。



图 6.53: (上)我们在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36 号的中华循道会侍奉神, 图中是该教会的诗歌班, 诗班员邝锡堃夫人 (第三排右五)、黄循真 (第四排左一)、黄德怀 (第四排右六); 我是诗班长 (前右三); 华亮的十弟钟华耀是诗班指挥 (前右四); 华亮是诗班的顾问 (前右二); 两名牧师是黄作牧师 (前左四) 及 圣公会牧师何世明 (前左三)。(下) 合一堂诗歌班, 成员 1965 年与我们在香港庆祝我们 20 周年结婚纪念。

1958 年一月, 我在香港政府医务卫生署的职位被提升为高级护士, 并且在 1961 年五月被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 (Sir Robert Black, 就任期 1958-1964) 委派作为期三年一任的香港护士局 (Member of the Nursing Board, Hong Kong) 委员之一 (图 6.54); 我一直都在香港护士局连任, 直到退休为止。又于 1966 年二月被香港总督戴麟趾 (Sir David Trench, 就任期 1964-1971) 委任作为期三年一任的香港助产士管理局 (Board of Midwives, Hong Kong) 之委员, 直到退休为止。

196 飞虎战. 驼峰险. 乱世情

No. GR 5/581/46



COLONIAL SECRETARIAT.
HONG KONG.

27th April, 1961.

Madam,

I am directed to inform you that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has been pleased to appoint you to be a member of the Nursing Board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with effect from 1st May, 1961.

I am, Madam,
Your obedient servant,

(G.C. Hamilton)
Deputy Colonial Secretary



Miss Rebecca Chan,
c/o Tung Wah Eastern Hospital,
Sookunpoo,
Hong Kong.

图 6.54: 1961 年四月廿七日, 由香港政务司署发出的证明文件, 1961 年五月一日我被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 (Sir Robert Black, 就任期 1958-1964) 委派作为期三年一任的香港护士局 (Member of the Nursing Board, Hong Kong) 委员之一。信笺显示港英的徽章⁶⁹。我一直都在香港护士局连任, 直到退休为止。

⁶⁹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at_of_arms_of_Hong_Kong_%281959-1997%29.svg (公共领域)



图 6.55: (上) 东华东院护士学校师生合照; (下) 1962 年东华三院护士学校师生合照; 我坐在前排左八、坐在我左面的是东华东院护士长黄娇艳 (左七)、我的右面是东华三院院长黄呈权医生 (左九); 当我要往澳洲接受训练时, 香港政府派来填补我空缺的护士教师 Margaret Lee (左十, 她是我的同届护士同学)。



图 6.56 (左): 1963 年在澳洲墨尔本市的护士学院 (College of Nursing, Melbourne, Australia) 进修护士教育课程, 我手抱着一只刚出生不久的 Koala 小熊与来自新加坡修读医院行政管理的同学 Susie Cheong 摄于澳洲 Healesville Zoo 动物园。

图 6.57 (右): 在澳洲修毕护士课程(1963-1964)返港, 我身穿毕业袍子摄于广华医院护士学校。

因为香港政府指定由 1964 年四月一日开始, 所有的医院的护士学校必须最少拥有一名资格被认可的护士教师, 故此于 1963 年三月至十二月, 在医务卫生署的批准下, 我被东华三院补送至澳洲墨尔本市的护士学院⁷⁰ (College of Nursing, Melbourne, Australia, 图 6.56 及 6.57) 进修护士教育课程 (Sister Tutor Diploma Course); 一年后顺利获取护士教育文凭 (Diploma in Nursing Education), 当年我是第一位被东华三院派往外地深造而获取护士教育文凭的教师。我在 1963 年十二月学成返港, 正好赶上被东华三院于 1964 年四月一提升为该院护士学校的总教师 (Sister Tutor in Charge, 校长, 图 6.58 及 6.59); 该校的学生人数曾多至六百人, 当年即使在英国也没有一间如此庞大的护士学院呢!

⁷⁰目前被称为皇家澳洲护理学院, 这个学院是为那些希望获得更高学历的护士提供正式的持续教育。



图 6.58 : (上) 在澳洲修毕护士课程的东华三院护士教师; 左起: 伍碧球、我、刘丽卿、李淑芳、张笑儿 (Joyce Cheung, 她是继我之后接任总教师职位的接班人)、黄璇玉。(下) 护士老师的下午茶时间。





图 6.59: 我在护士学校。



图 6.60: 我与其中二届护士学员合照; 当年护士学院每年招收三届学员, 而每一届的人数多达七十人。

要负起领导一个人数如此庞大的护士学校, 责任十分重大 (图 6.59 – 6.64), 为此我曾付出不少努力、劳力和心血; 但是当我看见她们在学习中渐渐成长, 学成后为社群服务, 心里实在感到欣慰。能够有福份去作育英才, 亦是天父的赏赐, 即使今天我退居加拿大, 偶尔还会在公众场合遇到一些当年的学生上前跟我招呼问好呢!



图 6.61: 1974 年教护士毕业生齐集在香港大会堂参加毕业典礼。



图 6.62: 1974 年其中的应届毕业典礼后摄 (每年三届); 我 (前排左八)、黄爱珍(前排左七, 她是总护士长)、广华医院护士长王丽生 (Moyna Wong 前左六)、东华医院护士长张瑞燕 (前左五)、张笑儿 (前左四)、教师宋秀颜 (前右二)、教师容绿叶 (前右一)、教师李玉慈 (前右四)、教师林慕平 (前左一)、教师 Patricia Ng (前右五)、教师林劲梧 (前右三)、教师李淑芳 (前左二)、教师黄璇玉 (前左三)。



图 6.63 (左): 曾与我一起共事 CNAC, 如今又与我共事东华三院的黄爱珍(左)与我(右)于 1974 年在大会堂举行的护士毕业典礼时合照; 黄爱珍已被提升为总护士长。爱珍更是我小女儿端玲的契娘呢! (右): 1966 年五月十六日广华医院的东华周开放日, 我向到访的嘉宾 J.C. McDouall, C.M.G., (英方代表的中国事务官员) 解释护士训练过程。

我在东华三院任职以外, 还为香港护士行业谋福利而作义工呢! 长久以来, 我以义务的性质在香港护士产科士联合会 (简称护产联会, Hong Kong Nurses and Midwives Association) 作其中的一名行政委员, 当中有三年的时间, 我被委任为该会之会长 (图 6.65 及 6.66)° 此机构成立于 1940 年, 并非隶属香港政府, 是一个非牟利机构, 其服务性质是提供帮助给有需要的在职护士及产科士。





图 6.64: (左)广华医院 (九龙窝打老道) - 东华三院集中护理学院的地点。集中护理学院之前我在东华东院 (香港岛铜锣湾) 工作。



图 6.65: 1958 年五月十二日我在每年一度的护产联会护士节庆祝日中致词。

长久以来, 护产联会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在每年五月十二日庆祝国际护士节, 因原籍英国的护士鼻祖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于五月十二日出生; 南丁格尔被举世公认为护士的创办人, 而她自己亦确信成为护士是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的呼召。这一天, 香港所有政府医院的总护士长必定出席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护士界盛事。



图 6.66: 1958 年五月十二日我(会长, 第二排左九)、香港政府总护士长 Schofield(第二排左八, 任于 Everett 之后)、东华三院总院长王鹤年(第二排左七)、东华医院护士长黄惠民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MBE (第二排左六)、东华医院护士长朱颂鸾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MBE (第二排右一)、接生(第二排右五)、香港政府公共卫生导师 Maisy Wong(第二排右六)、赞育医院护士长 Betsy Thom (第三排右七)和东华医院护士教师许宝君(第二排左一)合摄于护产联会的护士节庆祝日。

在护产联会当义工期间, 我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于该会位于港岛铜锣湾区希云街联会自置的物业内为在职护士教授“护士英语”; 主要是因为除了由政府医院(如玛丽医院)以英语受训的护士学员外, 在别的医院(如东华三院)接受训练的护士学员均以中文学习, 故此训练这些学员去认识英文医学名词是必须的。我不但要教导她们, 并且要负起亲自编写课程的责任; 整个课程内容包括普通护士学 (General Nursing)、外科护理 (Surgical Nursing)、内科 (Medical Nursing)、妇科 (Gynecological Nursing)、产科 (Midwifery) 及隔离技术 (Isolation Technique) 等。我为每课书写课程内容笔记; 课程每周举行一次, 每次一小时半,

学费是每人每月十元。最初的时候，学员只有约廿五人，不久即激增至约六十五人。这工作全然是义务性质，我没有从中收取分文，甚至所有的交通费用都是自付的；虽然如此，我也绝对乐意为这些愿意谋求进取的学员效劳；因此联会送给我 [匡扶后进] 的铜牌匾；又为酬谢我无条件的服务，在我的建议底下，护产联会曾用我的名义作为礼物送出一部钢琴放在会址内，以供愿意学习弹奏钢琴的会员以时租的方式租用呢！



图6.67: 在1969年夏天我和其他护士代表香港出席国际护士会议;前排左起: 我、拿打素医院护士长陈咏娴、养和医院护士教务主任黎文芳、葛量洪医院护士长姚瑞棠、接生林洁池 (Kitty Lam) ; 第二排排左起: 养和医院副护士长黄宝婵、养和医院护士长潘婉惠、拿打素医院护士教师刘丽卿 (Maggie Lau) ; 第三排左起: 养和医院护士教师朱秀芬、东华三院护士临床训练导师王丽生、右边是69年的会议标志。

当我在东华三院任护士总教师时，发现护士临床训练的重要性，有见及此，我向东华三院的总院长王鹤年医生建议增添一名护士临床训练导师 Clinical Instructor; 我的建议很快被接纳，于是黄护士 Moyna Wong 被委任为第一位护士临床训练导师，这个新添的职位是在护士长之下。若干年之后，她被提升为广华医院护士长；当医院总护士长黄爱珍退休时，黄护士 Moyna Wong 再被提升，接任成为东华三院的总护士长。

在1969年夏天我代表香港出席四年一度的国际护士会议 (国际护士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主办); 香港第一次派出代表参与; 来自很多不同国家(包括欧洲、美国、非洲、澳洲及东南亚)的至少几千位代表齐集参与当时在加拿大满地可市举行的国际盛事。我是香港护产联会所派出的，东华三院派出护士临床训练导师黄王丽生，葛量洪医院派出护士长姚瑞棠 Sheila Lu (我的同届护士同学)，雅丽氏何妙龄拿打素医院派出护士长陈咏娴 (后来她成为黄

畅豪牧师的妻子), 养和医院派出护士长潘婉惠 Elaine Poon (就任期 1953-1984), 养和医院派出第二名代表护士教务主任黎文芳 Lavinia Lai (就任期 1959-1977)(图6.67)。



图6.68: 护士学校在东华三院慈善卖物会售卖花卉植物; 图中自右至左: 我、李玉慈 (右三)、许宝君 (右五)、林劲梧 (左四)、林慕平 (左二)、宋秀颜 (左一); 摊位后面的大字招牌〔盆栽〕替我们招徕了不少顾客呢!

大概在 1970 年东华三院于广华医院第一次举办一个慈善卖物会, 医院方面要求每一个医院部门及每楼层都负责摆放一个摊位售卖一些物品, 我代表护士学校决定售卖花卉植物; 在卖物会举行之前数月, 我已经开始在医院的户外种植非洲紫罗兰、仙人掌及虎尾草等植物; 我将一片非洲紫罗兰的叶子浸在水中, 当根长出来后, 即把叶子种在盛了土壤的花盆中, 不久美丽的花卉便长出来了; 我以平均每盆约港币十五元的价钱出售, 结果全部售罄, 我们的摊位共筹得港币三千多元呢 (图 6.68)! 香港政府总护士长 K.J. Veevers 及她的秘书张紫明 Lydia Cheung (下一位香港政府总护士长及第一位华人的香港政府总护士长) 均出席此卖物会 (图 6.69)。



图6.69: 香港政府总护士长 K.J. Veevers出席卖物会; 图中自右至左: 我、Veevers、张紫明及 Veevers 的职员。

由于我累积了多年的护士教育经验，澳洲墨尔本的护士学院于 1974 年特别为我颁发了一个院士 (Fellow, 图 6.70) 之名衔。每当我回首前事之时，实在深深地体验到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当年我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的关系而放弃升读大学，本是一个遗憾；感谢神的带领，这个院士名衔是神给我额外的赏赐，虽然这名衔算不得甚么，然而我所珍惜的却是神所赐下的安慰与怜悯。

1975 年六月当我年届五十五，达到香港政府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便正式申请退休，结束了三十七年多姿多采的护士生涯。护士学员为我的荣休在广华医院的护士宿舍饭堂安排了一个令我十分惊喜，简单而隆重的欢送茶会，东华三院的高层人仕包括总理和医生都广泛地出席，出席的人数约二百人；学员唱咏团更唱出当时电影的流行主题曲 [To Sir with Love]，对我爱慕之情洋溢于歌声中，场面十分感人，使我感到有点儿依依不舍；她们又为我准备了一个特大的蛋糕以供大众同享(图 6.71)。



图 6.70: 澳洲墨尔本的护士学院于 1974 年特别为我颁发了一个院士 (F.C.N.A.) 之名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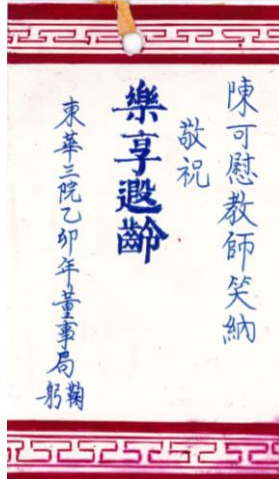


图 6.71: 1975 年荣休, 护士学员为我安排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欢送会。

华亮于 1965–1968 年期间担任香港政府华员会主席(图 6.72), 积极地为所有华籍政府公务员服务, 作为他们与政府的桥梁, 为他们向政府争取合理的权益; 他曾致力并且成功地为女性公务员向政府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又为已婚的女公务员争取享有与男公务员同等的永久雇员制度 (Permanent Employee) 而努力! 此权益对我们女性公务员非常有利, 因为在此以前, 女性公务员在婚后便立即失去永久雇员的资格而成为临时雇员, 她们不但失去应得的退休金, 甚至失去工作; 我认识不少女护士, 为了保存她们的工作而终身不嫁呢! 华亮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香港政府于 1970 年同意分期实施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的制度。



图 6.72: 1968 年香港政府华员会周年会议暨委员就职典礼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我陪伴香港政务司司长罗乐民爵士(Sir Hugh Norman-Walker, 1916-1985, 就任期 1969-1973) 拾级而登, 丈夫华亮(香港政府华员会主席)紧随在后; 当天晚上的聚会节目丰富, 其中的中国功夫及杂技表演令众多的外籍嘉宾叹为观止 (上)° 丈夫华亮颁发奖项(下)°

6.12 回顾事业与家庭

我与华亮于 1945 年七月七日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举行婚礼后仍然留在当地的 CNAC 中航公司工作, 至 1946 年随着 CNAC 移师上海而回返上海继续服务。我与丈夫的感情仍然是以从没间断过每周一信的往来维系着, 直到 1948 年十月

因为中国内战频频，华亮逼切地催促我离开高薪的 CNAC 工作岗位，返回香港与他团聚。

华亮婚后不足二月，于 1945 年八月廿八日别了他的新婚妻子乘坐美国军舰从加尔各答途经欧洲到美国纽约，再转往美国宾州伊斯顿 Easton 市的拉斐特大学 Lafayette College 攻读经济学学士，三年后顺利取得学位；随即再往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攻读硕士。一方面因为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心里实在惦念着妻子，另一方面亦明白到我的年纪也不少，长期的分离而不生育亦非他的本意。权衡轻重后，他决定放弃了只差一个学期便可获取硕士学位的机会，于 1948 年十二月返回香港与我重聚。

回想这段三年多的分离期，有苦也有乐，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是属神的儿女，大家都深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我们猜不透的独特计划，只要跟随祂的脚步就永不走差，所以我们都能够安然地各自按着神的计划生活而毫无怨言。美国的时装十分先进及时髦，华亮知道我喜爱打扮，常常为我寄来令我惊喜的衣物如羊毛颈巾，羊毛绒大衣等，这份甜蜜的感觉把离愁也稍给冲淡了。

我是一个十分蒙神宠爱的人，虽然知道自己没有甚么过人之处，然而祂却使用我在事业上对社会作出一点贡献，当我看到护士学员得到造就，所训练出来的护士不计其数，而其中不乏在护士界里面受到器重的时候，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另外使我感到既荣幸且快慰的就是我能够有机会以护士的身份与飞虎队和 CNAC 并肩参与抗日战争，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

感谢天父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华亮是一个有上进心，负责任及爱主爱家庭的丈夫，我们共同携手渡过六十四年恩爱的婚姻生活，并且一同在教会事奉神；退休后，我们到过不同的地方旅游，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而最令我欣慰的却是二名女儿 (图 6.73 及 6.74) 都敬爱神，努力作荣神益人的工作。大女儿敏玲在 1967 年往英国修读大学预科，然后转往加拿大攻读大学，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取得计算机系学士，在计算机界工作了十年后，蒙主的呼召，离开高薪厚职的计算机工作，再在加拿大安河神学院 (Ontario Theological Seminary)，即现在的天道大学 (Tyndale University)，修读神学，于 1984 年获取神学研究硕士，现在于多伦多华人教会侍奉神，致力于传福音、牧养和教导，使多人蒙福。



图 6.73: (左) 二女儿端玲于 1964 年从英华女学校小学毕业, 大女儿敏玲在左边; 学校由伦敦传道会在 1900 年成立。(中) 二女儿端玲于 1969 年从英华女学校中学毕业。(右) 1947 年至 1967 年学校的校长传教士 Silcocks 在 1967 年退休前, 她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拘禁在赤柱集中营。



图 6.74: 1985 年与两名女儿端玲(左)及敏玲(右)摄于加拿大多伦多家中, 当天是我与华亮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

二女儿端玲则在美国攻读大学, 在 1973 年于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毕业, 获取工程系学士及硕士, 成为该校第一次(四名)的女性毕业生之一。1977 年端玲于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修毕材料科学, 获取博士学位; 现时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担任教授之职, 致力于教育及科学研究, 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之久。



图 6.75: 2011 年六月端玲获西班牙的阿利坎特 Alicante 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图中站在身穿西班牙博士袍子的端玲的左侧是丈夫王兰勤、右侧是阿利坎特大学的校长 Ignacio Jiménez Raneda、最左(P. Garcés) 及最右(L.G. Andión)同是该校的工程教授; 相片摄于颁发仪式之前, 在颁发礼中, 端玲被冠上教授们手捧着的博士帽子。

端玲在国际炭科研上颇有地位, 她于 2004 年获取世界性的炭科研奖 (Pettinos Award), 此奖项每三年选拔一次, 每次选取一人, 她是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她的著作包括五百篇科研论文及八本科学教科书。她又是中国多所大学如同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天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并获西班牙的阿利坎特 Alicante 大学(公立大学, 约有 25000 学生) 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图 6.75, 她是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华人), 更是美国炭素学会及美国材料学会的院士。

弟弟霁东亦不负众望, 在多伦多大学精神科毕业后在加拿大的桑德贝 Thunder Bay 市(在西北安大略省人口最多的直辖市) 执业, 成为有名的专业精神科医生, 并任加拿大精神科局的委员。

我为忠心照顾我们直到我们移民加拿大的常姐感谢神。因为年纪老迈的关系, 她婉拒了我们的邀请, 不愿意与我们一起移民, 因此我们在移民前便已为她安排住进教会开办的 [广荫老人院], 常姐一直安居于此直到 1986 年病逝返回天家。我每次从加拿大回港必定到老人院探望她; 最后一次的探望约在 1985 年, 那时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当我要离去时, 她依依不舍的抓着我的手不肯放下, 因为她知道此别过后, 便要等待日后在天家才能再相见了。

常姐是一个生性善良的老实人, 我的二名女儿都深爱她; 2001 年二女儿端玲特别以她所写的英文教科书 [应用科学材料] 来纪念她所敬爱的常姐。虽然常姐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是一个文盲, 可是却拥有一本世界性的英文书来纪念她哩!

回顾我的一生，最令我敬爱的是一直对我不离不弃，带领我走这条人生路的上帝和养育及带领我认识上帝的母亲；假若不是神在我生命中施行那精美的设计和奇妙的安排，丰富的供应和随时帮助，我绝对不能跨越从战争到和平那段令我刻骨铭心的 [驼峰险，飞虎战，乱世情] 的日子，在此我要将所有的荣耀及颂赞都呈献给我的天父上帝。

第七章: 移民退休加拿大

我与华亮退休后, 在加拿大渡过最后三十五年充满着喜乐, 又极为平静安稳的婚姻生活; 天父十分恩待我们, 祂赐给我们在世得福, 日子长久。我与华亮在这三十五年里面, 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 能够多花时间与亲友相处实在是美妙不过的事情, 虽然他们一个一个的相继去世, 但我仍然十分享受和珍惜每段与他们相处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段安静的日子使我有更多时间去亲近神及研读祂的话语 - 圣经; 如今我已作好准备随时去迎见那爱我的神!

- 7.1 移民加拿大
- 7.2 母亲病逝
- 7.3 退休生活
- 7.4 旅游
- 7.5 弟弟霸东病逝
- 7.6 阔别近五十年的逃难伙伴柯德富
- 7.7 结婚六十周年钻婚纪念
- 7.8 华亮病逝
- 7.9 九十岁生日
- 7.10 后思

7.1 移民加拿大

我与华亮的婚姻 (1945-2009) 在我生命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 这六十四年当中包括 (1)三年半的新婚分离期 (他在美国而我则身处印度及上海) (1945-1948); (2) 廿五年在香港的兴家立业期 (1948-1974) 和 (3) 三十五年在加拿大的移民退休期 (1974-2009)。

虽然我们夫妇二人的生活都是简朴节俭，然而对女儿们在教育上的栽培却是慷慨的；大女儿敏玲于 1967 年往英国留学大学预科二年，1969 年往加拿大攻读大学三年；二女儿端玲于 1970 年往美国留学，所需的费用不菲，我们一直都是量入为出的情况下让女儿们完成她们的学业。

我们决定在退休后移民，都是因为两名可爱孝顺的女儿都身在美加，于是我们于 1974 年华亮退休二年后正式移民加国，移民后我仍须返回香港东华三院工作，直到 1975 年七月正式退休才与母亲一同移居加拿大(图 7.1 及 7.2)。



在陳教師快要高 遷之前，雖然我們
 曾斤量的爭執時間和她相擊，但遺憾的是
 我們最後使日子這般時光倒流，在一個
 雨紛紛的六月早晨，我們終於分別了。
 萬情到意，在任何情況下，真是感
 帶長兒傷感，何況「人，本來就是感情的動物。
 是所兒，陳教師曾與我們相處了一段不
 算短的歲月，但從來沒有「別離」又怎能
 視「相擊」的可愛呢！

在臨別這天，竟不至潸然淚下，但
 卻都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到機場送到。
 去年我們曾送到陳教師，今天又送到她。
 一样的离情，不同的意義，第一次是她送遊

這回是地處和定居。
 是日在機場中只見陳教師穿掛在孔璋
 環的人群中，被錫在包圍着，握手，拍照，
 說聲珍重再見，當時只有忙亂，不覺有傷感。
 在播音器播出發諸塔塔上机的广播中，
 我們含着的說「陳教師再見，伯母再見，祝忘向
 張連年百愉快，更讓我們為您美好的將來
 共念念府壽以至於最誠的祝福。
 再見是再再相見的意義，深信日後我們
 是會再相見的。

黃璇玉寫於送航旋
 一九七五年六月廿九日

图 7.1: 1975 年六月，我与华亮移民加国，母亲与众亲友送行，图片摄于香港启德机场；图中前排右起：华亮四嫂抱着孙子何泽诚（右一）、黄爱珍（右二）、家姑陈咏金（1891-1980）（右三）、我（右四）、母亲（左三）、护士同事伍碧球（左二）、中华循道会姊妹黄慕珍（左一）；后排左起：华亮四兄的大女婿何世坤医生（左一）、四兄长女钟伟婷（左二）、四兄钟华超（左三）、我多年的好友中华循道会姊妹黄循真（左四；她是黄慕珍之姊）。（右）同事黄璇玉(图 6.58) 所写的告别感言。



图 7.2⁷¹: 加拿大多伦多之夜景, 右面两座拱圆型的建筑物是大多市的大会堂。

7.2 母亲病逝

母亲移民后到安河北部的小城市 Thunder Bay (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市政府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又是安大略省北部人口第二稠密的城市) 与弟弟霸东同住, 我与华亮则与大女儿住在多伦多。可能因为不习惯长途跋涉地飞行的关系, 母亲抵加拿大二个月后突然中风。我与弟弟商议过后, 决定把母亲搬到多伦多来, 好使我能专心照顾她。我悉心看顾母亲四年多, 直到她八十九岁, 于 1979 年九月廿日离世返天家。母亲一生事主爱人, 为我树立了跟随神而活的榜样, 她对我的恩情实在无可计算, 我对她的离去虽感不舍却是释然, 因为深知我们将来必定在天家重聚。1993 年二女儿端玲以她所写的第一本书 [炭铁纤维复合材料] 来纪念她挚爱的外祖母; 书中刊登了外祖母抱着她还作婴儿时的照片; 此书在世界各地都颇为畅销。

7.3 退休生活

1974 年我正式移民加拿大后, 定居多伦多; 开始享受那份平静安稳的退休生活; 喜爱歌唱的我, 闲暇之时在家中唱诗敬拜上帝, 实在是至高无尚的享受 (图 7.3)。我们首先参加长女敏玲所属位于多伦多市中心 Beverley 街的教会长老会聚会; 我与华亮随即投入事奉, 参予唱诗歌班、探访和关顾的工作 (每周最少探访及关顾会友二次)。不久教会计划向北区扩展, 他们差派敏玲往北面士嘉堡区, 向西

⁷¹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oronto_city_hall_hdr.jpg (许可)

人教会 Knox 长老会借用他们的堂址，开始成立了一个北区长老会支堂，我与华亮亦顺理成章的跟随敏玲在新堂聚会，崇拜及事奉；其后教会为建堂筹募基金，当时母亲刚去世，我把母亲五百多元的帛金全部奉献出来，这是我们为教会建堂而奉献的开始。

1989 年敏玲为上帝呼召，与蒋应时弟兄开始创立颂主播道会，我们夫妇二人又再随着敏玲转往颂主播道会敬拜及开始对长者事奉的工作。



图 7.3: 闲暇之时在家中 (Lindhurst Drive, Thornhill) 唱诗赞美神，来自美国的次女端玲为我以钢琴伴奏。

1993 年三月，敏玲与她的好友郑静芬 (Rita Chang, 1949-2005) 对于基层人仕如餐馆工人和车衣工人等因为工作不定时而未能参加教会的敬拜而心里忐忑不安，她们二人心里对这群被遗忘的人有着极大的负担，经过多方祷告求问神，二人决定为这群失丧的羊群将自己摆上，创立“多城播道会”(Metro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图 7.4 及 7.5)，在星期天的早上和晚上均举行崇拜，好使工作不定时的工人也能有机会敬拜上帝；我与华亮对她们那忘我的服侍精神也深受感动。

我们夫妇二人除了到敏玲的多城播道会聚会外，与此同时，我们亦活跃于多间华人教会；我们到华亮十弟华耀所属的多伦多中华联合教会参与诗歌班侍奉直至我八十岁；我又在北约浸信会带领诗歌及查考圣经；在多伦多中华循道会参加勉励团契 (即长者团契)；又在麦成长老会参加基谊团契，并且多次在以上的团契中

分享见证；我又于十年前参与及开办于现居处每月二次在星期四由敏玲带领的大厦查经班，由十年来风雨不改的查考圣经，使我对神的话语认识更深。

多伦多及尼加拉瓜大瀑布是游客的据点，再加上很多我的亲友也自香港移居多伦多，因此我常有亲友到访 (图 7.6)，绝对不愁寂寞呢！



图 7.4: (上) 1993 年由长女敏玲 (最前排左四) 及郑静芬 (1949-2005, 第二排左二) 成立的多城播道会全体弟兄姊妹合照；我站在郑静芬的旁边 (左三)。(下) 圣经学习班 (2005 年左右), 由敏玲领, 是我们一家人在士嘉堡的公寓大楼开始的。



图 7.5: 与忘年之交伍黄奕冰 (此书之笔录者) 摄于在市中心区举行的 [反对同性恋] 大游行后合摄; 我们身上所穿的 T-恤印有一男一女的图像, 象征着婚姻应是上帝所订的一男一女制。



图 7.6: 与亲友游览尼加拉瓜大瀑布; 图中左起: 华亮、我、来自温哥华的表妹周妙慈 (1928-) 和来自香港的表弟周耀雄 (1926-) 之妻子丽娴 (1934-)。

7.4 旅游

华亮与我都十分热衷于旅游, 藉此我们可以饱览各地的风土人情, 又可以欣赏上帝那奇妙的创造; 虽然此举所费不菲, 却是物有所值。我们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 所到的每一处也有不同的领受, 一切都是神所赐予, 是祂的恩典。

7.4.1 安大略省渥太华市



图 7.7: 加拿大渥太华市的河。



图 7.8: 1983 年加拿大渥太华市探望亲友, 图中左起: 端玲家姑王何佩琼 (左一, 1917-2005, 来自美国匹兹堡市)、弟弟霏东二女儿陈幸纯的长女 Tracy Haskins (左二)、我手中抱着刚出生不久幸纯的三女 Tiffany Haskins (左三)、弟弟谭月贞 (1922-2011)、端玲(左五)、端玲丈夫王兰勤 (右五)、华亮姊姊的二媳妇吴仲侃夫人 Loretta (右四)、弟弟的二女婿 David Haskins (右三)、弟弟次女幸纯 (右一) 与幸纯的儿子 Steven Haskins (右二, 穿着超人服装)。

7.4.2 埃布尔达省班夫市



图 7.9 (左): 埃布尔达省班夫市国家公园里面的 Louise 湖显示冰山的反射。

图 7.10 (右): 游览埃布尔达省班夫市的洛基山脉。

7.4.3 美国得克萨斯州侯斯顿市和拉斯维加斯附近的火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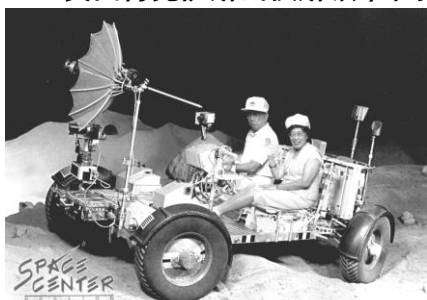


图 7.11: (左) 美国得克萨斯州侯斯顿的太空馆; (右) 1993 年拉斯维加斯附近的火谷。

7.4.4 美国宾夕泛尼亚州



图 7.12 (左): 我与华亮及端玲游览美国宾夕泛尼亚州的州立山水果园, 这里的风景十分美丽, 图中右上角和下角是一道天然的瀑布河流。

图 7.13 (右): 我与端玲往探望华亮的母校, 美国宾州 Easton 市的 Lafayette College, (这是华亮在过去三十年来首次到访) 与华亮的教授兼好友 Professor J.H. Tarbell 合摄, 图左起: 端玲、我、Tarbell 教授与华亮。

7.4.5 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悉尼



图 7.14: (上) 与华亮于 1993 年游览墨西哥 Cancun 市, 我们在位于 Chichen Itza 像金字塔形状的古迹前合照。(下) 与华亮于 1988 年游览澳大利亚的悉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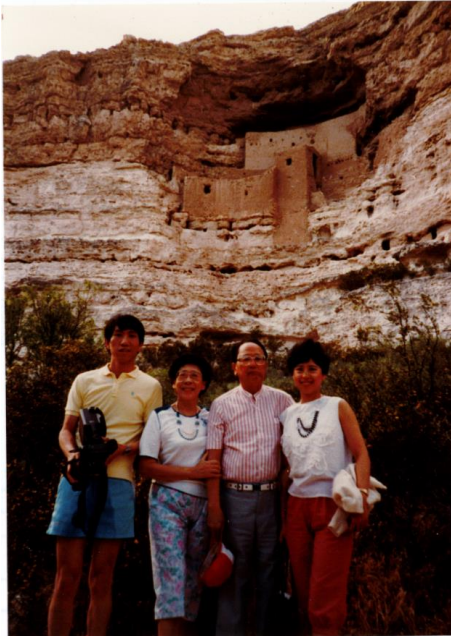


图 7.15: (左) 1986 年与华亮, 女儿端玲及女婿兰勤到墨西哥的 Puerto Vallarta 游览, 屋子建在山顶上, 图中小方格是屋子的小窗; 兰勤手中拿着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录机 (比现今的录象机大多了)。(右)⁷²坎昆 (Cancun) 广泛的沙滩于 1970 年。

⁷²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ancun1970.jpg> (公共领域)

7.4.6 中国和香港



图 7.16: 1980 年左右在香港 (左); 与端玲于 2002 年游览上海, 这里是位于黄埔江的 [东方明珠]塔的上层 (右)。

7.4.7 坐游轮足迹遍及全球

华亮与我对旅游情有独钟, 我们每年最少也会外出旅游一次; 只是我们年纪已渐老, 再也没有精神和体力去应付长途跋涉的飞行, 因此我们爱上乘坐游轮(图 7.17), 以优闲的心情去享受旅游的乐趣。我们乘坐游轮旅游十多次, 足迹遍及全球五大洲。我常常为此感谢神, 祂使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去欣赏祂那奇妙的创造。



图 7.17⁷³: 巡航加勒比。

⁷³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ribbean_Princess.jpg (许可)



图 7.18: 游轮自助餐桌上的龙虾山及其他美食。

7.5 弟弟霭东病逝



图 7.19: 与弟弟霭东于 1984 年游览当年唐朝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 我们站在[华清池]内合照。

弟弟霭东约于 1990 年退休, 他结束了医生的工作, 从 Thunder Bay 搬到多伦多来; 可惜他于 1994 年因为肺癌的关系与世长辞, 当年他七十一岁。这短短四年的相处使我们重拾儿时的欢乐, 我们曾数度到中国及其他国家旅游(图 7.19), 一同见证造物主的伟大。在他患病的一年里面, 我尽力在精神上及灵性上支持他; 我和女儿敏玲都是风雨无间地每周到他家中查考圣经, 致使他对神的信心增加, 并确信自己有永生的盼望。在离世前的三星期他在我的家中晚膳时, 他当着他的家人面前道出一番对我感谢的话, 特别是当年他在中国及加拿大习医的那段日子, 最后他含着泪说: [能够拥有一位这么爱我的姐姐亦不枉此生了。] 在他离世的那一天, 我赶往医院探望他, 跟他话别时, 他抓着我的手良久也不愿放下呢!

7.6 阔别近五十年的逃难伙伴柯德富

约在 1997, 我与华亮在多伦多联合教会的主日崇拜遇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柯德富(他是在战时与我一起逃难的八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2.5 部分) 和他那瞎了眼睛的妻子梁女士(图 7.20); 我们一别五十年再重见, 大家都感到兴奋莫名, 互相问好之余, 还滔滔不绝的诉说那说不尽的前陈往事。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夫妇二人在温哥华居住, 因此在 2000 年五月我与华亮乘飞机到爱民顿 (Edmonton) 参加黄爱珍的八十岁寿宴途经温哥华时, 便顺道探望他们; 柯夫人表示她很希望丈夫能够早日信耶稣, 并且要求我为此事祷告。自那时开始, 我一直都是没有间断地为此事祈祷; 九年后, 在 2009 年华亮的丧礼中, 透过柯夫人的妹妹梁国华 (她与我同属多伦多联合教会), 得知德富终于信了耶稣, 并且在香港接受水礼。我为此感谢神, 祂怜悯了德富, 又应允了我那长达九年的祷告。



图 7.20: 2000 年在温哥华喜逢柯德富夫妇; 图中自左至右: 华亮、我、柯夫人、柯德富。

7.7 结婚纪念

我与华亮都十分重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们同时认为这日子比我们的生辰更值得庆祝,因为这象征着我们开始携手同走人生路;故此我们每隔五年即会为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大肆庆祝一番(图 7.21)。





图 7.21: 1970 年与华亮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在香港设宴款待亲友 (上左); 1985 年与华亮结婚四十周年纪念, 在多伦多设宴款待亲友(上右); 1995 年与华亮结婚五十周年纪念, 在多伦多设宴款待亲友 (中)。1985 年和 1995 年在多伦多设宴款待亲友 (下)。





图 7.22: 2005 年与华亮结婚六十周年纪念, 在多伦多设宴款待亲友。(上) 与我的女儿和女婿; (下) 与我弟弟的家人, 在我的左边是我弟弟的遗孀谭月贞 (1922-2011), 在她的后面是她的长女陈基纯 (Mrs. Douglas McMillan), 我丈夫的后面是她的二女陈幸纯 (Mrs. David Haskins), 我女婿(最左边)的后面是她的小儿子陈志远。

2005 年七月九日, 我与华亮在多伦多设宴庆祝我们结婚六十周年钻婚纪念, 席间我们在约 200 名亲友及林树生牧师面前再度重申结婚时的诺言 (图 7.22); 在 2008 年七月七日我们最后的结婚周年纪念, 华亮把他所作的短诗 [爱思] 送给我, 表示他对我的爱意由始至终从不减退。有夫爱我若此, 实在是我的福气, 我不禁又再感谢神赐下这段蒙福的婚姻。

爱思

钻婚爱筵忆犹新
琴瑟嘹亮辅真心
同步同心为主活
百年阶老颂神恩

众多亲友为我们的钻婚送上诗句作纪念 (图 7.23- 7.26); 因为我们都是加拿大公民之故, 英国女王依利沙伯二世也发出文献向我们祝贺 (图 7.27)。

鍾姻伯 - 伯母鑽婚志慶

華堂喜樂勝新婚
 克鑽恩情堅逾金
 可頌山盟如昨夜
 慰懷共祀雅歌吟

祝
 蘭樞 - 慕蓮賀

图 7.23: 这是端玲丈夫的八兄王兰枢博士为祝贺我们钻婚纪念所写的诗词。

陳鍾
可靜
魁亮
並
以
詩
誌
慶

欣逢鑽婚樂融
 水乳交融主愛中
 同諧白首依舊
 舉案齊眉笑春風

謹
具
菲
儀
奉
申
之
喜

 林逸樞夫
婦敬賀

图 7.24: 多伦多中华循道会的弟兄林逸樞夫妇为祝贺我们钻婚纪念所写的诗词。

時讚詩和浪
 萬家頌主恩
 閃年往風和
 星經記平安
 燈點曾得鑽
 華星可慰鑽
 慶邀朋親共
 證斯

图 7.25: 中华基督教麦恒长老会弟兄余其立先生以此诗祝贺我们六十年钻婚纪念。

A lifelong marriage is a rarity indeed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a total absence of greed
 How these two special people came to be
 and have their love last for an eternity

It must have been arranged by God right from the start
 For it appears they are never apart
 Except for a time soon after their vows
 Their frequent letters kept their bond somehow

They credit God as the key to their success
 The Holy One has given them much more and never less
 Many lessons can be learnt from these two
 Especially when one of them is feeling blue
 The other is there for full support
 Is it any wonder they were meant for the marriage court?
 It is an incredible feat they have made it to their diamond years

*By this time, there are no more fears
Their pure feelings of happiness and joy
Not unlike a proud mother cuddling her new baby boy*

*Is that the key to a successful marriage and a prosperous life?
Or only the formula for a happy husband and a wife
Does it really matter how or why?
As you know that their love will never die.*

图 7.26: 弟弟霸东的四儿子陈志远以英文书写了一首诗向我们祝贺结婚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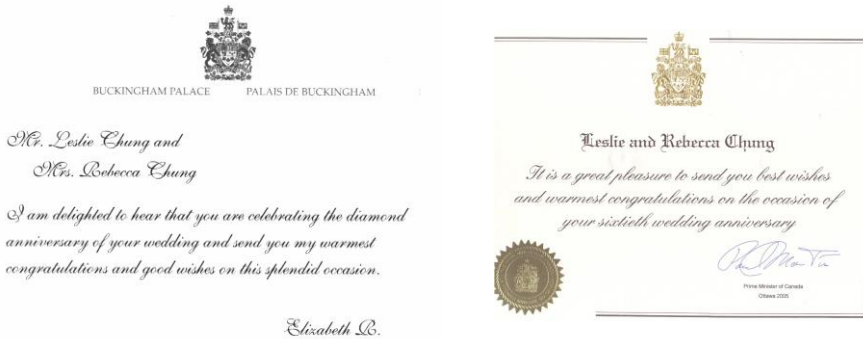


图 7.27: 由英国皇室发出以英女皇依利沙伯二世⁷⁴署名的贺词, 和来自加拿大总理的贺词, 以恭贺我们六十周年结婚纪念。

7.8 华亮病逝

华亮于 2007 年九月三十日庆祝他的的九十岁寿辰 (图 7.28)。2008 年十二月圣诞节之前, 华亮自知在世的的日子无多, 坚持与我一起到商场去, 亲自为我挑选了价值数百加元的衣服作为他在世上送给我最后的一件圣诞礼物。

**華亮松青天地歲,
可魁鶴立古今天。
壽比仙翁花甲茂,
南山神明五百年。**

图 7.28: 中国吴杰先生以此诗祝贺华亮于 2007 年九月三十日的九十岁寿辰。

华亮于 2008 年开始发觉自己的心力衰退, 于 2009 年六月十九日九十一岁之年病逝多伦多慈恩医院。在患病的一年里面, 他曾数度进出医院; 当他在家中养病

⁷⁴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lizabeth_II_greets_NASA_GSFC_employees,_May_8,_2007_e dit.jpg (公共领域)

的时候,我自然是日以继夜竭尽心力地照顾他,可是当他在医院卧病在床的时候,我只能够在日间整天在医院里陪伴及照顾他,到了晚上就由我的女儿及教会的姊妹们轮值彻夜看顾。天父的恩典是够用的,每次华亮入院,教会的姊妹们都自动编排时间轮流照顾他,不但如此,她们还把各样食物送来,又动员全教会为华亮祷告;我对她们爱心的服侍及其家人的谅解心存感激,愿天父亲自纪念她们的劳苦。

其实华亮的心脏早在 2006 年已开始出现问题,对此他一直处之泰然,深知生命在神手中;反倒在这段患病的日子写下不少感恩及赞美神的短诗;2008 年十二月廿三日,他写了以下之七言诗 [神是爱] 来感谢神对他慈爱的看顾。此诗所题到的 [七省吾身] 有别于中国文学的 [三省吾身],这是因为圣经中的数目 [七] 是完全的意思,是一个无尽的数目。华亮又在 2009 年四月三十日写下最感人的一首诗 [梦幻人生]。这首诗是他去世前两个月从心里向神发出的自我剖白。此诗是华亮去世后,当我收拾他的书桌时找到的;他没有与我一起分享这首流泪诗,但我读后感到十分安慰,因为我确知他在生前已清楚地向神认罪,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子。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对即将离世朝见神作好准备。端玲于中国演讲时与会众分享 [梦幻人生] 这首诗,令多人受感动,更积极地反思人生的意义。

神是爱
疾病突发神手伸
主阶我行身心新
七省吾身求恩宥
父神爱我我爱神

梦幻人生
梦幻人生梦中过
功名利禄枉一生
仰望至高三一圣
涕泪交流羞见神

华亮在患病的日子亦写了以下的英文诗[走路,因夜晚快来]“Wal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二女儿端玲经常在欧美演讲时分享此英文诗(此诗已被翻译成西班牙文),令多人受感动。

WAL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Life is A WALK of ups and downs;
Wealth, fame and power are clowns.
But my faith in my dear Lord
Brave and strong maketh me.
When I lay low in hospital,
His healing hands touched me.
He helped me out of sick bed,
Nurtured my hope, joy and peace.*

*Wal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Walk hand in hand with God.
I raise my head and look yonder
There is the promised land.
All my life is His design;
I tightly hold His hand.
My purpose of life is one:
To walk with my Lord.*

7.9 九十岁生日

在 2010 年六月廿六日，二名侍母至孝的女儿为我设宴庆祝我九十岁生日，款待亲友 (图 7.30); 二女儿端玲更以她在同年四月份刚出版的英文教科书 [工能材料] 来为我祝贺; 书中刊登了我的照片, 这可说是一个公开及世界性的 [生日卡] 哩! 为此我亦写了一篇短诗: [年华九十] 以表示将要如何善用我的余生 (图 7.31, 7.32)。当天我更在百多名亲友面前述说神如何在我一生赐下恩典无数。

年华九十
年华九十心仍新
追求圣洁导我行
谨遵神意历余生
快传浩恩达万民

以下是我仿照圣经里面 [诗篇] 的形式所写的一首赞美神的诗

经历与感叹
天天经历神无比大爱 - 甘甜的响往
时刻享受神膀臂紧抱着我 - 安全又温馨
不住的祷告与神同工叫万民得永生 - 事奉的喜乐
期待与神永远同住的日子 - 好得无比



图 7.30: 九十岁生日



图 7.31: 在 90 岁左右的时候, 我在多伦多中华循道会唱诗班。



图 7.32: 2010 年 12 月庆祝圣诞节(左); 2011 年 2 月庆祝中国新年(右)。

7.10 后思

自 1974 年从香港移民至加拿大不觉已三十七年了; 最初的时候, 我们住在北约克区的一所单层的独立屋子 (18 Park Glen Drive, North York) 里, 十二年后, 我们迁往面积较大 (约三千七百五十呎), 位于康山区的独立房子 (117 Lynhurst Drive, Thornhill) 里去。犹记得当时女儿敏玲说: [我们三人又何须占用那么大的房子呢? 不过, 若然我们愿意开放屋子为神所用, 那么我倒是绝对同意的!] 现在回想起来, 这房子的确曾多次为神所用, 我们在那里举办查经班、团契聚会、圣诞节、新年及复活节聚餐; 又不时招待到访加拿大的牧师及亲友 (有一次我们接待了陈伯辉牧师一家五口在此居住了一星期之久); 还有一些在此地没有亲人的学生及患病的孤单教友, 都是我们招待及服侍的对象。这些一点一滴的往事都带给我很多甜蜜的回忆; 真的, 我们在服侍里面享受其中的乐趣, 这份喜乐的心情又非笔墨所能够形容的。

在 Lynhurst Drive 住了十二年后, 我们深觉自己年事已高, 再没有能力去打理这么大的屋子, 于是于 1997 年我们又再举家迁到现址位于士嘉堡区的栢文大

厦 (168 Bonis Ave, Scarborough)° 我们曾打趣地对亲友说：[这将会是我们在地上最后一次的搬迁，若是要再搬的话，就是搬到天家去。] 果然外子华亮就在 2009 年返回天家。至于我自己，则早已作好了准备，随时顺应神的召唤迁回天家，与神永远同在，那将会是好得无比的。主耶稣在地上临别在实时曾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哈利路亚，赞美主！

最后我以 2009 年六月廿三日在华亮的安息礼拜中的谢词去答谢父神及所有的亲友：

首先我要感谢的就是那创造万物，自有永有，三位一体，永活的真神；祂为我们一家人赐下数算不尽的恩典，更使我们一家人有永生的确据及盼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甚么善行；我们本是罪人，只因神的怜悯，借着祂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应得的刑罚，叫一切信祂名的人，罪得赦免，并且得享永生。华亮深知道他离世后将会与主同住，直到永远，实在是好得无比；假若他不脱下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又怎能够穿上那不朽坏荣耀的身体呢！他明白到人生如客旅，总有一天要退房 (check out) 的，天上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所以如今华亮只是离开那寄居的酒店，进入神为他预备那永存的房屋，感谢主！

华亮在病榻中实实在在地经历到神的同在，他曾表示基督耶稣牵着他的手与他同行，故此他感到非常欢喜快乐，心里满有平安。在他临终之时，敏玲与我一直陪伴在侧，我们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不断的唱诗赞美主，向他道别，我们还相约在天堂的生命树下相见；于是他就安详地在半小时之内进入了神的安息，感谢主！

自 2008 年十二月至 2009 年六月华亮患病期间，他曾数度进出医院，其间众多主内的弟兄姊妹不断为他祷告，到医院探望，烹煮食物以供他享用，又为看顾他而彻夜在医院轮值守候，我在此衷心献上感谢，愿父神亲自记念他们的劳苦。

最后我要再一次感谢神赐下那满有安慰和鼓励的话语；圣经说：[你们不要忧愁，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我相信那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是大有指望的，因为有永生的确据。如今我要欢欢喜喜的为主而活，竭力作成主交托的事，好好的珍惜余下的日子，好叫我能做到「活着就是基督」，感谢主！

后记一: 我爸爸妈妈的乱世情 (钟敏玲 - 钟陈可慰的长女)

我的爸爸钟华亮和我的妈妈陈可慰是个性很不同的两个人。爸爸性格内向，喜读书、看报纸、作研究和分析。他可以整天躲在房间里，对着他的计算机，关心他的世界大事。而妈妈嘛，她性格外向，爱热闹，善交友，可以整天在街上跑，也不觉倦。两人相处，婚姻维系了六十四年少了十八天，是否奇哉？

有人以为妈妈必然在爸爸未受战伤之前认识他，所以肯嫁给一个既破相又前途未卜的退役军人。谁知道妈妈是被爸爸的真诚所动，况且推断，除了自己，还有谁愿意把一生付托这个落难英雄？就是出于一份来自上帝的爱心、善心、信心、慈心，就嫁了给爸爸。她相信自己的直觉，爸爸却相信自己的分析。从不同的方向，他们达到同一的终点。

爸爸小时参加的教会，是香港合一堂，而妈妈的教会背景，是湾仔循道会。战后，爸爸从美国毕业回港后，他俩要以那一间教会为家？我记得小时我去的是循道会，但爸爸却没有去。年纪长大一点儿后，去的是合一堂，是一家人一块儿去的；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现在猜想，可能是妈妈作出了爱心、善心、信心、慈心的谦让；毕竟一个性格外向的人，到那里都可以交到朋友。在合一堂，两人都有事奉的岗位，或作“值理”，或唱诗歌班，妈妈还教主日学，其中有两年还作过我的老师呢！互相包容、迁就，是我从父母亲的榜样中领悟的道理。

妈妈性格上的活泼、好奇、爱热闹，爸爸也迎合了。俩人于退休后，多次出外旅游，或陆路去，或乘坐游轮经水路去，每次都与一群要好的友人同行。妈妈爱拍照片，爸爸也乐于奉陪；妈妈爱购物，爸爸也从旁鼓励。有时候，爸爸要独处歇息，就安坐一旁等候妈妈“探险”回来。若不是出于主里的爱与包容，岂会相处得如此美好？妈妈肯定是爸爸一生的至爱，而爸爸肯定是妈妈下半生的至爱。

在2008年十二月起，爸爸的心脏病、肾病、哮喘病日趋严重了，经常要看多位医生和接受多类的检验。看妈妈忠心耿耿的侍候在侧，或吃合宜的营养餐，或一天四次的吃药，或记录病情的转变，保姆与护士兼职一身，她当时已经八十八岁了！毫无怨言，甘心乐意，坚忍顺服，是女中豪杰，是人中强者，是经中贤妇，是神的忠仆，是我的榜样，是留给世人的见证。

在 2009 年六月十九日爸爸离世归天之时，妈妈和我守候榻前。爸爸眼目紧紧盯着妈妈，示意要她就近他的面前，我也俯就他的耳旁，对他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妈妈，生命树下再见！”临走的时候，爸爸最关心的，仍是他的至爱，与他共度人生甜苦差不多六十四年的妻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 13:8 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 11:25 下）。这就是我与爸爸相约于生命树下再见的原因。不单是他，还有我许多亲爱的，主里的弟兄姊妹。最后，读者们，我也希望能与你们在生命树下见。

钟敏玲

写于 2011 年七月二十五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贵湖市

后记二：‘妈妈，谢谢您’

(钟敏玲 - 钟陈可慰的长女)

想起母亲钟陈可慰 (1920-2011)，就想到她是爱，信，望的活现。

妈妈是爱的活现，符合了哥林多前书 13:4-8 上的描述：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文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在她与父母，弟弟霏东，丈夫华亮，她的朋友，同事，和女儿们的关系中，完全显明了以上说的爱的精义。她帮助供应弟弟，表妹，丈夫，及爸爸的侄孙读大学的费用，甚至在艰难的日子，做三份工也在所不计。她从不期盼有什么回报。她给与的多于她受益的，正因她的神是一位慷慨的神。她的品格，可以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总结，尤其是仁爱，喜乐，和平。

当我们追溯母亲爱心的根源，就不惊奇原来她一向是一位对神大有信心的妇女。她常用的经文，以弗所书 2:8-10 如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正因为她看她所有的一切为神的赏赐, 而她只是位不配的受益人. 甚至她的信心与拯救都是神的礼物. 她没有做什么来赢取神的恩典. 因此, 神对她的呼召就是行善, 去使身边的人得着益处. 她的一生就是回应这个召命. 神的恩典白白接受了, 神的恩典也白白透过神的儿女申延去其他的人身上。

妈妈是盼望的活现, 符合了哥林多后书 4:16-18 的描述:

所以, 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身为一位护士, 她近距离看见死亡. 她陪伴她的父母走从生病至死亡的最后路程. 最后, 在 2009 年, 她陪伴她的丈夫在病榻旁边. 在 2011 年十一月九日, 医生诊断妈妈患上胰脏癌, 已扩散了至肝脏. 但她仍然注目于复活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天上永恒的荣耀. 她是在平安和信靠神的心境中. 她充分地活出了圣经所说的基督徒的盼望之精粹。

我写以上的文字是在妈妈过身之前, 2011 年十二月七日之前写的. 我当天在她病床边, 目送她在上午 7 时被主接去. 我们一起祷告求主接收她的灵魂. 5 分钟之内, 神就把她带走了. 她已经得着她的赏赐。

钟敏玲

2011 年十二月十一日

于‘飞虎战, 驼峰险, 乱世情’新书介绍会中之分享



钟敏玲(左); 钟端玲与纽约州 Albany 市的华人社区谈论这本书 (2015) (右)。

后记三: 记怀钟陈可慰姻伯母

(王兰枢 - 女婿的八兄)

怕听骊歌别唱，怕见骨肉殊途，奈何人生偏有离别恨，忍教儿女哭断肝肠。问谁无骨肉之亲？谁无母女之情？当此大别，能不怆然！

哀悼中倍念神恩典浩大，其爱借父母向人延伸，缅怀钟伯母走过人生路上滴下脂油，成就多少后人满径花香烂漫。忝为晚辈，既蒙恩泽，岂容缄默，闭口不言，致前贤湮没、主道不彰。

传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观乎伯母，活出基督样式，敬虔渡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于社会、于教会、于家庭，树立典范，此所以立德也。战乱之时，驰骋于两军对垒之中，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下，救伤扶危。太平之世，穿梭于病房之内，辛劳于伤患之间，恤苦怜孤，此所以立功也。作育护士，教女成材，晚年缕述飞虎战、驼峰险、乱世情，此所以立言也。伯母于优美人生乐章中放下休止符，此非终结、此非未了，实仍更精采之开始，因在天上得胜凯歌初奏、有荣耀冠冕存留。特此为记。

姻姪兰枢敬挽

后记四: 追忆陈可慰教师

(罗邓卿意 - 广华医院前一级护士长)

1959年初我在广华医院护士毕业,其后一直在广华医院服务.直至退休。在我记忆中,每当与陈教师偶遇招呼她时,一定得到温文有礼的回应,笑容满面,亲切感人。我相信不熟悉陈教师的任何人,在未读过她的回忆录时,谁会估到她竟然是女中豪杰,青春年少,有勇有谋,有胆识,有冲劲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有爱心,责任心,谦虚,乐观都是她的优点;且忠于她的信仰,跟随圣经的指引及她自己的识辨能力,自强不息的精神,且默默付出服务他人,又支持后辈,完成了她有情有义,完满精彩的一生。

香港沦陷时我只有八岁,但记得每当入夜,日本人就带很多狗出来巡视,咬死很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人;每夜都听到很多惨叫声。翌日就听到长辈说咬死多少人,非常惨无人道!我曾听到长辈说逃难的艰苦处,但没有书中这样详尽中肯,尤其图片中尸横遍地,使我不禁深呼吸,内心很酸,很酸!战事真可怕,平民最受苦!

书的内容,使人惊奇,佩服,感动,且有励志作用。陈教师有意义的人生会成为后来人们的追求方向,她的诸多优点会成为后来者学习的榜样。东华三院上下人等都会以陈教师曾为我们中的一员为荣。永远,永远纪念她!

罗邓卿意

广华医院前一级护士长

2012年二月十三日写于加拿大多伦多治文山

后记五: 从战争到和平--忆钟陈可慰女士

(钟敏玲、钟端玲、伍黄奕冰)

钟陈可慰女士(1920 - 2011)出生自敬虔爱主的基督世家。外曾祖父是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华南)第一位被正式按立的华人牧师;外祖父及其子女都是信徒;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曾献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母亲是当年首批学习西方医术的女西医,他们都忠心地事奉主。

保家卫国 - [飞虎战]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钟女士逃难到中国。在神的呼召下,她受聘于一队驻守昆明,为保卫中国抵抗日本侵华,由美国志愿军人组成的「飞虎队」作护士。在照料那些为保卫祖国而战伤的军人过程中,她为着能有机会与他们共渡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见证他们的英勇事迹而感恩不尽。在病房里,她为伤者制造巧克力软糖,充分发挥了基督那份[爱]的精神。

挑战死亡 - [驼峰险]

1943年,钟女士因职业的转换,到了与飞虎队有工作关系的中国航空公司任航空服务员而移居印度加尔各答。为此,她需要随机飞越当代最险峻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即「驼峰航线」。喜马拉雅山脉连绵不绝,高耸入云,飞机在众多山峰间穿梭飞行,极为惊险。因而,飞越驼峰最能挑战飞行员的胆色,一旦需要躲避日军的追击时,更是险象环生。由于日本占领滇缅公路,这条航线就成了当时中国与外界唯一的接触通道,对抗击日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这个危及生命的空中服务员工作,钟女士的胆色过人。她把自己全然交托给神,从来没有为要面对死亡的挑战而害怕,因为深知神必与她同在。与此同时,具备护士资格的她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往返中印两国的航程途中,她不但照料乘客的饮食,更提供一些医疗护理。直至战争结束后,她随中航从印度迁回上海,时任护士长。

乱世姻缘 – 印度情

194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钟女士邂逅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钟华亮先生。钟先生出生香港，也在基督家庭长大，虔诚爱主。先后任团契主席、青年敬拜讲员，还是教会诗班指挥。1940年他加入本地辅助民兵部队的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翌年，日本进袭香港，钟先生驻守鲤鱼门炮台，不幸被炮弹击中受重伤，导致面部左颊肌肉神经瘫痪，左侧眼珠突出，眼皮无法瞼上，左耳听觉亦遭严重损害。英国政府把他送往加尔各答就医时结识钟女士，情愫渐生，且于1945年共谐连理。

婚后仅一个多月，丈夫便远笈美国宾州 Lafayette 大学攻读，钟女士则仍留在印度当护士，一别三年有余。尽管当时中国航空公司有众多男同事的条件更优厚，拥有高薪厚职，然而钟女士还是在不断祷告下，确信神所预备而作出这重要的决定。

燃烧自己 - 建立人

当时，根据美国劳工法例，员工不分男女，婚后一律获得家庭津贴，因此钟女士可以领取一份相当于月薪的额外津贴。为此，她不仅能够支持丈夫上学，还继续供养双亲及弟弟攻读医科的费用。1948年，她离开高薪厚职的中航回归香港定居后，再度为生活奔波劳碌，为供弟弟前往加拿大继续进修「精神科」的医学费用，竟身兼三职。

同时，她为了孝顺双亲，不惜向朋友借钱在香港买地建屋，供他们居住。当时，为了偿还债务，加上生活重任，夫妇二人胼手胝足，省吃俭用地度日。意想不到日后，香港政府计划兴建青马大桥，需要购买钟女士名下的住宅土地。于1980年房地出售后，经济条件得以改善，以致退休期间不必仅仅依靠退休金生活。

实在是神的恩典，当年若不是为了让父母有安居之所，钟女士绝不会购地盖房，正如经文所言：「当照耶和华中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申五 16)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她正是因孝顺而得福。

钟女士自觉她一生中最感欣慰的是教育了两名女儿自小明白圣经真理，并且敬爱神，作荣神益人的工作。大女儿敏玲获神学研究硕士后，现在多伦多华人教会事奉；二女儿端玲获得博士学位，在国际炭科研领域颇有地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她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讲学，借此机会把福音种子撒播在学子心中。

隐藏自己 - 存谦卑

1948年从上海回港后，钟女士在香港政府医务卫生署的职位被提升为高级护士，于1961年被总督柏立基委派为香港护士局委员，又于1966年被总督戴麟趾委任香港产科士局委员，同时又是香港护士产科士联合会会长。其间，曾任拥有六百名学生，相信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护士学校——东华三院护士学校校长。

虽然，钟女士具有一般人认为值得夸耀的卓越成就，但她谦卑为怀，她的卓越成就，连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女儿都懵然不知。直到她的丈夫返回天家后，才在闲话家常中稍加提及，且点到即止。因为她深知一切皆为天父的赏赐，毫无夸口之处。而让她引以为荣的，就是按神的教导所养育的两名「爱主」又「可爱」的女儿。

一生事主 - 颂圣名

虽然钟氏夫妇因为生活而奔波劳碌，但他们绝对不会忘记圣经所说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赛三十 15）的道理，来到天父面前得享那份平静安稳。无论生活如何忙碌，星期天他们总是一家人来到天父面前敬拜上帝，并积极参与事奉。钟女士以神所恩赐的女高音回馈主恩；她负责教会的诗班，从13岁到80岁，她都以歌声事奉神，长达六十多年之久。

钟女士离世回天家一个月后，美国国会追认她为退役军人，获赠「光荣退役」文件。于2012年一月十七日在美国水牛城举行颁赠仪式，由次女钟端玲出席并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钟陈可慰女士是信、望、爱兼备的人。她不愧是女中豪杰、人中强者、神的忠仆，又是圣经描述的贤慧妇人，彰显神的荣耀，成为后人的榜样，给世人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15.00
ISBN 978-1-467-51865-9
5 1500 >
9 781467 518659

免费
不可出售